

#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ZHONGHUA WENMING YUANLIANG CHANG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杜甫

回首向来萧瑟处，  
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

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  
陆游

中国精神文明网 中国广告协会



公益广告：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 福州党校学报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FUZHOU

主管单位 中共福州市委

主办单位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编辑委员会

主任：童桂荣

常务副主任：王 斌

副主任：纪浩鹏

编委：李永杰 刘兴旺 魏少辉 丁 飞

江 希 吴碧英 张曙婷 林淑周

欧 敏 曹敏华

主 编：王 斌

副主编：林淑周

编 辑：丁春华 兰丰丰 陈琴容 郑梅钦 魏璐珂

# 福州党校学报

双月刊

2024年第6期(总第211期)

## · 目次 ·

主管单位:

中共福州市委

主办单位: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4-107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5-1204/C

发行范围:

公开发行

出版日期:

2024年12月20日

国内定价:

10.00元

印刷单位:

福建东印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 新时代新思想研究

5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李永杰

10 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的生成逻辑

林善炜

17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期选人用人的理念和实践创新

程蕊

22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在宁德的孕育与实践

王彬彬

31 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李洪亮

###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37 基层减负增效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与调适策略

陈钰

45 方向、规律、方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理论

杨江南 焦奕婷

## 版 权 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维普、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 经济研究

- 52 中国式新发展格局的内在机理与形成逻辑 张竣哲 钱周伟
- 59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红绿结合”的生态革命理论  
刘晓勇 谢光茹
- 68 福建民营经济强省战略目标下推动泉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陆焱平

### 教育研究

- 75 一级学科视域下推进基层党校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的思考  
——以F省P市党校系统为例 赵金宇

### 福州发展研究

- 82 新质生产力赋能福州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探析 叶娟惠
- 91 福文化在福州上下杭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  
展 林崛翊

编辑出版:

《福州党校学报》

编辑部

主 编:王 斌

副主编:林淑周

地 址:

福建省福州市福  
马路 990 号

邮 编:

350014

电 话:

0591-88199355

电子邮箱:

fzdxxb@163.com

网 址:

<http://fzswdx.gov.cn>

## The Main Contents

NO.6, 2024

General NO.211

- 
- 17 Xi Jinping' s idea and practice innovation of selecting and employing people in Fujian working period  
Cheng Rui
- 22 The gestation and practice of anti-povert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Ningde  
Wang Binbin
- 31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deeply rooted i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Li Hongliang
- 37 Restrictive factors and adjustment strategi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assroots burden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increase policies—The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Chen Yu
- 45 Direction, law and method : the scientific theory of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in an all-round way  
Yang Jiangnan, Jiao Yiting
- 52 The internal texture and formation logic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Chinese style  
Zhang Junzhe, Qian Zhouwei
- 68 Research o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Quanzhou' s private economy under the strategic goal of Fujian 's strong private economy province  
Lu Yanping
- 75 Thoughts on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party history and party building disciplines in grass-roots party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rst-level disciplines—Taking the Party School System of P City in F Province as an Example  
Zhao Jinyu
- 82 Analysis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in Fuzhou empowered by new productivity  
Ye Juanhui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重要论述的 核心要义

李永杰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福建 福州 350100)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党校工作, 就“为什么要办党校、办什么样的党校、怎么样办党校”等重大问题作出系列重要论述, 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党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包括坚持为党育才、为党献策;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坚持从严治校、质量立校; 坚持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

**关键词:** 习近平; 党校工作; 核心要义

**中图分类号:** D26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4)06-5-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和关心党校事业。在福建工作期间先后多次到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调研、作报告, 还曾亲自担任福州市委党校校长。2007年至2012年兼任中央党校校长, 在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就党校事业发展等重大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做好新时代党校办学治校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深刻阐明了“为什么要办党校、办什么样的党校、怎么样办党校”等重大问题, 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党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 一、坚持为党育才、为党献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

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 “回顾历史, 党校始终不变的初心就是为党育才、为党献策。”<sup>[1]</sup>党校(行政学院)的初心就是“为党育才、为党献策”, 推进党校的事业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这个初心。《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明确指出: “党校(行政学院)是党领导的培养党的领导干部的学校, 是党委的重要部门, 是培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主渠道, 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 是党和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重要智库。”<sup>[2]</sup>党校的定位是“领导干部培训主渠道”“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重要智库”。这一

**基金项目:** 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研究基地重大委托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心重视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永杰,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定位同“党校初心”高度一致。

1. 为党育才。所谓“领导干部培训主渠道”就是“为党育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党员教育问题，但最初是以党支部为单位开展学习，没有设立专门的党校。1924年5月才正式提出设立党校，当初动议成立党校的目的就是培养人才，“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sup>[3]</sup>。1924年12月成立了中共安源地委党校，1933年3月在瑞金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这就是后来的中央党校。中国共产党办党校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培训党的领导干部的历史，在党的百年历史上，党校为每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培育了众多优秀的领导干部，为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党校创办初期，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一年多时间里共培训了1000多名干部；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常规班次培养各类骨干上万人，其中约65%的七大代表有中央党校的学习工作经历。”<sup>[4]</sup>《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要在中国长期执政，必须源源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执政骨干。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党校体系，专门教育培训干部，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革命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建设时期如此，改革开放新时期更是如此。”<sup>[4]</sup>可见，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中央党校在人才培养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党校不是一般的学校，主要是为党培养合格的领导干部，尤其是提升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解决好“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党校就是推动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理论素养的地方。”<sup>[1]</sup>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党校的“主课主业”，是领导干部来党校学习的主要内容。

2. “为党献策”。“开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承担党委和政府决策咨询服务”<sup>[2]</sup>是党校的基本任务，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研究阐释重大

方针政策是党校的重要责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央党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曾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央党校就是整风运动的策源地，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都是在中央党校作的报告。中央党校就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风向标，毛泽东亲自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并为党校书写“实事求是”校训；中央党校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推动力量，很多中高级领导干部到中央党校学习，通过他们扩大整风运动的成果。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开真理问题大讨论的风气之先，为推动思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新时代以来，党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上，在推进理论武装、推进政治训练和常规培训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办党校的历史就是党校践行党校初心的历史，就是“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历史，新时代的党校必须坚守党校初心，推动党的建设事业发展。

## 二、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党校事业必须始终坚持的政治站位，是践行党校初心的必然要求。”<sup>[1]</sup>党校是党委的重要部门，是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也是党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研究机构，党校的各项工作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一）党校教学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造就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执政骨干队伍

1. 提升领导干部的理论修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sup>[1]</sup>党校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提升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是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校政治训练的重点内容，通过政治训练“提高干部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sup>[5]</sup>，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2. 党校教学要重点突出党性修养内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明确提出：“党性教育重点开展理想信念、党的宗旨、革命传统、党风廉政教育。”<sup>[6]</sup>提升党性修养是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共产党的党性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质，主要体现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强烈等。党校是领导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党校的党性修养课程设置要合理，要有理论性说理，比如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历史的教育；也要有情感性触动，比如红色故事、红色家书等红色资源的情感触动；也要有反面的警示教育。

3. 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领导干部不仅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提高领导干部的本领是党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和历史性的变革，但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大党要成功治理大国就必须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领导干部的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体现，现阶段尤其要着力提高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服务群众的能力、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提升领导干部本领和能力就是党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表现。

（二）党校科研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当好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主力军

1. 党校要做好宣传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工作。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有正确的理论才有正确的行动，中国共产党历来都非常重视思想理论工作，党校的一个重要定位就是党的思想理论阵地。党校要

宣传好阐释好党的创新理论。科学的阐释源于深入的研究，理论创新源于时代需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其创新源于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时代课题的回答，只有把这些问题研究透彻了，才能够阐释清楚。科学的研究阐释工作是宣传的基础，宣传不能照本宣科、浮在表面，而应该以精湛的学术研究和阐释工作为基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宣传。党校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推进新思想的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推动新思想的深化、内化、转化工作。

2. 党校要加大理论研究力度。要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加大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阐释，加大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加大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要能够在重要时刻发出党校声音，要能够对社会思潮发挥引领作用，要能够对社会热点问题做出科学解释和释疑解惑，要能够对包括互联网在内的社会舆论产生影响。“党校还要充分发挥课堂、报刊、网站、出版物等阵地优势，坚持在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净化‘噪音’‘杂音’，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sup>[4]</sup>

3. 党校要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表现就是“为党献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校“要加强同党委和政府的沟通衔接，积极出主意、建诤言、献良策，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及时有力的智力支撑”。<sup>[1]</sup>要能够提出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报告，就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党校老师要走出教室“小课堂”，走进社会“大课堂”，

勤接地气、了解实际，大量掌握第一手材料，并作深入分析，提出科学的建议。党校有独特的优势，学员来自各个领域、各个地区，并且对当地的发展状况了如指掌，党校现实问题研究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学员的优势，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升决策建议的科学性。

### 三、坚持从严治校、质量立校

从严治校是党委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基本方针，也是全面从严治党在党校事业上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这些年来，各级党校以校风学风建设为突破口，狠抓作风建设和学员管理，从严治校严出了标准、治出了效果，党校有效发挥了不正之风‘净化器’、党性锻炼‘大熔炉’、全面从严治党‘风向标’的作用。”<sup>[1]</sup>

（一）从严治校重点抓好教师和学员两个主体，关注校风建设

1. 从严治校体现在党校老师身上就是严以治教和严以治学。党校老师要严以治学，培养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仅熟悉和精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还要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重大现实问题。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有精深的研究，要深入研究学员关心的问题，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国情，把理论讲鲜活，提高学员的理论水平。党校老师要严以治教，严把教学意识形态关，坚持党校姓“党”、姓“马”、姓“共”，党校老师要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和党的基本主张，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的深化、内化、转化工作。

2. 从严治校体现在学员管理上。党校学员是各级领导干部，进党校学习要实现从领导干部到学员的身份转变，党校要严格管理学员。学员管理是党校从严治校整体中的一部分，党校对于学员要给予

充分尊重，也要敢管敢抓、严抓严管，党校学员不论职位高低，在党校都是党校学员，都要服从党校的管理制度。

3. 从严治校还体现在校风上，就是塑造党校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党校的校训是“实事求是”，党校老师要实事求是地直面和研究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党校学员要实事求是地提出并研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党校不同于高校，党校学员都是实际工作经验十分丰富的领导干部，他们对实际问题的了解和把握超过了党校老师，所以党校历来都有教学相长、学学相长的风气，教师和学员相互学习，学员同学员也相互学习、借鉴。

（二）质量立校是党校工作的重要遵循，是党校办学治校的生命工程

1. 要提升教学质量。教学是党校工作的中心，要“不断增强党校教学的政治水平、政策水平、学术水平、专业水平，提高教学的实际效果”<sup>[1]</sup>。党校教学要讲准、讲全、讲深、讲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清楚理论创新是针对什么问题而创新的，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深入分析这些问题有助于学员对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的深化、内化、转化，有助于强化党的理论武装。

2. 要提高科研质量。科研是党校教学、决策咨询等工作的基础。科研是教学的基础，只有对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课堂上才能讲深讲透，才能做到用学术讲政治，讲清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理、哲理、道理。科研是决策咨询的基础，决策咨询需要对某一个领域有长时期的关注和研究，了解并熟悉该领域的基本状况、存在问题以及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只有做足了这些基础性工作，才能够做好“为党献策”工作，撰写出针对性强的高质量决策咨询报告。党校的科研要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的研究，注重对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入研究，注重对国情、党情、市情的研究，这些都应该是党校科研的重点。

3. 要抓好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是最宝贵的财富，人才队伍建设是党校质量立校的关键，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质量都需要有高水平的人才队伍，党校要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校要本着对党的干部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下大力气培养造就一批政治强、信念坚、业务精、作风正的高素质党校人才队伍。”<sup>[1]</sup>实施名师工程，培养造就一批有影响力、有声誉的名师大家。党校的工作对老师的要求很高，党校老师既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又要有深厚的专业修养；既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又要有务实踏实的肯干精神；既要有专精深通的学术研究，又要有深入浅出的教学技巧。新引进的年轻博士未必马上就能适应党校的要求，这就要求党校必须重视人才培养，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推动年轻人尽快适应党校的要求，走上党校的教学科研岗位，推动党校事业发展。

#### 四、坚持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

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校是党委的重要机构，因此党校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要坚持党委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坚持党对党校工作的领导，是党校事业发展的一条根本经验。

1. 坚持党校姓党根本原则。坚持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党校姓党是党校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必须贯穿于党校的一切工作。党校教学贯彻党校姓党原则体现在党校老师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政治站位，要兢兢业业于党的教育事业，用深厚的理论功底来教育学员，提高学员的理论修养，提高学员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党校科研贯彻党校姓党原则体现在，党校要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积极宣传阐释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

2. 加强对党校的领导是各级党委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将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纳入党委整体工作部署，制定领导干部参加党校（行政学院）培训的规划和政策，将培训情况作为干部任职、升迁、管理的重要参考，选配配强党校（行政学院）领导班子等等。《条例》规定了具体的领导体制和机制，使党委对党校（行政学院）的领导落到了实处，各级党委应该认真贯彻落实《条例》精神，承担起领导党校事业发展的重要责任。

3. 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党对党校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政治领导的核心就是从全局的高度定政策、把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基本原则。党校本身就有政治机关的定位，讲政治是党校的突出特征，政治训练是党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党校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党校落实党的领导的重要表现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党育才、为党献策。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J]. 求是 2023(7):4-13.
- [2] 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
-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180.
- [4] 习近平. 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 求是, 2016(9):3-12.
- [5] 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23:14.
- [6]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23:11.

责任编辑：郑梅钦

# 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的生成逻辑

林善炜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福建 福州 350014)

**摘要:** 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想有其特定的生成逻辑: 中华民族悠久的海洋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海洋观, 是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想的理论逻辑; 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与教训, 以及中国共产党海洋战略演进与艰苦卓绝的海洋开发实践, 是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想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本人长期在沿海地区工作时对海洋开发利用的思考与实践, 是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想的实践逻辑; 新世纪面临的国际国内复杂形势, 是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的现实逻辑。

**关键词:** 习近平; 海洋强国; 海洋战略; 生成逻辑

**中图分类号:** D61; P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4)06-10-7

2024年10月15日—16日, 习近平总书记赴福建考察, 看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漳州市东山县陈城镇澳角村, 2001年, 在福建省工作期间他曾经来过这里。时隔23年, 看到澳角村发生的巨变, 习近平总书记深感欣慰。他察看澳角湾海域环境和村容村貌, 详细了解海鲜干货和渔获产品交易情况。他对乡亲们说: “乡村振兴还是要发扬优势, 做好‘海’的文章”, “一定要充分发挥优势, 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这与他在福建工作时重视海洋、开发海洋、利用海洋的“蓝色信念”一以贯之。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 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 统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发表了一系列

关于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论述, 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形成了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描绘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宏伟蓝图, 勾画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四梁八柱”, 指明了推动海洋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 标志着我们党对海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 为我们在新时代建设海洋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科学指南。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的形成, 有其特定的生成逻辑。它承启于中华民族悠久的海洋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海洋观, 发端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海洋探索过程中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海洋开发实践, 根植于习近平本人长期在沿海地区工作时对海洋开发利用的思考与探索, 考量于新世纪中国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家战略

**基金项目:** 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从海上福州到海洋强国研究”(编号: FJ2020ZTB034)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林善炜,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经济教研部教授,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产业经济。

发展需要。

## 一、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的理论逻辑

### (一) 承启于中华民族悠久的海洋文化

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中的丰富养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海洋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1. 承继了中国传统的“官山海”思想文化。中国古代很早对海洋进行开发利用。千百年来,濒海先民在近岸采贝、捕鱼,并煮海为盐。春秋战国时代,统治者们开始了发展海洋经济和海洋航运等方面的初步探索。如齐国在山东沿海地区“便鱼盐之利”,并专门设立了相应的机构来加强管理,齐国因大力发展海洋渔业、盐业,舟楫通海并发展商贸活动而成为“海王之国”。齐国的管仲察觉到海洋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意义,提出“唯官山海为可耳”的治国主张,劝谏齐桓公“官山海”以富国,推行征税于盐的政策。<sup>[1]</sup>秦国的韩非子将“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总结为治国经验。<sup>[2]</sup>自秦汉以来,中国人更是开辟了一条使中国从陆地走向海洋的中西贸易和中西文明交融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并在唐宋时期使海洋贸易得到繁荣拓展。“兴鱼盐,引舟楫”“官山海”等浓缩了中国古人经略海洋的文化精髓<sup>[3]</sup>,初步体现了中国古代依靠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达到国家繁荣的治理理念。习近平多次提及中国古代悠久而优秀的海洋文化,强调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sup>[4]</sup>,正是对中国古代“官山海”等传统思想文化的承继和发展。

2. 承继了郑和“造大船,驰骋大海”的海洋思想。15世纪上半叶,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开辟了从南中国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的航路,是人类航运史的壮举,也是一次国家交流、文明交互的伟大尝试。郑和在七下西洋的航海经历中,形成了对海洋与国家兴衰内在逻辑的深刻认识。郑和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出发,认为国家的兴衰安危与海

洋有着紧密联系,提出:“若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首夺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覬觐南洋也。”<sup>[5]</sup>这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当时统治者的海防意识。郑和的海洋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海洋兴邦,主张建立舰队以获得制海权;二是强调海洋是联通世界、促进中国建立国际海洋关系的重要通道;三是主张竭尽所能地扩大海洋领土,开发海洋财富。郑和的海洋思想凸显出海洋对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意义,郑和远航西洋的实践更使中国海权达到了顶峰。习近平非常重视国际上海洋的合作交流,多次表达了加强海洋国际合作、共同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强烈愿望,这既是对郑和“造大船,驰骋大海”海洋思想的借鉴和超越<sup>[3]</sup>,也为新时代中国向海图强指明了方向。

### (二) 承继于马克思主义的海洋观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单独写过有关海洋方面的书籍,但他们的海洋观却是全面又深刻的。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其所处的社会发展现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充分肯定了海洋在资本主义形成和世界市场开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马克思主义的海洋观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海洋是世界沟通的舞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他必须到处建立联系。”<sup>[6]</sup>“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有在世界市场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sup>[7]</sup>在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西方国家通过海上航线开辟了广阔的世界市场,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与互鉴。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海洋是世界各国交往的重要媒介,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海洋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分析了新航线的开辟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价值,充分肯定

了海洋经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巨大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sup>[8]</sup>马克思强调航运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远洋航运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瓦解。第三，海军是维护殖民地与航道安全的重要保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海权是影响国运兴衰的关键所在，海军力量的存在与否决定着国家的兴盛与衰败。“英国的殖民地与贸易离不开海军。”<sup>[9]</sup>马克思恩格斯将西方国家资本迅速积累的重要原因归结于当时西方国家海军力量体系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洋观是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的理论根基和方法论基础。习近平指出：“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sup>[10]</sup>将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结合当今世界形势和中国特点，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渐进生成，并把马克思主义海洋观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 二、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的历史逻辑

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与教训，以及中国共产党海洋战略思维的演进与艰苦卓绝的海洋开发实践是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形成的历史逻辑。

### （一）近代中国海洋战略思维的历史演进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探索海洋的国家之一，但明朝后期以来，在重陆轻海传统观念和大规模海禁锁国政策的影响下，唐宋时期一度兴盛的海上贸易一去不复返，甚至到清末有海无防，遭受西方列强海上入侵和蹂躏，进而使我国逐渐处于有海无疆、有海无权的落后状态。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海战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侵略者均从海上航道进入中国，切肤之痛不断刺激着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同时也激发近代中国有识之士重新思考和审视海洋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关系，深刻认识到“兴邦张海权”的道理。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他确立了以守海口为主的近岸防御思想。魏源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在《海国图志》一书

中提出发展海运和海商、建立海军、掌握海权等一系列主张<sup>[11]</sup>，期望通过发展海洋文明、建设海军海防，成为“制夷”的“海国”，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晚清国人开始进一步认识海洋。在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李鸿章等人主持创办了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并建立了中国近代海军。但遗憾的是，后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海权继续旁落。

在内忧外患、有海无防的现实国情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有志之士不断探索海权兴国之路，提出“兴海权，振中华”的以海强国思想。孙中山强调：“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sup>[12]</sup>“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sup>[13]</sup>孙中山站在国家兴亡的高度，强调强化海权必须加强海军建设，并倡导建立强大海军来加强海防。孙中山还主张积极对外开放，向海求生存、求发展，大力发展海洋实业。孙中山的这些思想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但其远大抱负没能得到实现。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海上入侵的屈辱历史与教训告诉我们，海洋关乎国家兴衰安危，关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海洋战略思维的历史演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对西方的经济封锁和美国的武装挑衅，毛泽东以国家生存和安全为大计，提出防御性海洋发展战略，作出了“加强防卫、巩固海防”的战略部署，并把沿海地区作为海防前线，把近海作为保卫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sup>[14]</sup>毛泽东高度重视对国家海洋权益的维护，特别关注中国海防事业的发展，强调：“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sup>[15]</sup>，把建设一支防御性强大的海军作为发展海洋的主要方向，并将海军定位为“战略军种”，确立了海军在中国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sup>[16]</sup>基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主要从军事角度来思考海洋、海军和海防问题，从主权独立、建设

强大海军队伍的角度来规划当时的海洋战略，改变了中国近代有海无防、有海无权的历史。这一时期所进行的海军军种的组建与培养、海洋事务管理机构的调整、海洋资源的勘探与调查等方面的设想与作为，在现在看来是极具战略性意义的，为中国后续海洋战略思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洋战略思维的历史演进

20 世纪 80 年代初，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邓小平准确把握了当时的世界形势，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海洋战略思维。一方面，把东南沿海由海防前哨转为开放前沿，把海洋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通过海洋走向世界，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贸易港口等逐步形成对外联系的海洋通道<sup>[17]</sup>，打开国门，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实施“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解决国家之间的海洋争议。邓小平指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在海权问题上，邓小平根据国家实力和国家发展的安全需要，提出了实施“近海防御”，建设一支精干、顶用的海军的战略思维。<sup>[18]</sup>邓小平对解决海洋争议问题上所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一直沿用发展至今，对中国海权的维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习近平解决海洋权益争端和实施海洋战略合作提供了成功范式。这一时期，我国将海洋事业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海洋立法初具雏形，海洋经济快速增长，海洋管理日趋成熟，我国在国际海洋事务中崭露头角。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果断调整海洋战略，将我国在海洋方向的安全政策由防止敌国大规模海上入侵转变为维护边缘海区的国家主权和权益。江泽民从国家海洋安全出发，高度重视人民海军的建设，提出要建设具

有强大综合作战能力的海军，“着力构建适应高技术战争要求的现代作战体系”<sup>[19]</sup>。同时，高度重视海洋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提出了“实施海洋开发”等一系列战略主张。

21 世纪初，面对新问题、新形势和新挑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建设和谐海洋”等一系列关于海洋发展的战略思维。胡锦涛重视海洋科技开发，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强调以和平方式解决海洋领土争端，构建和谐海洋新局面，并提出建设中国“强大的人民海军”。和谐海洋目标的提出，将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的和谐理念推向了全球，在实践上把中国特色海洋观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

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党和人民在解决海洋问题上的大胆创新和理论认识与实践经验是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的最直接、最宝贵的历史依据。

### 三、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源于他长期在沿海地区工作时对海洋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以及对海洋开发利用的探索与实践，是他长期在沿海地区执政实践的积累与升华。

#### （一）在市域提出建设海洋经济强市

1985 年 6 月，习近平从河北正定调任到沿海地区福建省厦门市担任副市长。在厦门工作时，他主持编制《厦门市 1985 年—200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提出要把厦门建设成“海港风景城市”，并积极探索在厦门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战略构想和建立象屿保税区的具体方案。

在宁德工作时，针对闽东地区的贫困状态，习近平提出“以海治贫”的海洋发展理念，充分利用宁德的海洋资源，大力实施“耕海牧渔”，发展远洋捕捞队，狠抓外海捕捞，发展水产品加工业，“靠海吃海念海经”<sup>[20]</sup>，开创宁德海洋经济新局面。

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逐渐形成了关于海洋经济发展的初步构架。他把海洋看成一个尚未开发、开垦的处女地，认为海洋内涵丰富、地域广阔、潜力巨大，强调要从战略高度上充分认识江海开发对福州振兴的重大意义，提出“江海兴则福州兴”的重要论断和“振兴经济在于振兴海洋经济”的超前理念。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趋势的深刻洞察，习近平明确提出建设“海上福州”的战略构想：以海岛建设为依托，以海岸带开发为重点，以海洋的综合利用为突破口，实施海洋开发的“三个一”工程。<sup>[21]</sup>与此同时，他还提出要加快推进港口海运、远洋捕捞、滨海旅游、海洋工业等基地建设。1994年6月12日，福州正式出台《关于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建设“海上福州”的发展思路、布局框架和战略开发重点，成为我国最早发出“向海进军”宣言的沿海城市。1994年6月16日，习近平在接受香港《大公报》副社长曾德成采访时，谈及新出台的《关于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时指出：“站在新世纪的入口，谁拥有海洋优势，谁就拥有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合作的有利条件。”<sup>[21]</sup>他强调，福州是全国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要抓住机遇，利用优势，在海洋开发、海岛建设上大做文章。

习近平提出的建设“海上福州”战略设想，扬起了福州实现新的跨越的风帆，其中所蕴含的战略思维、科学理念，历久弥新，体现了战略性与前瞻性、全局性与方向性、创新性与开拓性等特征。

## （二）在省域提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

担任福建省省长时，习近平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他强调发展蓝色产业和海洋经济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要加大开发利用海洋、发展海洋经济力度，同时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他把统筹陆海生态文明实践作为促进福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明确

提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目标，强调要“突出抓好海洋综合开发和海洋综合管理两个重点”<sup>[22]</sup>，这一指示为后续的海洋经济体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频繁地在沿海和海岛地区调研。从2003年1月起，以舟山为起点，习近平用4个多月先后调研了18个沿海县（市）、区，明确把原来浙江省所确定的“海洋经济大省”升格为“海洋经济强省”，并把海洋经济强省战略纳入“八八战略”的总体框架。

2007年，习近平就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提出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及“以海洋拓展城市空间”构想，强调海洋是上海拓展城市空间的重要依托，要努力争创海洋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从厦门到宁德、福州，从福建到浙江、上海，习近平长期在沿海地区领导改革开放和建设，期间他一直对海洋饱含深情，对海洋开发和利用有着长期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的坚定信念，源于他心中深厚的“海洋情怀”，源于他长期在沿海地区工作时对海洋的认识、重视和关心。

## （三）在国家层面提出建设海洋强国

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在更加宏大的历史与地理背景下，习近平庄严宣告建设“海洋强国”，把建设“海洋强国”写入党代会报告中，高度重视海洋强国建设，就建设海洋强国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逐渐体系化。

长期沿海地区的实践为习近平谋划和经略海洋提供了认识论基础，成为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的重要源头活水。从在宁德、福州提出建设海洋经济强市，到在福建、浙江提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层面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经历了从局部到全局、从地区到国家、从实践经验到理论建构的不断深化与升华的全过程。这是建设

海洋事业范围的扩大，是建设海洋事业内容的拓展，也是建设海洋事业层次的提升，更是建设海洋事业目标的提高，充分展现了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从逐步形成到完善与发展的全过程。

#### 四、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的现实逻辑

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的形成与发展，有其客观的国际国内形势背景。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和国家战略的发展需要，是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形成的现实基础。

##### （一）中国的海洋利益日趋广泛

海洋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空间，为人类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也正是因为利益争夺，海洋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舞台。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海洋事业关乎民族生存发展，关乎国家兴衰安危，西方列强的强大，靠的是那片广袤辽阔的海洋，走向海洋是世界大国崛起的必然选择和发展途径。中国是一个海陆复合型大国，海洋面积相当于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我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海洋这一基本格局将长期存在并不断深化。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来看，目前中国陆域经济发展面临瓶颈，资源能源需求和发展空间以及海外利益的不断扩大，向海要资源、向海要空间成为必然选择，开发海洋资源成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习近平海洋强国战略思维指导中国开始重新认识海洋、认识世界，必须改变传统陆域发展思维，从国家成长高度和国家战略利益视角审视国家未来发展与海洋的关系。

##### （二）中国海洋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海洋事业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巨大成就。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利用水平稳步提升，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海洋产业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不断提高，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海洋生态保护效果显著，海洋科技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

高，国家海洋治理能力大幅提升，海洋产业取得长足发展，“这些成就为我们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sup>[4]</sup>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外交等领域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深层次的新发展、新成就，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为开启建设海洋强国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较好，海上维权力量日益强大，经略海洋成为全体人民的共识，建设海洋强国的条件日趋成熟。

##### （三）中国一直面临海洋强国战略压迫

从国家安全和主权角度来看，中国海洋事业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便是涉海主权问题。进入 21 世纪，海洋已日益成为保障我国总体安全，拓展海外利益以及海上战略空间的关键所在。而美国明确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并以其强大的海上军事能力始终遏制中国。近年来，我国与越南、日本、菲律宾等国的岛屿归属、海域主权问题等周边海洋争议此起彼伏，海洋争端日益复杂，面对海洋邻国的种种挑衅，东海、台海、南海等涉海主权问题已经形成联动趋势，中国面临的海洋安全环境和维权形势复杂而严峻。一些国际反华势力试图插手中国海洋权益，屡屡阻挠我国收回合法的领土和主权，对中国的合法海洋权益进行挑衅，阻挠中国拓展海洋战略空间。

##### （四）中国海洋困境日益增多

一方面，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对海洋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也日益提高。但是目前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海洋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海洋环境污染仍然较严重、海洋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海洋公共服务不够健全、海洋食品不够安全等问题仍较突出，必须进一步发挥海洋特色优势，找准海洋领域制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推动海洋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让海洋在更高水平上满足人民群众对“蓝色空间”“蓝色乐园”等美好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近年来,非传统海洋安全问题并未消失,甚至日益派生出许多新的问题。如日本核污水排海问题导致的海洋污染和健康威胁、海洋灾难、海平面上升、渔业资源衰竭、海盗与武装抢劫、毒品贩运等跨国海上犯罪活动等多种海洋困境都是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来自海洋方面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尚未根本消除,必须寻求科学的海洋战略理论体系和合理的海洋发展战略部署来妥善解决此类海洋困境,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思维。

正是基于这些复杂的形势背景,党的十八大作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吹响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集结号”;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吹响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出征号”;党的二十大又进一步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要“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吹响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冲锋号”,为我国在新时代发展海洋事业、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了行动指南。

#### 参考文献:

[1] 杨新亮. 海王之国:齐国的海洋经济文化[J].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1(3): 22-24.

[2] 曲金良. 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先秦文化卷[M]. 北京: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8:214.

[3] 张晓刚. 习近平关于海洋强国重要论述的建构逻辑[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38(05): 22-30.

[4] 习近平. 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 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N]. 人民日报, 2013-08-01(01).

[5] 郑一钧. 论郑和下西洋[M]. 北京:海洋出版社, 1985:419-420.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404.

[7]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人民出版社, 2004:411.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32.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95.

[10] 习近平. 致2019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的贺信[N]. 人民日报, 2019-10-15(01).

[11] 李强华. 基于近代海洋意识觉醒视角的魏源“海国”理念探究[J]. 上海海洋大学学报, 2012(5):917-922.

[12] 刘咏尧. 国父的国防学术思想研究集[M]. 北京:中国文化研究所, 中华大典编印会, 1996:344.

[13] 孙中山全集(第2卷)[M]. 北京:中华书局, 2011:564.

[14] 贾宇, 张小奕. 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的海洋战略思想初探[J]. 边界与海洋研究, 2018(3):5-17+2.

[1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3:463.

[16] 廖民生, 刘洋.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海洋战略的发展脉络与理论演变初探[J]. 太平洋学报, 2019(12):88-97.

[17] 杨腾龙. 邓小平海洋战略思想研究[D]. 聊城:聊城大学, 2015.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49.

[19]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162-163.

[20] 习近平. 摆脱贫困[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6.

[21] 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上)[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342.

[22] 孙贤讯. 福建大念“山海经”:计划九年建成海洋经济强省[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2-04-13(02).

责任编辑:郑梅钦

#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期 选人用人的理念和实践创新

程 蕊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 福州 350122)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期选人用人的理念与实践, 展现了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创新发展出的独特人才观, 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抓住关键问题, 开辟风清气正选人用人导向; 运用辩证思维, 根据事业发展需要选人用人; 注重整体思维, 近距离多角度考察识别干部; 坚持全局思维, 培养汇聚优秀人才队伍。重温这些实践和思考, 为理解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观点提供重要参考, 对今后的人才工作也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习近平; 福建; 选人; 用人

**中图分类号:** D262.3; C9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4)06-17-5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 17 年半, 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前瞻性的理念创新和实践探索, 特别是在人才选拔与使用方面, 形成了丰富的实践与思考。这些实践与思考, 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 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人才的重视, 并与现代治国理念相融合, 形成了习近平独特的人才观。曾任福州市委副书记的赵守箴这样回忆: “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 他有自己的体系和观点。他不仅爱才、惜才, 而且在选才、用才方面有独特之处。”<sup>[1]103</sup> 我们应当认真学习领会, 从中汲取智慧与启示。

## 一、抓住关键问题, 开辟风清气正选人用人导向

用人干事, 重在导向。所谓“善用人者, 必使有材者竭其力, 有识者竭其谋”。正确的用人导向是激发干部积极性的关键因素。用人导向出现偏

差, 不仅会严重挫伤干部队伍的干事创业积极性, 还会对整个政治生态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

习近平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 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 地方经济发展面临着繁重的任务。习近平并未因此在干部选任上唯经济发展能力至上, 而是注重从根本上选拔品行端正、德才兼备的干部。他认为, 做干部要德才兼备, 但更重要的是德。他不仅提出了“为官四要”, 勉励青年干部“一要有党性观念; 二要有度量; 三要有气节; 四要诚实; 五要有气魄”<sup>[2]36-46</sup>, 还明确指出“四种人”不能用<sup>[3]851</sup>, 从根本上确定了选人用人的标准。面对闽东经济发展落后、干部思想状况不一的现状, 习近平心里始终有杆秤: “我们对闽东干部的评估不是注重于他近期内做出多少醒目的成绩, 而是注重

**作者简介:** 程蕊,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 研究方向: 领导科学、应急管理。

于他是否尽心尽力去做长期性、铺垫性的工作。只要你讲奉献，尽心尽力，就是一位好同志。”<sup>[3]845</sup>强调对基层干部的长期观察与综合评价，看重干部“讲奉献”的精神。

主政福州时期，习近平对干部选拔任用中存在的“唯文凭论”“唯分数论”现象提出意见。他指出，基层干部只要工作干得好，就应该得到提拔，那些“通过公开招考成绩优异，但实际工作中表现平平的，还有为了追求更高的职位，平时不认真工作，却专注于备考，甚至请假在家复习的，不宜重用”<sup>[1]103</sup>。体现了其注重人才“实际表现”的观点。他还专门撰文探讨如何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要尽量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党性强、有事业心、能吃苦耐劳和有奉献精神、为人正直公道的优秀党员选拔到党支部中来”<sup>[2]163</sup>。“选拔、任用干部要注重干部的政治立场、思想品德、领导才能和工作实绩，防止片面强调年龄和文凭，防止重才轻德。”<sup>[4]48</sup>

## 二、运用辩证思维，根据事业发展需要选人用人

习近平在选人用人方面的核心观念在于“任人唯贤”和“以事择人”。选拔人才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激发他们的潜力，让他们在组织中发挥最大的价值。因此，还需要为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成长机会。他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实际情况，选拔符合当时事业发展需要的干部，注重发掘具有实践经验、敢于担当的干部；同时，尊重人才成长发展规律，主张不拘一格选用人才，敢于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包容并大胆使用人才，通过人岗相适的安排，为他们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宁德地委决定复办《闽东报》的过程中，习近平大胆启用没有办报经验的基层新闻干部王绍据。王绍据有敢于担当的责任心和在基层撰写新闻稿的宝贵经历，这正是习近平所看中的特质。王绍

据也不负众望，在习近平的具体关心支持下，带领团队如期复刊《闽东报》。<sup>[3]513</sup>退休后，他仍不忘总书记嘱托，继续发挥“活地图、活字典”的作用，为总结推广宁德的扶贫经验贡献力量。在选拔宁德地委委员、纪委书记时，有人认为纪委书记由年纪大、德高望重的干部担任更合适。习近平却坚持用“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选任干部，只要符合标准、具有办事能力，就要大胆使用，不应以年龄、资历作为决定因素。青年干部精力充沛，年富力强，热情高，有闯劲，更要不拘一格，大胆培养使用。<sup>[3]846</sup>这些做法，激发了闽东地区干部队伍的活力，推动了干部的年轻化和专业化。

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要求分管干部工作的同志要做到“适才而用”，根据每个人的专长与优势提供合适的平台。他强调，对于经过仔细考察和评估认定为值得重用的干部，要予以充分信任和支持，营造良好工作环境，真正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力。<sup>[1]104</sup>这些做法不仅满足了地方事业发展的需要，还为干部队伍的长远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 三、注重整体思维，近距离多角度考察识别干部

善于用人是一门高超的领导科学和领导艺术，在使用人才时，一定要知人善任。要合理有效使用人才，就要知人长短。

在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期间，习近平提出，任用干部之前要掌握干部的情况，了解他的特长和兴趣，并强调“考察识别干部，功夫要下在平时”，这就需要平时多接触、多倾听、多观察，全面真实地掌握人才的情况。他主张干部考察要重点关注其在关键时刻、困难环境和复杂局面中的表现，并引用林则徐的《观操守》阐述自己对如何判断干部素质的理解。他强调盯住关键，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素质和能力，这不仅有效避免了选拔中出现的“才浮德薄”问题，也确保了干部的忠

诚与担当精神。<sup>[3]844-845</sup>

习近平非常重视与干部的沟通交流，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每周都会安排一定的时间与干部交流谈心，谈心对象包括普通基层干部，也有县处级干部。干部想找他的时候，如果时间安排不开，他也会指示秘书记录下来，找机会安排见面交流。<sup>[5]172</sup>通过定期谈心谈话，倾听干部的意见和想法，习近平能够及时了解干部的真实情况和思想动态。在与干部谈心的过程中，习近平展现出了极高的谈话艺术和耐心，不仅能及时指出干部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也不忘给予鼓励和支持，增进了干部的信任度和对组织的归属感。

习近平主张，干部的考核应当常态化，并建议每年进行两次正式的考核，分别安排在年中和年末，重点考察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和任务完成情况，避免仅在考虑晋升时才进行临时性的考核。<sup>[1]104</sup>在干部提拔问题上，他要求组织部门每次必须拿出三个符合条件的人，把名单拿给他。习近平会一个一个和他们谈话，谈完以后，再把组织部门叫来一起讨论，综合考虑其特点和适任性。<sup>[1]147-148</sup>

#### 四、坚持全局思维，培养汇聚优秀人才队伍

领导者选用人才时，不仅要关注个体的素质和能力，还必须注重团队的整体结构，确保干部群体之间相互取长补短，实现整体效能最大化。习近平在选用人才上，始终坚持多角度、多层次选才，注重优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结构。他深刻认识到，干部队伍的长期建设需要系统化、战略性地规划与布局，以确保其持续健康的发展，并通过一系列举措，为构建多元化的用人格局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主张“从战略的高度，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当时，宁德的畲族群众大都居住在偏远地区，当地交通落后，人才更是缺乏，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数量总体偏少。对此，他主张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要树立长远观念，并从

三个方面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一是提升现有少数民族干部的素质；二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后备力量；三是确保市、县层面的少数民族干部占到一定比例，少数民族聚居千人以上的乡、镇，至少要配备一个少数民族的副职领导。<sup>[2]124</sup>

在主政福州期间，习近平高度重视女性干部的成长和进步，要求市妇联坚决执行福建省对女干部参政比例的相关规定。在一次女干部恳谈会上，习近平表示，妇女参政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标志，各级党政部门应当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妇女干部的培养，在生活上给予关怀。<sup>[6]114</sup>在他的关心支持下，福州市在培养与选拔女干部的工作方面走在全省前列，许多女干部在重要岗位上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在福建省分管统战工作期间，习近平为改变党外后备干部不足的状况，指导制定了《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党外干部工作的意见》，将选拔党外干部纳入干部队伍和人才工作总体规划。在他的推动下，党外干部在政府部门中的任职比例得到巨大提升。<sup>[5]197</sup>

#### 五、深入把握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人才观的精神实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人才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不仅为新时代人才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 （一）开辟风清气正选人用人导向

开辟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导向，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作，需要我们在理论学习、制度建设、实践操作等多个方面下功夫。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讲话中多次提及干部选拔任用的标准与要求，还通过推动制度改革、健全干部选任机制，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理念制度化，形成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在2013年全国组织部长会

议上，总书记指出：“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要求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sup>[7]137</sup>。2014年5月，他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我们的用人标准为什么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因为德是首要、是方向。”进一步阐明德的三个层次，即“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具备社会公德，还要在个人品行上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sup>[8]</sup>。201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强调，要认真落实好干部标准，把忠诚干净、敢于担当的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用起来。

## （二）根据事业发展需要选人用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选人用人方面，始终坚持事业为上，以事择人、人岗相适的选人用人理念。他多次指出，在人才工作上要打破固有偏见和僵化标准，尊重人才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善于发现和挖掘潜在的人才资源，为他们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展示才华的舞台。2012年12月，在广东考察期间，他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积极探索集聚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体制机制，完善相关政策，进一步创造人尽其才的政策环境，充分发挥优秀人才的主观能动性。<sup>[9]99</sup>2014年6月9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在全社会积极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完善好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sup>[9]100</sup>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用好用活各类人才”，针对急需紧缺的优秀人

才要有特殊政策，不要求全责备，更不应论资排辈，要让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英雄有用武之地”，提倡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人才使用机制，允许失败、宽容失败。<sup>[9]108</sup>选拔任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sup>[10]566</sup>这些理念和实践，一方面为各类人才的发展营造了公平、宽容、开放的用人环境；另一方面有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从而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局面。

## （三）全面、历史、辩证地考察评价干部

干部工作要做到选贤任能、知人善任、人尽其才，必须在考察识别干部上下功夫，正所谓“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化考察识别干部的理念，他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提出“四观察四看”的识人方法，即“观察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看其见识见解；观察干部对群众的感情，看其品质情怀；观察干部对待名利的态度，看其境界格局；观察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过程和结果，看其能力水平”<sup>[7]137-138</sup>。这一方法分别从思想、情感、境界、能力四个方面考察干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指导性，进一步完善了干部考察识别机制。此外，他还提出健全考察机制和办法，确保多渠道、近距离接触观察干部，强调“对干部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感觉和印象上，必须健全考察机制和办法，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深入了解”<sup>[7]137</sup>。

## （四）培养汇聚优秀人才队伍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是保证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之举。因此，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出发，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备置人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需要的是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sup>[10]562</sup>开展稳定和可持续的人才队伍建设，是提升干部队伍整体水平的重要

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注重对年轻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他指出，要做好年轻干部工作，建设一支忠实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符合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数量充足、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年轻干部队伍；要注重培养具有专业背景的复合型领导干部，以及具有国际视野、战略思维的干部，其中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都要有一定数量。<sup>[10]569-571</sup>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配备方面，他强调人才的梯次培养和结构优化，并指出，要注重从各个方面选拔专业化人才，通过优化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专业结构等方式，不断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性；要多选一些在重大斗争中经过磨砺的干部。<sup>[11]</sup>此外，要通过加强干部培训、轮岗交流、挂职锻炼等针对性的培训方式，不断提升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确保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得到应有的重用和激励。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选人用人的理念和实践，在吸收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才理念的同时，延续了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人的人才观，不仅展现了深厚的理论功底，更彰显了他在人才发展方面的深远洞察。在理论层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的人才观。他始终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提倡在选拔人才时要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灵活的方式识别和使用人才，凸显了尊重人才多样性和个性发展的重要性。在实践方面，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将他的选人、用人理念落到实处。他注重多角度考察干部，重视干部在复杂环境中的表现，并通过常态化的考核机制，确保干部的选拔和使用更加科学和公正，统筹推进多元化干部队伍建设，实现了干部资源的优化配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选人用人的一系列重要观点论断，更加系统化、制度化，不

仅丰富了党的组织建设理论，更为新时代人才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总书记十八大前后的人才理念，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领会其精神实质，进一步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更好地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培养和汇聚更多优秀人才，推动中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 参考文献：

- [1]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习近平在福州[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
- [2] 习近平. 摆脱贫困[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 [3] 本书编写组. 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下)[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4] 习近平. 关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思考[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1（Z1）：48-49.
- [5]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习近平在福建（上）[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
- [6]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习近平在福建（下）[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
- [7]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8] 习近平.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5-05（01）.
- [9] 习近平关于人才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
- [10]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11] 习近平. 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J]. 求是，2019（2）：8.

责任编辑：兰丰丰

#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在宁德的孕育与实践

王彬彬

(中共福鼎市委党校, 福建 福鼎 355200)

**摘要:** 消灭贫穷, 实现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 也是我们党不懈的价值追求和使命担当。经过接续奋斗,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 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扶贫脱贫实践,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 为中国的减贫、扶贫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研究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时关于扶贫工作的重大实践以及取得的重要成效, 探索地区扶贫的成功经验对当下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致贫、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习近平;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宁德

**中图分类号:** D261;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4)06-2-9

马克思指出: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sup>[1]</sup>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沉疴旧疾”, 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密集性调研, 共计次数高达 50 多次, 前后踏足了 14 个典型性的连片特困地区, 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为新时代反贫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2012 年 12 月 29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时提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 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 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sup>[2]</sup> 2013 年 11 月 3 日, 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湖南考察,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推动了扶贫减贫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2015 年 10 月 16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 “我们坚持分类施策, 因人因地施策, 因贫困原因施策, 因贫困类型施策, 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 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 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 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 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五个一批”成为精准扶贫的一剂良方。2017 年 10 月,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全面部署, 锚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聚力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2018 年 2 月 12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对前一阶段的扶贫经验进行了总结, 将其提炼为“六个坚持”, 进

**作者简介:** 王彬彬, 中共福鼎市委党校讲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提“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将“七个坚持”的重要经验和认识进一步提升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重要内容和实践指向。“七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形成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坚持精准扶贫方略，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营造全社会扶危济困的浓厚氛围；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七个坚持”深刻回答了我国脱贫攻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科学内涵和深层逻辑，是我国脱贫攻坚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sup>[3]</sup>

宁德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发源地和实践地，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期间，就对摆脱贫困进行了深入思考和伟大实践。宁德俗称“闽东”，“老、少、边、岛、贫地区”和“中国黄金海岸线上的断裂带”是困扰该地许久的两个突出贫困标签。宁德是当时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9个县中有6个被认定为国家级贫困县。1988年6月至1990年4月，习近平同志任职中共宁德地委书记，他把脱贫致富工作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带领闽东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扶贫实践探索，取得了伟大的脱贫成果。他撰写《摆脱贫困》一书，通过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观点，对闽东地区如何脱贫发展这一实践问题进行了回答，也成为了习近平治国理政之扶贫开发战略思维的重要源头。<sup>[4]</sup>阅读《摆脱贫困》以及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七个坚持”，能够看到二

者既有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发展上一脉相承的关系，也有内在统一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地区的扶贫实践及理念，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七个坚持”的早期探索。

### 一、坚持党的领导，引领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反贫困事业中的核心作用。特别是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脱贫工作难度大、任务重，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依靠党的力量，包括组织执行力、领导动员力和社会协调力等，才能在脱贫攻坚战中实现最终目标。

#### （一）“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支部”

在《摆脱贫困》一书中的《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建设好农村党组织》一文，习近平指出：“贫困农村要摆脱现状并迈上富裕之路，最根本的保证来自党的坚强领导。”<sup>[5]159</sup>从我国反贫困事业的实践来看，脱贫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推进和有效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量的不断增强是必不可少的。如何让农村党组织发挥领导力量这一问题，《摆脱贫困》一书中也给出了具体答案：让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反贫困工作中走到“前台”去，走到“第一线”去，要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成为反贫困工作中服务于民的领导核心。<sup>[5]160</sup>此外，还需要更加重视支部建设，贴近群众，体察民情，保持党组织活力，维护党组织初心。

习近平多次就党建工作做出指示，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反贫困事业道阻且长，如果党组织软弱、缺失战斗力，就无法承担起该项事业的领导责任。因此他指出，脱贫致富工作上要想达到目标，“必须有个好支部”<sup>[5]161</sup>。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是中国特色反贫困事业的具体工作者和推动者，脱贫攻坚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队伍的素质。他在《摆脱贫困》中对干部队伍素质有过生

动详细的指导性表述，如“为官四要”“领导者的修养”“干部的基本功”等，他尤为关注和重视练好“干部的基本功”，并对此进行了具体阐释，认为其指的是密切联系群众，因此强调干部要走到基层，了解民情民意，从而能够在工作中办实事、办好事。<sup>[5]13</sup>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反贫困事业的**最大保障**

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和发展。在脱贫攻坚战中，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守正与创新中，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制定科学的扶贫政策，推动脱贫攻坚工作顺利进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战的“七个坚持”，首要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扶贫工作中得到有效执行。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反贫困事业的政治保障。反贫困事业需要有坚强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坚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在脱贫攻坚战中，党的领导能够保证扶贫工作的公正性和有效性，确保扶贫政策的贯彻执行。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反贫困事业的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拥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和强大的组织力量，能够有效地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脱贫攻坚格局，确保脱贫攻坚工作顺利实施，并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反贫困事业的伟大胜利。

（三）习近平关于抓党建促脱贫重要论述的生动实践

1994年的柏洋村，是出了名的贫困村，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村财负债高达43万元，村组织涣散，干群关系紧张，是一个“无址议事，无钱办事，无人管事”的烂摊子。

柏洋村按照习近平抓党建促脱贫的工作思路，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创建“五好”党组织，探索形成了“五心”工作法，即办事有公心、工作有信心、发展有恒心、为民有爱心、团结有诚心。每一“心”都有专门所指和细化内容：坚持办事有公心，公正公平赢民心，认真倾听群众呼声，搭建群众合理诉求平台，规范村务管理，为民办实事；坚持工作有信心，创新工作增活力，通过创新机制、强化班子、壮大队伍，增强干部群众建设新柏洋的动力和信心；坚持发展有恒心，实在干事带民富，村两委深入村民和企业走访调研，想方设法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坚持为民有爱心，心系群众解民忧，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坚持团结有诚心，开门纳谏明思路，村两委班子通过“访、问、谈”等方式，与群众交流、剖析、纳谏、整改，团结一心谋发展，带领村民加快新柏洋建设。通过“五心”工作法，柏洋村增强了自身“造血”功能，全力打造“党建强、产业旺、村民富、村庄美、文化兴、邻里和”的新时代产村融合共同富裕示范村，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小康建设明星村等国家级荣誉，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宁德地区首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00万元的村。

2010年9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亲临柏洋村调研，对柏洋村提出的“五心”工作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勉励柏洋村“要围绕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的光荣任务，围绕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继续努力！”柏洋村美丽嬗变的历史证明，强有力的基层党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是让老百姓有获得感的核心。

**二、坚持用发展的方法消除贫困根源，为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奠定基石**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决定

性因素，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减贫工作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的关键是通过发展实现扶贫开发。《摆脱贫困》的序言总结中提出，整本书的根本理念及最大特点就是抓牢了经济建设这个要点，并始终围绕着该项工作开展扶贫开发。<sup>[5]2</sup>在该书中，习近平同志具体而全面地就通过发展消除贫困这一做法进行了阐述，这与“七个坚持”中的“用发展的方法消除贫困根源”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 （一）“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

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期间，围绕宁德经济建设开展了一系列探索与实践，提出了“把经济建设当作最大的政治”“提倡经济大合唱”等一系列指导宁德脱贫发展的重要理念。《摆脱贫困》中提出，脱贫事业要想取得进展，一定要认识到“中心工作”是发展经济，发力的主要方面就是抓好农业和基建，打通和铸牢这两个“基本环节”。想要实现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重点就是抓住农业和工业这两个“轮子”。宁德及闽东总体上底子薄、经济基础差，吃饱饭、吃好饭需要靠农业，因此要结合本地实际及优势资源，抓大农业，落实“山海经”。<sup>[5]6</sup>此外，还要依附大农业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利用，并鼓励地方参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为农民增收开辟更多路径。闽东发展的核心动能来自本地区的工业资源与工业开发，要突出规模效益，并且注重生态均衡，要大胆改革开放，以此推动脱贫工作进入新阶段。

从习近平在宁德期间发表的讲话、文章等可以发现，他在宁德期间就已经初步形成了精准扶贫思路。“精准”主要体现在他对闽东地区发展的一系列指示和要求，要因地制宜，尽力而为，同时也需要基于本地实际进行“分类指导”，强调效益。<sup>[5]90</sup>在扶贫开发实践中，习近平一直重视政策制定及施政行为的明确、精准和到位，同时指出要注意地方

优势上的差异，在资源条件好的地方，大力开展和帮扶农村集体经济，如在福安后洋进行巨峰葡萄种植，周宁发展家庭林场等；对于一些自然条件限制极大的贫困地区，提出“易地搬迁”这种宏观举措，让脱贫困户看到了真正的发展希望。对于存在特殊情况的贫困人口，也要特别关注，进行适当救济，并帮助其发展一些可行的生产经营项目。

#### （二）坚持精准扶贫方略，用发展的观点消除贫困根源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的观点和消除贫困的论述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指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这表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中国贫困治理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传统扶贫方式的重大创新，其理论逻辑是基于对贫困问题的科学认识，强调针对不同致贫原因进行分类施策，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关键问题。<sup>[6]</sup>精准扶贫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实现因人因地施策，其实践逻辑强调了资源、技术、制度和文化的相辅相成、四位一体的作用，确保脱贫攻坚目标的顺利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要围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让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果，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来。<sup>[3]</sup>

因此，要根据本地区资源禀赋条件、产业基础、

市场需求等选准主导产业，着力打造独特性与特色化的产品或服务，把优势资源更多地转化为优势产业，找准符合本地资源特色的产业发展方向。坚持精准扶贫方略，用发展的观点消除贫困根源，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做出的重大决策，为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奠定基石。

（三）习近平同志关于“三茶统筹”理念的生动实践

1988年8月8日至8月10日，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期间，到福鼎开展为期3天的调研。8月8日，习近平到前岐看了垦区果场、饲料厂、农塑厂和佳阳茶场。对当时福鼎茶产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茶是我们闽东的拳头，也是我们福鼎的拳头，福鼎是占第一位。茶叶市场还不一定饱和，我们要把茶叶好好发展起来，如果亩产平均达到三百斤的水平，那么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富了。”“抓山也能致富，把山管住，坚持10年、15年、20年我们的山上就是银行了。”<sup>[7]</sup>这既是对福鼎茶产业的肯定，也是具体的“指示”和“嘱托”。《摆脱贫困》一书中共有8篇15处讲到茶，如“茶叶是闽东的一大优势”“发展大农业是闽东坚定不移的方向，是农民脱贫致富的根本所在。”习近平对闽东茶产业发展的重视可见一斑。基于深入调研与思考，他为闽东茶产业把脉开方：“因地制宜给茶叶分级，要成片、成规模地种植，科学管理，打出品牌，尤其要打出宁德的品牌，做出精品茶叶。”“一些贫困户搞不起来，就要帮他们，由贫困户提供劳动力，生产队在其他各个方面提供支持”等等。

在习近平这些脱贫理念的指引下，福鼎市委市政府明确发展思路，规划顶层设计，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农民致富，实现了福鼎白茶“大合唱”，推动了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从一片叶子，到一个产品，再到一个品牌的输出，福鼎白茶产业的发展

为福鼎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为增强广大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了有力的产业保障。福鼎白茶产业发展为“三茶”统筹理念的地方实践提供现实样板，也为“三茶”统筹理念提供了实践目标指向和价值回归。

三、坚持发动群众，为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助力前进

习近平在宁德地区的脱贫工作中，富有创见性地提出“扶贫先扶志”的理念，并总结了“弱鸟先飞”等具有启发性的精神，这些都成为闽东地区反贫困工作的重要指导。他在《摆脱贫困》中用精准的文字解释了“闽东之光”，高度赞扬闽东地区人民自强不息、朴实奋斗的脱贫精神，认为其是“一种光彩”<sup>[5]21-22</sup>。这些论述与表达，与“七个坚持”中的“坚持发动群众，激发脱贫内生动力，使得扶贫和扶志合二为一”的理念具有前后相继的关系。

（一）“滴水终究可以穿石”

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提到，闽东地区在解放后的一系列变化，用更长的眼光去看待，是“滴水穿石”的变化。这也是他首次在公开场合用具体范例去阐述“滴水穿石”理念。习近平十分重视对“滴水穿石”精神的倡导，《摆脱贫困》一书中多次强调“滴水穿石”精神。1989年，习近平在全国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再一次提出，在经济工作中要具备长远眼光和坚定信念，贯彻“滴水穿石”精神。在同年召开的全区新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号召媒体广泛宣传“滴水穿石”精神，有效激发宁德地区人民反贫困斗志，提振闽东地区人民脱贫发展的信心。他提到，过去十年闽东发生的变化并非一夕之间出现，而是滴水穿石般的变化。与先进地区对比，闽东地区经济落后一步，工作上也有较多改变空间，但是也并不是“事事不如人”，也需要看到本地区及本地群众的优点和长

处。同年11月，习近平在地直机关会议上，提出要党员干部坚定反贫困信念，树立“滴水穿石”理念。受到“滴水穿石”精神的鼓舞，闽东地区群众干事创业热情持续提升，宁德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扶贫共富有了新成果，各项基础建设稳步推进，社会公共事业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幸福感普遍提升，经济社会进入了发展的良性轨道。

离开宁德后，习近平又多次重提“滴水穿石”精神。2016年2月19日，在人民日报社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人民网演播室，与宁德赤溪村村民进行视频连线时说：“我在宁德讲过，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弱鸟先飞，你们做到了！”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我在宁德工作时，把‘摆脱贫困’作为工作主线，提倡‘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树立‘弱鸟先飞’的追赶意识。宁德经过长期努力，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2019年8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宁德寿宁县下党乡乡亲们的回信中，两次提到“滴水穿石”的精神，他说下党乡的发展“生动印证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道理”，“希望乡亲们继续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二）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反作用于物质，正确的思想意识可以指导实践，促进社会发展。毛泽东说：“人活着总需要一点精神。”精神是人们生活的重要支柱，也是推动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是激励人们奋斗的精神资源。

“滴水穿石”理念是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期间提出的，是指闽东地区在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实现了由内而外的深刻变化和发展。这一理念体现了持续努力、稳扎稳打的实干精神，强调发展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实干，不

追求短期速成的形象工程，而是注重长远发展和实际效果。这个过程要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注重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引导贫困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激发他们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

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汇聚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一切依靠群众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基本原则，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实现正义的重要保证。

（三）习近平关于扶贫先扶志重要论述的生动实践

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摆脱贫困首先要摆脱思想和意志的贫困。改变人的思想是很难的，扶贫必须摒弃“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等思想观念，克服“闲慵懒”状态，要自力更生，激发群众“我要脱贫”“我要致富”的志气。

闽东贫困地区发展的困难，并不仅仅是外源性的阻碍，更多的是内源性因素。生活于此地的居民面临着精神和心理的多重捆绑。作为贫困村，当时赤溪村下山溪村民花在开创性生产上的精力几乎为零，要么砍伐天然的杂木、毛竹，扛到山外出卖，换油盐、买布料；要么养头猪出卖，用于人情上的红白喜事。不少时间耗在游手好闲，或拎着火笼过冬，或打牌猜拳消遣日子，或躺在门外晒太阳，等着政府发放救济物资等等。在实施整村搬迁安置之初，就遭到村里有些畲族老人们的反对，通过县、镇、村一级级的努力，做通了赤溪村群众的思想工作，改变了老传统、老观念、宿命论等，激发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为赤溪村的脱贫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赤溪村的发展，离不开赤溪人民群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如今的赤溪村已形成了以茶、林、竹、渔

等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为主导的产业，走出了一条“旅游富村、农业强村、文化立村、生态美村”的路子。赤溪村已先后荣获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等称号，并入选全国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典型案例，被确定为全国脱贫攻坚考察点。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通过人民网与赤溪村民视频连线并寄语祝福。在批示及视频连线中，总书记高度评价了赤溪村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脱贫精神，并进一步指出扶贫工作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再接再厉。

#### 四、坚持造福人民，为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深化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因此发动群众是实现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前提。<sup>[8]</sup>发展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摆脱贫困》一书多次强调“人民至上”理念，习近平在各地从政过程中，也一直秉持着一切为了人民和一切依靠人民的理念。

##### （一）传承“四下基层”优良传统

“人民”是《摆脱贫困》一书的高频词汇。习近平多次提到，我们党一路走来的成功经验就是走群众路线，只有相信、依靠和关心群众，才能让我们的战略、规划、工作得到理解和认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sup>[5]208-209</sup>习近平在宁德地区主政期间，耗费三个月时间对辖区内的九个县进行实地调研，并写出了《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他对闽东贫困地区的发展进行了总结，深刻地指出脱贫工作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同时也要牢牢抓住群众的力量。在《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中习近平又着重强调，干部要和群众站在一起，苦练并抓好联系群众这个

核心要义及干部基本功。<sup>[5]17</sup>

脱贫工作要多下基层为人民谋福祉。1990年1月，宁德地委下发1号文件《关于切实改进领导作风的意见》，首次完整表述“四下基层”。同年习近平在《从政杂谈》上发文，进一步对“四下基层”进行了详细地论述，提到在1988年底进行的一次宁德地委工作会议上，在他领导下当地提出改进领导作风，并将相关内容进行提炼形成了“四下基层”。具体来说包括党的宣传、调查研究、信访接待和现场办公这四个层面上都执行“下基层”的策略。许多干部下到最基层、最偏僻且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地区，接近群众，受到了很大思想触动，回来后普遍说责任感增强了，而习近平在文章中对该现象进行评论，认为是“党性观念增强了”<sup>[5]31</sup>。1990年，在调离宁德之前，习近平又发表了《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其中提到通过“四下基层”，该地区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今后要坚持下去，求实求变，去寻找密切联系群众的新思路、新方式。<sup>[5]202</sup>“四下基层”更好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脱贫工作中“聚民力”“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生动地诠释了人民至上理念。

##### （二）坚持群众路线，为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夯实内涵

“四下基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坚定的人民立场，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它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体现出鲜明的人民性。同时，“四下基层”还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种规律“蕴藏在广大群众的实践中”只有“眼睛向下”才能获得真知。<sup>[9]</sup>

“四下基层”与实践工作密不可分，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代、新场景中的一次集成和创新，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践行群众路线，做好联系服

务群众工作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科学回答。<sup>[10]</sup>该制度的初衷及落脚点都是要让反贫困事业取得成功，人民群众走上脱贫共富之路，本质就是到群众中去，向他们学习，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解决党和政府遇到的问题。<sup>[11]</sup>“四下基层”是习近平在宁德主政期间提出的一项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体现了实际价值的工作制度，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一次结合地区实际及新时代环境的实践创造。<sup>[10]</sup>

此外，“四下基层”还体现了科学的思维方法，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一系列方法和规律，坚持以客观、发展、全面、系统的观点看问题，是新时代群众路线的重要实践经验，是推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基层、深入人心的重要途径，为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夯实内涵。

### （三）习近平“四下基层”登岛现场办公的生动实践

在宁德工作期间，下乡访贫问苦是习近平的工作常态，宁德地区124个乡镇，习近平去过123个，最远的到过福鼎的嵛山岛，这是闽东最大的一个岛屿，当时还有待开发。1989年5月18日上午，习近平轻车简从，顶着风浪来到福鼎市嵛山岛调研，亲自推行“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全面深入地了解最偏远海岛干群生活与经济发展情况。上岛后，习近平前往嵛山乡政府门口的杂货店察看，并同店老板亲切交谈，之后步行一个多小时前往天湖实地调研，并作出三点指示：一是依靠近海捕捞，渔业资源会面临枯竭，不可持续发展，要适当考虑发展远海渔业资源开发。二是岛上有天然草场和淡水，作为海岛的特殊自然资源，要利用其发展旅游。三是可适当发展养殖业。此外，习近平还通过现场办公研究推动解决海底电缆、陆岛交通码头、环岛公路、驻岛干部生活补贴等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民生大事。

30多年来，全体嵛山岛人民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嵛山岛逐渐从一个封闭落后的边陲岛屿，发展

成为蓬勃向上的“和美海岛”。首先，建设基础设施。一是海底电缆，2020年完成13公里海缆Ⅱ回路建设，实现全岛24小时供电，群众生产生活用电得到进一步保障。二是环岛公路，1991年启动第一条通车公路，2021年环岛路建设，并先后完成三段道路共6.7公里白改黑，2024年全面启动了环岛路改扩建项目。三是交通码头，1991年1月，启动第一个100吨陆岛交通码头工程。其次，打造和美海岛。一是文旅融合，发挥海岛资源优势，推进全域旅游资源整合。二是人才引进，2018年清华大学在嵛山镇设立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福鼎站），累计来岛实践600多人次；通过提供平台、用地等多方面支持，累计引进18位新岛民，吸引42名优秀青年返乡创业。三是生态保护，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有效实施“河长制”“林长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海岛植被覆盖率达86.78%。最后，发展海岛经济。一是海洋经济，2023年渔业总产值达2.6亿元。二是农牧融合，利用天然草场适当发展养殖业，创新实施“玉米种植—山羊养殖—羊粪肥茶”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做足“羊经济”，以联合体的方式带动发展茶叶、玉米等特色农作物种植业发展。

作为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发端地 and 实践地，宁德地区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其所采用的扶贫开发“宁德模式”也成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上的一个成功实践。宁德数十年“摆脱贫困”的道路与历程，就是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产生、发展及实践的过程。他在宁德工作时期撰写的《摆脱贫困》一书，对于反贫困问题的思考以及对于贫困治理方面的实践摸索已经达到一定的深度，观点、理念、体系已经较为成熟。该书中的很多内容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贫困治理的重要论述是一脉相承的，具有相同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表达，尤其是“七个坚持”都能在该书

中找到原型或者仅有一些细枝末节差异的相近表述。《摆脱贫困》中提出的富有远见卓识的扶贫理念,经过30多年的实践检验,历久弥新。正如2018年3月2日《人民日报》任大平在《坚定不移的意志 始终如一的情怀》中评论:“习近平在宁德的有益探索,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从一地的积极实践到在全国的成功实践,经过了长期积累和丰富发展,越来越绽放出思想的光芒和真理的力量。”

习近平扶贫论述详略得当,语言朴实,具有极高的理论深度,揭示了客观的扶贫规律,同时也就扶贫工作的特征进行了深入阐述,并指明了扶贫工作的开展方向以及可行的路线,贯彻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新时代扶贫工作的总结,也是做好扶贫工作和乡村振兴的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目前我国已经开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深入探究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和实践,不仅对中国构建持续减贫长效机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有助于为全球贫困治理、世界减贫事业和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经验。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4.
-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J].小康,2021(07):20.
- [3]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2-26(02).
- [4] 李海星.从《贫困的哲学》到《哲学的贫困》再到《摆脱贫困》——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探索与实践[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02):27-33.
- [5]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 [6] 唐任伍.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23):66-73.
- [7] 地委书记习近平在我县检查工作时发表的讲话(录音整理)[J].福鼎通讯,1988(5).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
- [9] 陈书平.论“四下基层”的三重特质及其新时代启示[J].东南学术,2023(05):20-29+246.
- [10] “四下基层”与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研讨会发言摘编[N].人民日报,2023-07-28(10).
- [11] 尤权:坚持“四下基层”密切联系群众[J].领导决策信息,2013(20):7.

责任编辑:郑梅钦

# 论中国式现代化

## 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李洪亮

(中共玉溪市委党校, 云南 玉溪 653102)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脉。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就在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则印证着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中国式现代化“两个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崇高追求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体现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内涵着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社会理想、治理理念、大一统传统、精神追求、经济伦理、生态观念、交往之道、家国情怀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相互贯通。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特色; 本质要求; 旧邦新命

**中图分类号:** D261;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4)06-31-6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sup>[1]</sup>, 扎根在神州大地、浸润着华夏文明、具有中国特色, 其奠基、开辟、推进和拓展在“根”上是对中华文明的赓续和传承, 是中华民族新时代新征程的旧邦新命。

###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根植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sup>[2]</sup>, 追求崇高、本质显著、特点鲜明。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

涵”<sup>[1]</sup>, 既是理论概括更是实践要求。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的特殊国情, 共同富裕表征的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两个文明”相协调追求人的全面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党和人民历史自信与自觉的有机统一。

第一,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sup>[3]</sup> 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推进现代化建设,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具有中国特色。突出的连续性, 物化表现是: 政治实体

**基金项目:** 云南省党校(行政院校)系统课题: 从“第二个结合”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研究(2024YNDXXT12); 玉溪市党校(行政院校、社会主义院校)系统2023-2024年度课题: “两个结合”的历史必然和价值意蕴(2023-2024DXXT08)。

**作者简介:** 李洪亮, 中共玉溪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

衔接有序；历史接续考古可证、文献典籍流传至今；语言文字从未中断；文脉支撑传承不辍、记忆从未中断；智慧贯通古今、文明生生不息。文明的连续性保持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决定了当代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自主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绝不是偶然拼凑的，更不是从别国现代化照搬的，而是从我国历史和文化遗产的，浸润着古老民族的智慧、汲取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延续着中华民族的血脉。习近平深刻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sup>[4]</sup>正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化牢固的主体性，中华民族才能在世界历史的革新与重构中再次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始终“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sup>[3]</sup>。我们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文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也就必然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独特的地理环境、领先的农耕传统、“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深邃的哲学思考以及文化的自信开放，铸牢了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思想文化根基，形成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民族独特的文明观具有开放包容的内在特质、文明交融的悠久历史、文化发展的自信开放；形成了中华民族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一贯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是“闭关锁国”的“自循环”，不是“天朝上国”的“朝贡纳岁”，而是以交往打破封闭、以交流解除隔阂、以交融化解冲突、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拥抱世界、以文明平等的理念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兼收并蓄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优点和长处，让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转换为显著优势。

第三，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sup>[3]</sup>这样的进取精神，反映到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历史进程中，体现为绝不能照抄照搬别国模式、绝不能跟在他国后面亦步亦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突出的创新性体现为“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sup>[3]</sup>。文明的创新性是源远流长的传承、百川汇聚的交融、薪火相传的守护、守正创新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性源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物质与精神“双富”的崇高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明特点，在人类现代化历史上前所未有，这是文明创新性的最好例证、也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中的壮举。中国式现代化既要“高楼大厦”又要“精神大厦”，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两手抓、两手硬，摒弃物欲膨胀而精神贫乏的西方现代化痼疾。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对中华文明传承和创新的体现。

第四，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sup>[3]</sup>。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14亿多人口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突出的统一性，根植于悠久的历史渊源与礼乐制度的文化根基，奠定于牢固的制度保障与“大一统”的共同信念，表现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岁月流转、王朝更迭，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文明的统一性是中华民族保持民族团结进步、国家和谐统一的重要根源。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之大、实现难度之大史无前例，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正如习近平所言：“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sup>[5]</sup>没有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就难以实现现代化，没有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发展就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sup>[6]</sup><sup>[265]</sup>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企盼和强烈愿望。

第五,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sup>[3]</sup>。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内在要求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突出的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基因、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战略抉择、是世界发展进步的人间正道。突出的和平性反映了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的世界观、和而不同的文明观, 表明了中华民族悠久深邃的和平追求, 体现了中华民族和平和谐的文化基因, 决定了当代中国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命运与共的道路选择。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不是要取代谁”<sup>[7]</sup>。中国式现代化传承发展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 走和平发展道路, 必将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 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强劲正能量。

##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华传统思想精华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是“思想理论结晶”<sup>[8]</sup>, 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要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两个坚持”是根本前提, 在明确领导力量和道路方向的基础上, 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反映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明确了各领域发展目标。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彰显大国担当、强调世界贡献。

第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本质要求与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相互贯通。“实事求是”出自《汉书》,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首次在党内阐释, 后又提出共产党人“靠实事求是吃饭”<sup>[9]</sup>的重大论断。改革开放后, 邓小平先后把实事求是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基本点”“精髓”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将“实事求是”明确为“活的灵魂”。“知行合一”

源自于《尚书》“知行艰”之辩, 后来朱熹提出“知为先、行为重”之说, 王阳明发展为“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理论。在党内, 毛泽东曾作出“实践出真知”的高度凝练总结, 邓小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深刻阐释了“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和行相辅相成”的辩证联系。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 它与党的指导思想精髓高度契合, 与党的优良作风优良传统高度吻合, 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本质要求相通。

第二,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相互贯通。“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均出自《礼记·礼运》, 《吕氏春秋》亦有“天下人之天下”的明确论述。到了近代, 康有为提出“天下为公, 无有阶级”, 孙中山阐述为“民有、民治、民享”。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心声“消灭私有制”, 提出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理想。青年毛泽东先后推崇追寻“大同世”“太平世”以至“世界主义”, 由“人人皆圣贤”的主张转变为“俄国式的方法”, 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习近平深刻指出: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 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 为人类求解放。”<sup>[10]</sup>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理想状态, 推动着中华文明、中国历史向前发展, 与“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核心价值相通,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目标任务相融,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与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在重民思想上相互贯通。“民为邦本”出自《尚书》, 孟子明确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 荀子提出“下富则上富”的观点, 重农抑商、轻徭薄赋是历代统治者主流的“德政”追求。“为政以德”典出《论语》, 主张礼乐刑政、

德主刑辅，重莫如国、栋莫如德，治国之道敬德保民。民本德政的治国之道，逻辑起点是为了“宁邦”，但思想意识上强调“民”为“国”之根本，促使统治者关注民众需求、重视民生安危，“重民”才能维护皇权稳定，“保民”才能维系社稷永固，虽是被动之举，却也为当今时代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民本德政思想做出了创造性阐释，将“重民爱民”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将“富民养民”转化为“美好生活”的民生关切。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sup>[11]</sup>必须把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传承和创新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重民爱民、富民利民，推动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老百姓的高品质生活。

第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与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在功能作用上相互贯通。“九州共贯”出自《汉书》，从地理概念上强调政令统一；“多元一体”强调各民族包容融合，最早由费孝通提出；“大一统”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此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几千年来，各族人民经济上交往、文化上交流、情感上交融，集中体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生动力是中华民族漫漫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大一统”理念。我们的疆域、历史、文化都是由各民族共同开拓、书写和创造的，在这个过程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真实、管用有效的民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高举人民民主旗帜，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又保证充分的实践参与，确保了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具有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凝聚起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必须传承和弘扬“大一统”传统，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筑牢团结奋进的思想共识，聚合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精神伟力。

第五，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本质要求与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相互贯通。“厚德载物”出自《周易》，意为增厚美德、容载万物的道德追求。“明德”出自《礼记》，“弘道”出自于《论语》，明德弘道意为彰明德行、弘扬正道的崇高追求。“德”者贤明之士，“道”承载一切，厚德载物、明德弘道是中华民族贤良之士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崇高精神追求。传承和弘扬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就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sup>[12]</sup>。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德为先，弘扬古圣先贤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各族人民不断团结进步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丰润的道德滋养、强大的精神力量。

第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相互贯通。“厚生”出自《尚书》，“富民”最早记载于《管子》，“富民厚生”思想几千年来绵延传承，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民本导向和道义原则。“义利兼顾”源自于《论语》中“义利”之辩，《荀子》提出“义利两有”的主张。“治国先富民”强调了强国必须富民的富民养民情怀，是善政、善治的体现和目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内核是“义利兼顾”的理念，其早已内化为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为改变当今世界“资本逻辑”的价值追求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毛泽东强调“共富共强”，邓小平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把共同富裕作为题中应有之义和重要标志，构建了科学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伦理观。

第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要求与天

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相互贯通。“天人合一”源自《周易》“天地人”三才运行的根本规律，《礼记》《道德经》等经典亦有阐释，《庄子》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最为经典，北宋张载《正蒙》明确提出“天人合一”一词。“万物并育”出自《礼记》。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凝聚着中国古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与思考，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命题。在党内，毛泽东提出“真正绿化”国土，要求“粮食到手，树木到眼”<sup>[13]333</sup>。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保护环境”的重大课题，把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邓小平号召“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sup>[6]21</sup>。进入新时代，“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不再是一道“单选题”，而是作为根本大计，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全面推进，生态环境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为保护地球家园作出了中国贡献。

第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与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相互贯通。“讲信修睦”出自《礼记》，以道义为前提，追求诚信中正、亲睦和顺，认为“信，诚也，近于义”。“亲仁善邻”出自《春秋》，主张亲近善人、友睦邻国，是“国之宝”。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展现了中华文明个人修养由内而外的清晰逻辑，以立德修身为基础、以和合共生为特质，追求建设和平与稳定的相互关系。1949年的《共同纲领》宣布：新中国主张“世界的持久和平”，后来又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说：“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sup>[14]</sup>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14亿多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sup>[15]</sup>。我国一贯反对战争冲突，主张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发展。赓续历史文脉，就必须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走和平之路、正义之路，为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正能量”、添加“稳定剂”，不断续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华章。

第九，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要求与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在道义担当上相互贯通。“修齐治平”出自《礼记》，修己身而后能齐家治国，家齐国泰才能天下安乐，由内到外、由己达人，“修齐治平”贯通一线，既是内在遵循，也是外在伦理，反映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担当胸怀、责任逻辑。张载提出“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的圣贤标准，达到了历史上个人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觉悟高峰。“兴亡有责”出自顾炎武《日知录》，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史所未见之敌，呼吁“共保天下”。后来，梁启超明确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把修身律己转化为家、国、天下的担当，胸怀天下、祈愿大同，关注世界环球、人类命运，体现了中华文明强烈的道义担当。毛泽东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sup>[13]29</sup>习近平强调：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将极大地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sup>[16]</sup>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必须弘扬和升华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旧邦新命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具有突出的文明特性、深邃的思想智慧，其精华集中表现为绵延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中国式现代化赓续古老文明、根植中华大地，激活中华文化优秀因子、赋予伟大文明现代力量，“是中华民族旧邦新命”<sup>[3]</sup>。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sup>[3]</sup>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发展，是对历史文脉的唤醒、激活和弘扬光大。一是赓续中华民族的国土疆域。无论历史上朝代如何更迭，“华夏”“炎黄”“神州”“中国”等概念

表明核心疆域相对固定。二是赓续中华民族的政治谱系。自夏商周以来政治实体不断更迭，但是王朝脉络清晰可察。自秦汉唐以来政权组织形式衔接，郡县制、科举制等更是延续相承。近代，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统治，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开启了民族复兴的新纪元。三是赓续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文明传承的载体、文化认同的基石、国家形象的标志，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宝库。四是赓续中华民族的道统文脉。从孔老之学到近圣大贤，从良渚遗址到千年敦煌，从《易经》《尚书》到《中华大典》《儒藏》，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民族精神、社会伦理，世世研习、去粗取精后代代相传。正是文明赓续，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五千多年的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底蕴和源头活水，文明不断革故鼎新，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全新的文明形态。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sup>[3]</sup>。中国式现代化发端于中华民族近代苦难深重的危机，党领导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一是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独一无二的文明体系、历史命运、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要走自己的路，赋予了中国道路深远的历史纵深。二是先进的理论指导。“两个行”是历史的结论，是“两个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化学反映”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在结合中深深扎根中华大地、焕发生机活力。三是优越的制度安排。国家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反映中国历史文化和基本国情，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四是辉煌的历史文化。“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sup>[17]</sup>没有文化

复兴就没有民族复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担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文化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自主选择、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扎根中华大地，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形态。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创新的结果。“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具有突出的创新精神，中华文明数千年来都是在创新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革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一是经济建设上，传承自强不息和勤劳勇敢的民族品格，创造了“两大奇迹”；秉承富民厚生观念，致力于共同富裕；以义利兼顾为导向，追求“两个文明”相协调。二是政治建设上，郡县制、科举制、监察制、赋税制等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资鉴。三是文化建设上，浩瀚的文化典籍、诗词歌赋，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四是社会建设上，仁爱、孝道、诚信、修为等伦理道德，尊老爱幼、和睦相处、包容和谐、民风教化等社会价值，增进社会凝聚力和稳定性。五是生态文明建设上，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取之有度、知止不殆、道法自然的理念，见山见水见众生，饱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此外，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四大发明、铸冶工艺、建造技术、农业技艺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养分；在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古丝绸之路为“一带一路”提供历史借鉴，和而不同的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巨大作用。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 人民日报, 2023-02-08 (01).

(下转第81页)

# 基层减负增效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与调适策略

陈 钰

(江苏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持续为基层减负,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扎实做好巡视工作。基层减负增效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容易陷入“按起葫芦又起瓢”的困境。从政策问题的可处理性、政策本身的规制能力、政策以外的变数这三个维度出发,分析发现除可资利用的理论和方法、政策本身的因果论和立法机关的支持外,目标群体的基数大、行为的多样性等14个因素均制约基层减负增效政策执行。应当正确引导和强化政策宣传,优化并执行与分类管理相适应的配套政策,建立高效的部门联动机制,营造积极的政策执行环境等,以推动基层减负增效政策的顺利执行。

**关键词:** 基层减负增效; 政策执行; 马兹曼尼安—萨巴蒂尔模型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4)06-37-8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谱写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全会特别强调了基层减负问题,要求基层减负应当处于“持续”的状态<sup>[1]</sup>,再一次对基础减负问题定调。实际上,党的十九大报告就已经强调:“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街道基层、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sup>[2]</sup>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阶段。”<sup>[3]</sup>这一系列的政策要求,都突显了基础治理、基层减负增效的重要性。

之所以重视基层治理问题,反复强调基层减负增效,不仅是因为基层减负增效对于“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sup>[3]</sup>具有重要作用,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必经之路,更是因为在实践中,基层组织常常陷入一种“欲减负而不能”的困局:一方面,他们渴望减轻负担,简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由于责任的不断扩大,他们又不得不承担起更多的任务范围。

减负增效作为推进基层治理改革的核心目标,不仅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策略。减负,即减轻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负担,通过简化行政程序、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使基层治理更加高效和灵活。增效,则是指通过改革和创

**基金项目:** 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公共政策执行视域中人工智能的伦理性危机应对研究”。

**作者简介:** 陈钰,江苏师范大学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

新,提高基层治理的效率和效果,确保政策的执行更加贴近民众需求,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从基层治理改革来看,减负增效,不仅能促进社会环境的和谐与稳定,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途径。因此,更为科学、高效和民主的基层治理改革方向,是基层减负增效制度践行的指南。然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两个问题,如何实现基层减负增效政策的有效执行是推动基层治理改革的关键。

以马兹曼尼安(David Mazmanian)和萨巴蒂尔(Paul Sabatier)所构建的政策执行理论模型对影响基层减负增效政策执行效果的多种因素进行系统性地进行综合分析,旨在深挖基层减负增效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难题,探讨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策略,为实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的基层减负增效处于“持续”状态,探寻出有效的实践路径,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 一、基层减负增效政策执行理论框架

(一)政策执行的核心价值:日益凸显的认识政策执行的关键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其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加深和扩展的过程。从政策执行问题的关注历史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许多人认为政策制定之后,其目标自然就能实现。但美国政府在那个时期推行的许多改革政策由于执行不力而未能顺利落实,这种社会现实状况引发了学者们的关注,人们开始转向了对政策执行价值意义的研究。他们认为政策执行是目标确立与适应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这一定义强调了政策执行不仅仅是政策制定的后续步骤,而是一个动态的、互动的过程,涉及目标的设定、资源的分配、行动的协调以及对行动结果的反馈和调整。

事实上,政策执行是政策制定和政策评估之间的关键环节,它确保了政策目标能够转化为具体的

行动和实际效果。没有有效的执行,再完美的政策也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美国著名的行政管理学者G·艾利森指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地执行。”<sup>[4]</sup>政策执行在政策制定全过程中能够起到关键作用。

随着对政策执行重要性认识的加深,学者们开始从多个角度探讨如何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果,这包括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组织结构、资源配置、利益协调、信息沟通、监督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政策执行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政策本身的合理性,还依赖于执行过程中的多种因素,如执行者的能力和动机、政策受众的接受度、外部环境的变化等。政策执行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跨领域和跨层次的执行问题,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及国际政策的本土化执行等。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政策执行的复杂性,并为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执行策略提供理论支持。通过对政策执行过程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再到评估的全过程,从而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实现政策目标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 (二)马兹曼尼安—萨巴蒂尔模型

美国学者们从多元视角出发,展现了政策执行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产出了大量理论成果,建立了多种理论框架来阐释和剖析政策执行的各个环节。如最早构建政策执行理论模型的史密斯提出了“史密斯模型”<sup>[5]</sup>;马特兰德通过识别政策执行中的歧义性和冲突性这两个关键变量,构建了一个“冲突与模糊”矩阵模型<sup>[6]</sup>;范米特和范霍恩构建了一种典型的从高层到基层的执行框架<sup>[7]</sup>等等。这些研究模型都对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在对基层减负增效政策执行的探究上,马兹曼尼安和萨巴蒂尔的“政策执行综合模型”

(又称“马兹曼尼安—萨巴蒂尔模型”)更具优势。该模型构建了一个动态的政策执行框架,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以形成一个全面的分析模式,来深入探讨那些复杂、多层面、多因素交织的政策执行问题。

马兹曼尼安和萨巴蒂尔的“政策执行综合模型”因其理论的完整性和适用性,被我国学者广泛应用于政策执行的研究之中。对于基层减负增效政策的执行过程而言,马兹曼尼安—萨巴蒂尔模型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工具。如图 1 所示,这一模型将影响政策执行的变量归纳为三个维度:政策问题的可处理性、政策本身的规制能力以及政策本身以外的变数。在这三大维度之下,进一步细分为 17 个具体的影响要素,涵盖了政策制定、执行、监督、反馈等各个环节,为全面分析和评估政策执行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通过运用马兹曼尼安—萨巴蒂尔模型,本文将深入探讨基层减负增效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和制约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提出针对性的策略和建议,以优化政策执

行过程,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促进基层减负增效政策目标的实现。

## 二、基层减负增效政策执行制约因素的深入剖析

基层减负增效政策的执行受到众多复杂因素的交织影响,这些因素的变动往往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与预期目标出现偏差。因此,理解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对这些因素进行有效地整合,对于政策的成功执行至关重要。本文将依据马兹曼尼安和萨巴蒂尔提出的政策执行综合模型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

### (一) 基层减负增效政策问题的可处理性

1. 可资利用的理论与技术。政策问题的可处理性,首先需要考虑是否具备扎实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这是确保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够科学、合理并达到预期效果的基础。2018 年 10 月 9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2019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更是明确提出将 2019 年作为“基层减负年”,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关心干部、心系群众、为基层减负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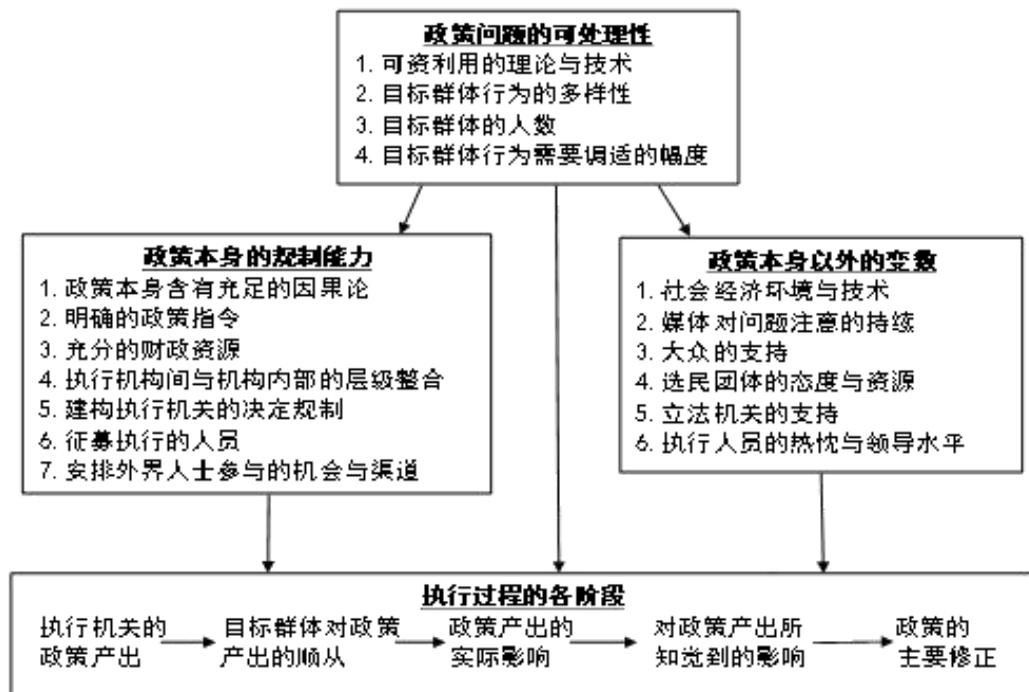


图 1 马兹曼尼安—萨巴蒂尔模型

绑的为民情怀<sup>[8]</sup>。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基层减负增效，为基层减负增效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导向和理论支持。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为基层减负增效提供了有力支持，通过建设信息共享平台、推广“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模式，能够显著降低基层工作人员的事务性负担，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因此，基层减负增效政策在理论和技术层面已相对完善，它们不再是制约政策执行的主要障碍。

2. 目标群体的基数大以及目标群体行为的多样性。基层工作人员不计其数，包括乡镇、街道、村委会等不同层级和领域的工作人员，其工作内容和性质各不相同承担的职责和任务存在差异。面对减负政策，不同基层单位和个人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如积极适应、消极应对、创新实践等。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专业素养参差不齐，这影响他们执行政策的能力和效果。如此庞大的群体来执行基层减负增效政策，无论是在时间跨度还是地域范围上，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3. 目标群体行为需要调适的幅度。在推行基层减负政策的过程中，各级和各领域的工作人员都需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他们过去的工作和管理模式，其中个人行为的改变可能涉及较大的调整幅度。不同层级和领域的工作人员的行为习惯往往具有惯性，改变需要时间，特别是当改变的幅度较大时，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如果政策信息没有有效传达给目标群体，或者群体对政策的理解存在偏差，将会影响他们的行为调整，加之缺乏有效的激励和惩罚机制也会降低群体调整行为的积极性。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这些群体可能产生抵触情绪，导致政策执行受阻。

## （二）基层减负增效政策本身的规制能力

1. 政策本身含有充足的因果论。史密斯提出政策执行过程中所涉及的重大因素之一就是理想化的政策（Ideal Policy），是指政策制定者试图引导

的理想化作用模式，涉及的内容包括政策的目标是否切合实际，政策的内容是否妥当，政策规定是否明确可行等等。<sup>[9]</sup>政策执行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本身的质量，这包括政策是否具备充分且合理的因果逻辑。基层减负增效政策的制定通常基于对基层工作情况的深入分析和理解，政策制定者通过调研和数据分析，识别了基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痛点，如工作量过大、资源分配不均等，通过制定政策提高公共利益及改善民众的生活质量，如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改善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等，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和支持。因此，基层减负增效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被认为是正确合理的，“政策本身的因果逻辑”不应被视为影响基层减负增效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

2. 明确的政策指令。美国学者霍尔柏林在分析美国总统外交政策的执行情况时指出，政策执行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执行者难以准确把握上级领导或决策者的意图。由于他们接收到的政策指令通常含糊不清，易于造成误解，这常常成为导致政策执行不成功的关键因素。<sup>[10]</sup>国家层面上，针对基层减负增效政策的顶层设计工作的政策目标和执行方案已经清晰明确。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历次全会精神，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提出从中央层面做起，层层大幅度精简文件<sup>[11]</sup>。查摆形式主义老问题和改头换面的新表现，逐项提出解决措施，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解决形式主义问题做好2021年为基层减负工作主要措施及分工方案》<sup>[12]</sup>。在广泛调研和征求多方意见之后，中央层面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正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整治指尖上形式主义的通知》。随后，针对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迅速启动，并伴随着

一系列后续措施的相继执行。<sup>[13]</sup>在地方层面，全国不同地区在制定地方执行细则时，对于如何具体减轻基层工作负担、提高工作效率的措施描述不够明确和具体，这些措施往往缺乏具体的操作指南和明确的执行标准，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以落地。由于缺乏明确的操作性指导，基层工作人员在执行这些政策时会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这不仅影响了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可能对基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3. 充分的财政资源。我国基层财政资源的不足会限制基层减负政策的执行范围和效果，导致基层单位在改善工作环境、提升工作效率等方面面临挑战。基层单位可能因为缺乏必要的资金而无法执行减负措施，比如改善工作条件、增加人手或更新设备，导致工作效率无法提高。财政资源不足导致基层工作人员的待遇无法得到改善，进而影响士气和工作积极性，甚至导致人才流失。

4. 执行机构间与机构内部的层级整合以及建构执行机关的决定规制。我国基层执行机构间与机构内部的层级整合以及建构执行机关的决定规制不合理，在多个方面阻碍基层减负增效政策的执行。执行机构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清晰，导致工作重叠或责任推诿，影响政策执行的效率。层级整合不合理导致信息在不同机构间传递不畅，影响决策的准确性和执行的及时性。执行机构的监督和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执行不力，甚至出现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

5. 征募执行的人员及安排外界人士参与的机会与渠道。我国部分地区基层减负增效政策外界人士参与的机会有限，或者渠道不畅通，将降低社会力量对基层减负增效政策的支持和参与。不合理的征募和参与机制导致执行团队缺乏多样性，限制创新思维和多角度解决问题的能力，未能有效利用社会各界的资源和专长，导致执行过程中资源浪费或

不足。对参与执行的人员缺乏必要的培训和指导，影响他们执行任务的能力。征募执行的人员及安排外界人士参与的机会与渠道不合理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基层减负政策的执行。

### （三）政策以外的变数

1. 社会经济环境与技术。社会经济环境与技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对基层减负增效政策的执行造成阻碍。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可能导致资源配置不均，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单位可能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和物质资源，从而难以执行减负政策。在一些基础设施落后的地区，技术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不完善可能限制了政策信息的传递和政策措施的执行，影响政策执行效率。

2. 媒体对问题注意的持续。媒体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如果媒体对问题的注意和持续报道不当，也可能对基层减负增效政策的执行产生阻碍。信息失真或夸大现象可能误导公众，对政策执行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和阻力。媒体的集中报道可能形成舆论压力，使基层单位在执行政策时受到过度关注，影响正常工作的开展。媒体对某些问题的关注可能在其他地区引发模仿效应，导致类似问题的增加，给基层减负增效政策的执行带来额外压力。

3. 大众的支持。大众支持本身是政策执行的重要推动力，但如果处理不当，一些与大众支持相关的问题可能对基层减负增效政策的执行产生阻碍。大众可能因为信息获取不全面或误解，对政策有不切实际的理解或期望，导致在政策执行中造成不必要的摩擦和阻力。如果大众对政策的参与度不足，可能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支持和监督，影响政策执行的质量和效果。

4. 立法机关的支持。在我国，立法机关的支持对于基层减负增效政策的执行具有保障作用。立法机关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为基层减负增效政策提供法律基础和保障，确保政策的合法性和权威

性。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或政策指导，明确基层减负增效的目标、原则和措施，为政策执行提供方向。立法机关对政策执行的监督和评估，确保政策得到有效执行，并及时调整和优化政策措施。立法机关制定明确的政策执行标准和程序，指导基层单位规范执行政策。因此，立法机关的支持不应成为制约基层减负增效政策执行的因素。

5. 执行人员的热忱与领导水平。执行人员的热忱和领导水平对于基层减负增效政策的执行至关重要。然而，如果这些因素处理不当，也可能成为阻碍。领导如果缺乏热忱和必要的领导力、决策能力或对政策理解不深入，可能无法有效指导和激励团队，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执行人员如果缺乏与其他部门或团队的协调能力，可能会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沟通不畅和合作障碍。如果执行人员过分依赖领导的指导而缺乏自主性和创新性，可能会在领导决策迟缓或缺失时导致政策执行停滞。

综上所述，包括可资利用的理论与技术、政策本身含有充足的因果论和立法机关的支持、目标群体基数大、目标行为的多样性、明确的政策指令等13个因素均制约着基层减负增效政策执行。

### 三、消解基层减负增效政策执行阻滞的调适策略

作为一项全国性的重大改革，基层减负增效政策旨在通过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创新措施，实现基层治理的优化。尽管我们拥有坚实的理论和技术支撑，以及清晰的政策逻辑和立法支持，但政策执行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面对庞大的目标群体和多样化的行为模式，需要更为细致的执行指南和充足的资源保障。此外，基层执行机构亟需加强力量，并建立起跨部门的协同机制。统一不同部门的规章，确保执行人员能够准确理解和执行政策。同时，经济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媒体的积极作用以及监督机制的完善，都是确保政策顺利执行的关键因素。

#### （一）明确细化政策目标，构建完善的政策执行机制

在政策执行的实践中，国家层面制定的政策需经历省、市、县、乡四个行政层级的传递与执行，每一层级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对政策目标进行调整，从而产生政策效果的加强或减弱。冲突通常体现在政策参与者各自拥有明确的政策目标，但這些目标之间彼此难以相容或无法达成一致<sup>[14]</sup>。因此，地方政府在响应中央政策时，应深入分析政策的不同特点，明确细化基层减负增效的具体目标，并基于此构建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政策从中央到基层的传递过程中，由于层层叠加的目标，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信息的扭曲或失真。构建一个健全的政策执行框架对于减轻基层行政负担和增强治理效能极为关键，可以借助中央临时工作领导小组的机制，加强对政策执行的监管和促进。这种临时性工作组作为党和国家之间的桥梁，具有强大的政策推动力和协调能力，不仅能够确保政策信息的准确传达，还能降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摩擦成本。同时，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和特点，地方政府应发挥其多维度的治理能力，针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差异化措施。鼓励地方政府在遵循中央政策导向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适应性调整，确保政策目标能够有效指导基层减负增效的工作实践，成为推动工作进步的有力工具。

#### （二）扩大政策资源配置，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确保政策执行成功，充足的资源保障至关重要。面对基层减负增效政策在资源获取上的局限性，首要任务是拓展资源供应的途径。在遵循国家财政资金使用规定的前提下，应改变以往上级直接为基层项目提供资金的做法，赋予基层更大的资金规划和调配自主权。此外，考虑到一些地区财政基础薄弱，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成效，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由上级政府加大对发展滞后地区的支持力

度，确保这些地区在政策执行上能够得到必要的资源保障。解决资源短缺问题，不仅要“开源”，即增加资源供应，还要通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来“节流”。应当加快智能化基层建设的步伐，打造一个覆盖市级、县级、街道（乡镇）以及基层的全面信息管理平台，确保数据的互通有无和资源的共享利用，降低不同机构和层级间信息的不均衡，进而使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能够更高效地投入到提升基层效能和减轻负担的工作中。通过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政策资源，能够为基层减负增效政策的顺利执行提供有力支持。

### （三）明确政府间职责界限，优化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

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基层自治机构面临着一定的行政负担和治理职责。为了减轻不必要的负担，将这些压力和责任转化为积极的治理动力，关键在于明确各级政府间的权责界限，改善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关系，实现基层减负的目标。例如，象限治理是一种类型学分析下的分类治理，强调通过对基层政府面临的各种治理事项划分类别、分析属性、排列有序，来明确政府职责、协调部门行动、规范政策执行，协调上下级政府之间、职能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化解基层治理中的模糊化和碎片化难题<sup>[15]</sup>。首先，必须明确划分各级政府机构的职责和权限，防止行政负担由高层向基层逐级累积。应建立和优化政府部门的纵向权力清单，以确保行政任务在明确的政策指导和权责界定下有序进行。其次，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打破横向沟通的障碍，消除因信息孤岛导致的多头管理问题，实现从“上层多线指挥，基层一线执行”到“上层统筹协调，基层灵活应对”的转变。最后，优化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合理下放基层的事务权和财政权。在政府将行政事项委托给基层居委会的情况下，必须提供相应的财政支

持，既避免因收支不平衡导致基层治理动力不足，又能够通过项目经费促进基层与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的有效合作，激发基层治理的创新和活力。

### （四）强化激励与约束体系，提升执行团队的行动力

要充分激发执行人员对基层减负政策的积极性，必须通过激励与约束的双重机制，实现内在动力与外部制度的和谐统一。善用 KPI 进行公共政策评估，形成对政策执行者的激励约束机制，将战略目标置于政策评估的核心，能够发挥战略导向的牵引作用<sup>[16]</sup>。这意味着，一方面要响应基层政府人员对政策执行的合理需求，对其在政策框架内的创新给予奖励；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约束来明确违规的后果，引导基层政府人员正确理解基层减负政策的价值，从而提高执行效率。在激励机制的构建上，要深入理解并尊重基层政府人员的利益需求，让他们意识到基层减负政策的执行是政府、基层和社会各界共同协作的结果，而非简单的责任转移。将减轻基层负担的任务纳入干部考核和工作述职评价体系，对日常工作和阶段性成果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估，加强制度的约束作用，严格遵循纪律要求。同时，对基层政府人员的考评还应结合基层居委会的反馈，采用逆向化考评方法，即通过基层对政策执行效果的满意度来评价工作绩效，确保政策执行既符合制度要求，又得到基层的广泛认可和支持。通过激励与约束的双重机制，可以确保基层减负政策得到有效执行，同时提升基层政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

### （五）提升政策执行生态，促进社会多元力量的协同参与

基层减负增效改革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向多元共治转型的关键步骤，其参与者自然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在执行这一政策时，应广泛吸引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首先，基层社会组织在推动基层

自我管理和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必须增强对社会组织在登记管理、人才招聘、资金募集、信息获取和政策宣传等方面的扶持力度,鼓励并支持它们在基层减负增效工作中持续贡献力量,并维持其参与的积极性。其次,基层居民是推动居民自治的核心力量,基层减负增效政策的有效执行依赖于他们的主动参与,应重视并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完善,确保党组织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群众路线,发挥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党员的榜样作用,激发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最后,建立一个有效的公共意见反馈平台,增强居民的信任感,提高他们参与基层治理的意愿。通过党政组织的推动,各级政府的响应,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支持,形成一个广大居民群众积极参与的良好局面,确保基层减负增效政策得到高效而有力地执行。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4-07-19(01).
-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1).
- [3]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9.
- [4] 秦荣生.政府审计新领域:经济政策执行效果审计[J].当代财经,2011(11):112-118.
- [5] 刘鹏,刘志鹏.街头官僚政策变通执行的类型及其解释——基于对H县食品安全监管执法的案例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4(05):101-105.
- [6] 杨宏山.政策执行的路径——激励分析框架:以住房保障政策为例[J].政治学研究,2014(01):78-92.
- [7] 陈水生.项目制的执行过程与运作逻辑——对文化惠民工程的政策学考察[J].公共行政评论,2014(03):133-156+179-180.
- [8] 齐子鉴.组织化治理:基层督查领域“减负”梗阻的消解[J].党政研究,2019(05):113-121.
- [9] 黄建红.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政府农业政策执行困境与破解之道——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分析视角[J].农村经济,2018(11):9-16.
- [10] 葛新斌,张玲.我国减负政策执行阻滞及其对策探析——基于“马-萨模式”的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2019(02):1-7.
- [11] 通过清理推动法规文件减量提质增效[N].人民日报,2019-04-12(01).
- [12] 王琦,孙少龙,高蕾.减负增效强基层轻装奋进新时代[N].人民日报,2022-01-14(01).
- [13] 孙少龙,王琦,高蕾.除“指尖”之苦减基层之负[N].人民日报,2021-06-21(01).
- [14] 胡业飞,崔杨杨.模糊政策的政策执行研究——以中国社会化养老政策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15(02):93-105+157.
- [15] 周振超,黄洪凯.象限治理:应对基层治理模糊性和碎片化难题的策略选择[J].理论与改革,2022(03):70-82+153.
- [16] 温美荣,马若熙.构建公共政策评估的关键绩效指标体系探析——以X市试行众创空间绩效考评制为例[J].行政论坛,2017(03):93-99.
- [17]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EB/OL].(2019-03-11)[2021-09-24].[http://www.gov.cn/zhengce/2019-03/11/content\\_5372964.htm](http://www.gov.cn/zhengce/2019-03/11/content_5372964.htm).
- [18]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1-07-12(01).

责任编辑:陈琴容

# 方向、规律、方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理论

杨江南 焦奕婷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 正确方向作为改革之“正”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遵循, 基本规律作为改革之“本”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逻辑, 科学方法作为改革之“道”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深刻领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基本规律及其科学方法, 对我们学习与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无裨益。

**关键词:** 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式现代化; 科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4)06-45-7

“明方向、悟规律、学方法、增智慧”是将党的兴党本领、强国本领深入贯彻落实到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当中的重要环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境与新挑战进行了深入剖析, 进一步明确了“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sup>[1]</sup>2的目标任务。作为中国“三大里程碑”<sup>[2]</sup>721和世界“最成功的发展样板”<sup>[3]</sup>的深化改革, 是自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觉醒、投身报国救民以来的“三大历史性事件”<sup>[2]</sup>721

之一, 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情况下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sup>[4]</sup>4, 是顺应“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sup>[5]</sup>14的强国道路, 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胜法宝”, 是新时代中国建设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sup>[6]</sup>399, 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动力”<sup>[7]</sup>, 具有深厚的科学理论基础。从中国改革发展史来看,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深入而全面的社会变革过程, 是基于当前世情、国情、党情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2023ZD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江南,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焦奕婷,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一、以正确方向为改革之“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遵循

变革不是变色，改革不是改向。改革不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sup>[8]</sup>，而且本质上是“更加大胆的改革开放的创新”及“更有力的改革开放的举措”<sup>[9]160</sup>的伟大社会实践，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

《决定》指出：“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sup>[1]2</sup>“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突显了改革在中国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紧紧围绕”则精准地勾勒出全面深化改革在新时代背景下所需聚焦的关键任务与前进方向。

### （一）改革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

40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确保改革沿着既定的目标稳步向前。习近平总书记重申，改革的重点在于“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sup>[4]18</sup>，这关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性问题。其一，改革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直接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发展方向及最终成败。《决定》指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改革开放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必须贯彻的六大原则之一，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sup>[1]37</sup>。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健全巩固了贯彻落实党的全面领导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制度、具体政策制度，引领实行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改革，确保我国改革道路重心不偏、力度不减、步伐不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深刻认识到“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sup>[1]5</sup>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的根本力量，确保党为改革“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sup>[10]</sup>。其二，改革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政治方向。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sup>[1]5</sup>是贯穿中国改革理论与实践始终的主线，

是保证改革方向的正确性和连贯性的压舱石。《决定》进一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工作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sup>[1]3</sup>。这一目标是为了确保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行稳致远，而并非盲从外界的认可或简单吸收西方理论和观点。对于触及底线、动摇基础的改革，“不能改的”坚决不能改，绝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无法挽回、无法弥补”<sup>[5]68</sup>的颠覆性错误，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 （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进行时”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sup>[1]2</sup>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党领导全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1]2</sup>的关键引擎。“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sup>[1]13</sup>我国46年的改革史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sup>[5]161</sup>，这无疑证明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sup>[1]2</sup>，是不同阶段涉及领域的不同，更是时代背景、实践要求、人民期待三者交互作用的集中体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决策，毅然决然地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尤其聚焦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不仅揭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更标志着我国发展迎来了历史性转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迈入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纪元，通过一系列战略部署，特别是围绕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系统全面地规划了改革的宏伟蓝图，引领国家踏上了深化改革、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新篇章。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一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变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突出改革重点，把牢价值取向，讲求方式方法”<sup>[8]</sup>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是阶段性的“完成时”，是发展历程中的

“进行时”，是渐进改革的必然结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与时俱进。我国46年的改革创新实践，始终坚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范本，这一实践范本不仅影响了中国，更产生了如马丁·雅克所言的“催生了当代人类历史上最巨大的社会变革，甚至也堪称是迄今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巨大世界影响。

## 二、以基本规律为改革之“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逻辑

规律是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规律是客观存在着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确立，有着必然逻辑，体现了历史必然性。习近平提出：“必须加深对改革发展基本规律的理解和掌握”，这不仅是对“处理好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sup>[4]48</sup>的一种重要创新举措，更是对“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sup>[4]37</sup>的精辟见解，为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sup>[1]3</sup>更好相适应，总结提炼改革发展更深层次的基本规律提供根本遵循。可以说，我国的改革发展实现了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驾着船过河”的历史性跃进。

### （一）“六个坚持”重大原则规律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sup>[1]2</sup>，必须秉持“六个坚持”的改革重大原则。习近平指出：“要加深对改革规律的理解，根据时与势的变化不断完善，在处理现实难题中进一步深入，使改革发展越来越符合实际、适应社会进步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期待。”<sup>[12]107</sup>《决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吸收和运用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落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

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等重大原则。这“六个坚持”重大原则，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改革规律的不懈深入探究与系统把握，对于我国持续深化全面改革、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科学引领和战略指导价值，增强了改革的预见性和主动性。具体来看，“六个坚持”重大原则始终紧紧围绕“党的领导规律”“历史发展规律”“动态辩证规律”“科学思维规律”这几个方向展开。“党的领导规律”就是要不断完善党的领导，让其与实践、时代、人民的要求相适应。实质上与“三个符合”规律一致，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历史发展规律”也就是坚持习近平关于“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sup>[13]</sup>的理念，科学把握不同发展时期国家改革战略思路、改革工作侧重点、改革实践内容的内在连续性，总结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探索以来取得的成功经验，更好地用来指导我国实践。

“动态辩证规律”就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sup>[14]</sup>事实上，改革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或核心议题有所不同，需要及时调整改革政策使之与社会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科学思维规律”是从“加强对跨区域跨部门重大改革事项协调”<sup>[15]</sup>开始，到“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重要方法”，到“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推进改革”<sup>[16]</sup>，再过渡至“注重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sup>[15]</sup>的改革方法，能够确保各项改革政策进一步走深、走实、走稳。

### （二）“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互动规律

推进改革实践发展和实现改革理论创新都需要深刻把握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规律。中国的改革实践，其鲜明特点就在于脱离了过去既定思维模式与传统理论的思想束缚，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

际,实现“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sup>[1]2</sup>,秉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恪守勇于实践、敢于直面真理的勇气。从本质上讲,这是在改革中自我学习、自我完善、自我革命的过程,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改革规律性的认识,是从“必然王国”的束缚向“自由王国”的迈进。习近平强调:“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干过,只能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sup>[4]34</sup>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我国历经46年的改革实践,实质上就是持续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互动,遵循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路径,在全面推动改革实践历程中根据“不断探索规律、深化认识、凝聚共识、科学决策”的渐进过程,逐步地揭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一系列内在科学规律,并在对改革规律性的整体认识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实践证明,深刻把握改革发展的规律就是要“勇于突破思想束缚,打破利益固化壁垒,深入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不惧风险,坚决革除体制机制中的顽疾”。然而,意识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视或忽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和把握改革规律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我们在改革的浪潮中持续探索、反复验证、系统归纳,不断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提炼出更为深刻、全面的见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互动规律,彰显“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sup>[13]407</sup>之风,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伟大改革事业。

### 三、以科学方法为改革之“道”: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充满了辩证法精神。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

“最锐利的武器”<sup>[17]113</sup>,不仅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中一贯倡导和坚持的”<sup>[4]207</sup>看家本领,更是指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法论。深刻把握其中所蕴含的“守正”与“创新”、“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之间的辩证关系,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 把握好“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我们党重要的“创新思维方法”<sup>[18]228</sup>和“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sup>[19]</sup>,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大原则之一。“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实质上包含“破”与“立”的辩证统一,既要“破”教条主义,“立”思想解放,又要“破”因循守旧,“立”体制新构,在“破立并举、先立后破”<sup>[1]2</sup>的辩证统一中推进改革事业向前发展。可以说,弄清楚“不改什么”“改什么”的问题就是改革的关键。

“守正”就是要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舵”。“守正”意味着改革要始终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改革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始终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正确方向,始终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总目标。习近平指出:“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sup>[8]</sup>这是改革“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突出表现。《决定》指出,“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实践证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关键在党”。当然,“守正就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sup>[20]377</sup>,尤其是唯物辩证法,它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工具,确保改革始终沿着科学的轨道前行。志不

改，道不变，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sup>[4]35</sup>

“创新”有助于攻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娄山关”。“创新”意味着敢说新话、办新事。习近平深刻论述了创新与发展之间的本质联系，抓创新即抓发展之根本。《决定》所提出的核心理念、关键战略安排、重大改革方案，集中体现了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深化了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创新不仅是社会进步的关键驱动力，也是全面深化改革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纪元，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每一次重大的进步和变革，都是改革创新精神的具体体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必须以创新的精神走出一条新路，必须用创新的行动谱写新的篇章。正如习近平所说：“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sup>[4]3</sup>

（二）把握好“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辩证统一

目标是行动的指南，问题是突破的方向。习近平指出：“坚持目标导向是对我们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总结，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sup>[21]312</sup>换言之，“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结合是中国渐进式改革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的重要经验。

“目标导向”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方向。目标是引领全局的核心要素，它站在战略性的高度为深入且全面地推进改革进程提供方向性指导。习近平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锚定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sup>[8]</sup>“目标导向”是我国改革渐进式实践的核心特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制度治理现代化”的新理念，明确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全面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标志着中国在完成总任务的新征途中迈出了重要一大步，它不仅意味着中国体制层面的巨变，更是我国治理效能与现代化水平跃升的重要战略举措。《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目标与长远规划，在于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现代化迈进，确保中国渐进式改革目标的正确性和连贯性。改革 46 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制度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基石，是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正是通过牢牢把握制度改革创新与定型完善的核心使命与关键环节，改革开放事业不仅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广阔前景，而且卓有成效地推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问题导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动力。理论要有直面现实问题的自觉意识。所谓“问题”就是“这个时代的口号，就是时代的声音”<sup>[22]235</sup>。中国共产党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来“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sup>[23]497</sup>。“问题导向”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改革与创新实践的“指南针”和“核心动力”，是深入剖析问题本质、精准定位问题症结、有效解决问题的关键。“备豫不虞，为国常道”<sup>[24]194</sup>，中国共产党拥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问题意识。具体来说，针对诸如“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等教育领域的顽疾，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针对“立案难”等司法领域的突出问题，改革人民

法院案件受理制度；针对办事难等问题，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改革等，这一系列改革举措无不体现“在是否解决了突出问题上下功夫”<sup>[25]</sup>的改革方法论。《决定》明确了“为什么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怎样以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推进改革并解决实际问题是多维度治理框架的核心所在，旨在系统地应对一系列关键挑战，包括“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问题、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热点问题、民生方面的难点问题、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各领域的风险问题”<sup>[26]</sup>。改革应当既全面覆盖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各项主要问题，又要聚焦于经济体制这一关键领域，力争破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与结构性矛盾。可以说，“问题清单”亦是“改革清单”。

（三）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辩证统一

“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深刻践行与理论拓展，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领导方法。习近平指出：“只有坚持重点论和全面论的统一，才能做到既兼顾全面，又善于抓住重点。”<sup>[27]</sup><sup>18</sup>换言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原则。

“整体推进”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目标。“整体推进”是在全局范围内进行系统性规划，力求有效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进一步深化全面深化改革涵盖了多个关键领域，呈现了多面同时发力、多点同步突破和纵深向前推进的强劲发展态势。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渐进式改革之路达到新的“进行时态”，突出表现为渐进式改革的“整体性”趋势。具体来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性”既体现在与党的历届三中全会改革总目标一脉相承，推进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又体现在改革任务的广泛性，不仅包括“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还包括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方面的任务。换言之，“整体推进”全面覆盖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史上的突出问题。改革开放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运用系统思维来规划并推动改革进程，强化对未来趋势的前瞻性考量，从整体大局出发进行周密策划，制定战略性布局，确保各项改革措施协同并进、整体推进。在此过程中，尤为重要的是要清晰梳理改革逻辑链条，确保各项改革方案之间相辅相成，以确保改革目标的全面实现，鼓励在条件成熟的地区与领域内实施综合性改革试验，明确改革的阶段性目标、详细路径图及优先级顺序，致力于在显著提升改革整体效能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与积极成果。

“重点突破”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考量。“重点突破”聚焦于抓住主要矛盾，要求精准定位那些能够牵引全局、亟待攻克的关键问题，并集中资源实施针对性的策略措施，以有效破除改革进程中的主要障碍，为解决问题找到最有效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从而降低改革的复杂性与难度。习近平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sup>[8]</sup>这一论断不仅为我国进一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明确主攻目标方向，还提供了系列重要决策思路和思维方法。现如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广度与深度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决定》分析论证了当前宏观形势变化与制定长远变革目标规划之间复杂的关系，合理调控改革的强度与节奏，并准确识别出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sup>[13]</sup><sup>23</sup>。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将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作为重点突破环节，集中力量推进对于改革结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四梁八柱”。实践证明，唯有通过准确识别“重点领域、重点任务、重点问题”的关键切入点和突破口，才能有效地抓住改革问题的“牛鼻子”<sup>[13]</sup><sup>23</sup>。此外，还要注重关键的责任主体、实施

环节及时间节点。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通过关键领域的改革来引领整个局面的发展，防止和克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sup>[8]</sup>的现象，确保改革各要素间形成合力，力求达到“一子落而满盘活”<sup>[28]79</sup>的联动效应。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2]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3] 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故事——改革开放四十年世界回向[N].人民日报，2018-12-18(01).
- [4]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7] 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J].求是，2024(10)：4-15.
- [8] 习近平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强调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N].人民日报，2024-05-24(01).
- [9]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 [10] 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海南日报，2018-04-14(04).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4.
-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07.
- [13] 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N].人民日报，2020-12-01(01).
- [14]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24-07-22(01).
- [15] 习近平.巩固良好势头再接再厉乘势而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N].人民日报，2014-12-31(01).
- [16] 习近平.坚定改革信心汇聚改革合力，推动新发展阶段改革取得更大突破[N].人民日报，2020-12-31(01).
- [17] 张开.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物谱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8] 胡明艳.坚持创新思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19] 习近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J].求知，2023(10)：4-6.
- [20]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21]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文集(202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2]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23]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24] 习近平讲故事(第二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5] 习近平.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扎扎实实把改革举措落到实处[N].人民日报，2015-08-19(01).
- [26] 征求对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意见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N].人民日报，2024-07-20(01).
- [27]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 [28]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兰丰丰

# 中国式新发展格局的内在机理与形成逻辑

张峻哲<sup>1</sup> 钱周伟<sup>2</sup>

(1. 西安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2.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 北京 100091)

**摘要:** 中国式新发展格局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机理, 主要有: 马克思经济循环理论体现新发展格局的循环特质;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体现新发展格局的过程特质; 马克思社会总产品实现理论体现新发展格局的转化特质;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体现新发展格局的世界特质。中国式新发展格局有着“经济新常态—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推进新质生产力”的科学演进逻辑, 主要体现在: 立足经济新常态把我国推向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要求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高效聚合推动新发展格局稳步构建—中国式新发展格局开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关键词:** 中国式;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4)06-52-7

## 一、引言

中国式新发展格局是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下简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核。近年来, 国际形势与世界格局不断发生变化, 发展中国家综合实力的大幅跃升与老牌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维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多种逆全球化衍生主义影响日趋加重, 我国政治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党的十九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全球政治经济新态势和我国发展新变化, 审时度势、主动出击, 大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这是重塑我国经济发展新动力与国际竞争合作新动能的战略抉择, 也是在科学把

握经济新常态、新发展阶段和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 把握好历史发展机遇, 更好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

2020年4月10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新发展格局”这一概念。<sup>[1]</sup>5月2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联组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 逐步形成……新发展格局”<sup>[2]</sup>, 强调了经济运行各领域通力配合的重要性。7月2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sup>[3]</sup>进一步指明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作者简介:** 张峻哲, 西安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国家与社会治理、基层治理与区域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 钱周伟, 法学博士,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助理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发展。

的核心要求。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sup>[4]</sup>，进一步强调了国民经济循环的主体地位与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同时也强调拒绝封闭，要“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sup>[4]</sup>，厘清了国内国际双循环之间的关系。此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把新发展格局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一。<sup>[5]</sup>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个明确”之一就是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sup>[6]</sup>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sup>[7]</sup>，将我国当前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串联起来，形成了更为完备统一的新时代经济发展理论体系框架。

从党历年来的政策方针出发，不难发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新时代党和人民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康庄大道的必然选择。因此，对其正确认识与剖析是至关重要的。追根溯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机理必然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遵循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内涵。就其发展而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核构成，助推我国政治经济学创新成果进一步丰富凝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发展的理论在21世纪的最新飞跃。

## 二、内在机理：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内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中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循环运动，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科学地将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经济循环、社会扩大再生产、社会总产品实现、资本国际化运动与世界市场的运转深度结合在一起。

### （一）马克思经济循环理论：新发展格局的循环特质

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sup>[8]699</sup>，形成经济循环过程。同时，消费、分配、交换在某些层面也反作用于生产，对经济循环造成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资本循环理论“ $G-W(A+Pm)\cdots P\cdots W'(W+w)-G'(G+g)$ ”阐明了个别资本循环与社会总资本流通之间的关系，“购买—生产—销售—购买—扩大再生产”的实质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以完成“商品的惊险的跳跃”为目的，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不断扩大的社会大生产之间的固有矛盾使得这样的经济循环具有天然的弊病与隐患。“如果资本在货币资本阶段停顿……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在生产资本阶段停顿，生产资料将被搁置，劳动力将会失业；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sup>[8]13</sup>个别资本循环的完成取决于许多串联或并联的其他资本循环的共同完成，任意环节出现问题都会使循环中断。国家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提高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源的运用，不断进行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不断完善生产经营制度，以便于资本集聚来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保障周而复始的经济循环畅通无阻，这符合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因此，必须不断提升科技水平以提高生产力水平，在合理的生产结构内以适宜的速度进行生产，妥善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加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提高供给质量，促进经济发展“脱虚向实”，实现国家社会供需总量的动态平衡，进而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

## （二）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特质

马克思指出资本流通过程与物质资料生产总过程的协同并联蕴含着社会再生产的运转逻辑，资本主义为实现价值增值依次完成购买阶段、生产阶段和销售阶段的价值运动即资本流通过程，原材料、场地及工厂、机器与设备、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的运动实现即物质资料生产总过程。社会再生产理论极度重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的交互稳定性与递进科学性。生产的减少直接影响消费的水平 and 程度，当消费锐减到一定程度时，扩大再生产就会丧失发生的先决条件，交换过程就难以维系，资本和物质之间的相互转化相应地走向停滞。“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然也经历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资本流通过程和物质资料生产总过程，这就要求以国内大循环的比较优势强化对全球资源的竞争，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多维市场与资源，把稳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的发展之“舵”，进一步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使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内有机衔接，完成循环流转，这也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内在要求。

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有机统一的，国内循环是基础和主体，国际循环是补充、扩展和延伸，两者共同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实现资本和物质的良性转化。这就要求，生产环节要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资源补充我国生产资料需求，发挥好我国人口资源禀赋，坚持科技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确保全产业链平稳有序运行。分配环节要坚持共同富裕的大局思维，确保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公平公正，更好解决“蛋糕”分配问题，科学优化一二次分配，疏导配平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

入群体规模，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交换环节要切实提高各生产要素间的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时间和成本，不断完善制度政策，保障流通体系健全健康，营造和谐的流通环境。消费环节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建立健全需求侧管理制度，促进内需稳步合理递增，加快内需体系的整合完善，不断激发国内和 international 的消费潜力，打造优良消费环境，保障产品质量，形成多样化的高级消费格局。

## （三）马克思社会总产品实现理论：新发展格局的转化特质

马克思表明社会总产品是指各物质生产依托的劳动者通常在一年内生产的物质资料总和，并科学阐明生产资料部类 I 和消费资料部类 II 的物质属性与不变资本 (c)、可变资本 (v) 和剩余价值 (m) 的价值属性均为其实质表现。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是指社会总产品及服务的整体实现使用价值的替换与价值补偿，而后再满足货币到新商品的实物补偿，循环往复。因此，“社会总产品—社会资本”的转化实质是 I、II 部类均实现“惊险的跳跃”，即经历“W' (W + w) — G' (G + g)”的过程，然后社会扩大再生产才能得以开启。其中，扩大再生产需要满足  $I(v + m) > IIc$  的先决条件，即要求第一部类 I 在先完成货币贮藏和实际积累的基础上供给的生产资料多于第二部类 II 对生产资料的实际需要，第二部类 II 才能完成积累，具体表现为  $I(v + \Delta v + m/x) = II(c + \Delta c)$ 。同时，I、II 部类的积累必须在各自内部以及它们之间形成比例结构，也就是 I、II 部类的生产实际既能够同时实现内部的价值与实物补偿的替代转换，并满足对向部类的新一步扩大再生产，使得生产资料总需求  $I(c + v + m) = I(c + \Delta c) + II(c + \Delta c)$ 、消费资料总需求  $II(c + v + m) = I(v + \Delta v + m/x) + II(v + \Delta v + m/x)$  都能如期实现，最终社会总产品得以完整实现。

社会总产品与社会总资本的周而复始的流通转化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转化层面的逻辑遵循，社会再生产要求必须在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的矛盾运动中确保社会总产品的进路通畅及再循环稳定，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平稳运转。假若生产资料部类Ⅰ多用于货币贮藏时，生产就会减少，消费资料部类Ⅱ则也会随之萎缩，造成第二部类Ⅱ出现工人失业现象。第二部类Ⅱ可用于购买第一部类Ⅰ的生产资料数量减少，随之导致第一部类Ⅰ供应相对过剩而不得不减产，进一步造成第一部类Ⅰ的工人失业现象。这种收缩性循环往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同理反之，第二部类Ⅱ对于第一部类Ⅰ的生产资料需要增加时，第一部类Ⅰ迅速扩张，其工人数量也会相应增加，使得第二部类Ⅱ扩大再生产也迅速扩张，其工人数量上涨。这种扩张性循环往复会带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繁荣。

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思考就是要让第Ⅰ、Ⅱ部类的积累科学有序，在适应的范围内不断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规模，保障国家就业水平，稳步提高收入水平，合理规范商品价格，构建透明开放的市场环境，吸引多维投资，确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繁荣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坚实的经济保障。

（四）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新发展格局的世界特质

马克思以“六册计划”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中世界市场理论是“六册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市场包含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是随着历史演进发展逐渐形成并始终处在不断变化的动态发展过程中。

马克思认为先有国内市场的不断发展，才有可能形成世界市场的发展，即世界市场是国内市场发展一定阶段后形成的产物，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国内市场的发展为前提条件。同时，国内市场的发展

水平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市场的发展程度。在世界范围内，当一国国内经济社会稳定繁荣发展时，其相对稳定运转、不断扩张的国内市场会驱使其与国外市场交流发展，不断扩大对外经济交往的范围。反之，一国相对落后的国内市场发展则会与世界市场的发展节奏产生严重的排斥，造成孤立。

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以内为主”的双循环思路正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来推动促进世界市场的繁荣稳定发展的中国式实践。构建新发展格局，首先必须拥有强大的国内经济高质量运转体系，这是在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强大竞争力和对国际市场资源配置能力的内核力量。更加流畅稳定的国内市场循环对全球市场资源要素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其能够以自身发展优化世界资源配置，促进世界市场的繁荣发展。因此，在新时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进一步实践丰富，为我国经济社会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开拓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式内循环不断发挥“内需”潜能，构建完备的内需体系，为打通国内国际市场交往建立起更为稳固坚实的桥梁，以积极自信的姿态融入国际循环，彰显了我国参与国际市场合作与竞争的制度优势，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的大国担当，为世界市场繁荣稳定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模式”“中国智慧”。

三、形成逻辑：“经济新常态—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推进新质生产力”的科学演进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过程，经历了多个复杂多变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逐渐完成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的伟大目标，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门以及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之路。经过一个时期潜心砥砺、厚积薄发的艰苦奋斗，我国逐渐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

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sup>[9]</sup>面对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全面“封锁”的国际环境，我国形成了“以国内循环为主、基本自给自足的发展格局”<sup>[10]</sup>。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推进改革开放，针对经济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形成了从农村地区到沿海地区的城市改革思路。同时，对外扩大开放和贸易，采取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国际循环视域及策略，逐步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以及以国际大循环为主、国内循环为辅的发展格局。此后，我国全力投入到国际循环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中去，紧握历史发展机遇，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特快专列”。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全球经济发展严重衰退，逆全球化势头上升，我国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面临严峻挑战。近年来，特别是受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扩散蔓延的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出现更复杂的变化，霸权主义的衰退与新兴国家话语权提升，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进一步抬头，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和走向。党的十八大以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纵观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实际发展态势，改革创新，逐渐把党和国家发展事业的立足点移向国内，开始更多依靠国内市场推动经济发展。从经济新常态到新发展阶段，党和国家不断精准施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运而生，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推向了新高点。

（一）因势利导：立足经济新常态把我国推向新发展阶段

受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影响，世界经济保持缓慢复苏态势，存在大量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新的增长动力源仍不明朗，世界经济衰退严重。在这一大背景下，为使我国经济社会尽早从世界经济危机的漩涡中跳脱出来，党中央针对国内改革和发展的新态势、新情况，综合研判，推行了多项政策用以

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社会稳步发展。2013—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新常态”的概念与内涵。在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消费与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等九个方面的新变化新趋势客观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原因，<sup>[11]</sup>这是关于增速、结构和动力的进一步系统化表述，对新常态进行了完整解读。

“经济新常态”三大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随着政策改革开始蜕变，“三产”发展与消费需求走入经济大舞台中央，城乡区域进一步协调发展，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人民群众，收入与获得感不断提升；三是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随着运转惯性转向创新驱动。从内容上来看，“经济新常态”概念的凝练提出是党中央对经济运行规律新变化准确把握的良好体现，是党中央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将改革的内容和效果有效转化成发展动力的指导理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益复杂，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种子安全、芯片等“卡脖子”问题相继凸显，以工业4.0连接嵌入式系统生产技术和智能生产流程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即将到来，我国主要社会矛盾发生新的转变，党中央从“经济新常态”出发，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接续奋斗，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使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中“实践—认识—新实践”逻辑在我国经济发展领域的新飞跃。

（二）科学指导：新发展阶段要求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对我国经济形势科学预判的前提下，党中央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

重大理论和理念，这是基于对当前我国所处的新发展阶段的认识而得出的。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首次正式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强调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作出了全新总结和概括，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的科学指导原则。

创新是第一生产力，创新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循环的内核与发动机，主要体现在科技、组织和制度以及政策等方面的开拓创新。创新能够加强经济发展动力的补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凝聚成经济循环新的强大动力统一体，着力化解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矛盾与难题，提高发展效率。协调发展理念主要是解决新发展阶段的不平衡问题，即化解结构性矛盾，确保局部发展和总体发展的适应协调，局部难题和总体难题的有效应对，局部工作和总体任务的全面兼顾。绿色发展理念强调的是新发展阶段中处理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问题，着力推动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统一，形成绿色低碳、节约适度、文明健康的发展模式，大力提高发展的资源利用率。开放发展理念是在新发展阶段对我国改革开放战略要求进行进一步深化，着力解决发展内外联动的问题，把握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两个大局，充分利用好国际市场资源，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努力谱写合作共赢新篇章，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取得世界范围的广泛共识。共享发展理念旨在解决新发展阶段内的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分配问题，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促进全民奋斗与全民共享的有机统一，保障民生问题，大力增进民生福祉。五大新发展理念是面对“经济新常态”提出的有效策略，对新发展阶段全局工作具有科学指导作用。

（三）辩证统一：新发展理念高效聚合推动新发展格局稳步构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一方面印证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深化改革取得的卓越成就，另一方面体现出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我们继续改进生产关系中与之不相适应的部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涵盖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从不同角度、不同维度回答了在新发展阶段内“为什么进一步发展”“为谁进一步发展”以及“怎样进一步发展”的时代之问。虽然五大发展理念的针对性、侧重面与着力点各不相同，但其关于科学发展的核心内涵是高度辩证统一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缺一不可。在五大新发展理念高效聚合作用影响下，主动出击把握我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主动性的议题就应运而生了，这就要求我们立足新发展阶段，敏锐观察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直面各种新的困境与挑战，下好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统筹考虑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战略上布好局，关键处落好子，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稳步构建，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夯实基础，筑牢根基。

（四）踔厉奋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开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其中的规律引领、架构升级与聚合催化使我国经济实力实现了历史性的跃升。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sup>[12]</sup>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和发展要求。<sup>[13]</sup>“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最新议题。唯物史观指出生力力是人类社会运转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这就要求我们要

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高效蓄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破解新旧动能与供需差异之间的痛点难点，大力构建高质量的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开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新时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不竭动力。

#### 四、结语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重要研判和重大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内在耦合、协同发展的科学产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补充与主体优化。越是进入新发展阶段，“质”与“量”、“增”与“减”、“供”与“需”、“稳”与“进”的辩证自洽就越为关键，这就需要我们深刻厘清和把握中国式新发展格局的内在机理和形成逻辑，为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性、全局性、广泛性与前瞻性的发展提供聚合力底蕴与源动力价值。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J]. 求是, 2020(21): 4-10.
- [2] 习近平. 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N]. 人民日报, 2020-05-24(01).
- [3] 习近平. 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07-22(01).
- [4] 习近平.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08-25(01).
- [5]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 (2020-11-03) [2024-06-20].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 [6]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文)[EB/OL]. (2021-11-16) [2024-06-20].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 [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22-10-26) [2024-06-20]. <http://cpc.people.com.cn/n1/2022/1026/c64094-32551700.html>.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 [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6:57.
- [10] 韩文秀.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N]. 人民日报, 2020-12-01(09).
- [1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EB/OL]. (2014-12-11) [2024-06-20]. <https://news.12371.cn/2014/12/11/ART11418295777211338.shtml>.
- [1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 人民日报, 2023-12-13(01).
- [1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4-02-02(01).

责任编辑：郑梅钦

#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 “红绿结合”的生态革命理论

刘晓勇<sup>1</sup> 谢光茹<sup>2</sup>

(1. 宝鸡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宝鸡 721013; 2. 宝鸡文理学院 政法学院, 陕西 宝鸡 721013)

**摘要:** 右翼绿色思潮通过构建环境经济学以及运用科技发明来解决生态危机, 左翼绿色思潮则提出了道德革命、生态无政府主义等生态中心主义解决路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 在批评西方左右翼两种绿色思潮的基础上提出了推翻资本主义并解决生态危机的激进、温和以及“第三条道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解决之道具有“红绿结合”的鲜明特征, 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现代绿色思潮有机结合的产物。

**关键词:**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红绿结合”; 生态革命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4)06-59-9

在当代世界, 生态危机不但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生存, 也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研究者, 基于不同的研究立场和方法, 形成了解决生态危机的左右翼两种绿色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解决之道, 就是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左右翼两种绿色思潮的基础上形成的。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左右翼两种绿色思潮的批判, 对于深刻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红绿结合”的生态革命理论具有重大意义。

### 一、生态危机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解决

当代资本主义右翼学术圈存在一个普遍的认识, 即资本主义发展存在“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 趋向。这种观点认为, 生态危

机给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提供了契机, 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发展环保科技、调整财税政策和开展政府间合作在体制内解决生态问题。对这种错误论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予以坚决批驳。

(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环境经济学的批判  
右翼学者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依据即所谓的“环境经济学”(Environmental Economics)。环境经济学的一个普遍假设是, “只要在经济决策中赋予环境适当的价值, 环境就能得到更好的保护。”<sup>[1]18</sup> 对西方生态经济学家而言, 不管是水、空气、森林、土壤、矿产还是能源, 只要能把它们放在自由市场上交易, 市场的价格调节功能就能够使这些资源得到最高效率的利用, 就

**作者简介:** 刘晓勇, 博士, 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研究方向: 中国党史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谢光茹, 宝鸡文理学院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会起到最大限度保护资源的效果。反过来说，一切环境污染，不管是矿产资源过度开采还是水资源的过度污染，都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如果资本主义能够建立起包括清新空气、清洁水源、整洁环境等所有生产要素的自由交易市场，就完全能够通过市场交换的内在机能迫使企业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把生产的环境成本内在化，而不是去污染周边的环境。通过这样的方法，当代资本主义的“环境经济学家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将生态资产转化成可以销售的商品”<sup>[1]19</sup>。为了给自然资源进行适当估价，资产阶级学者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快乐估价法”“随机估价法”等等，目前比较通行的办法是由资产阶级政府买卖“污染许可证”。这种污染许可证制度首先通过设定一定幅度的整体环境污染水平，为每个行业和企业规定最大污染数量值，当生产企业通过某种手段有效降低对周边环境的污染，就可以将这些减少的污染量出售给政府，而那些污染物排放超过政府规定标准的企业就需要向政府交纳相应的污染税，这种在企业之间形成的竞争关系就能有效降低工农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

对于建立资本主义环境要素市场的做法，大部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都持否定态度，这其中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反驳最为系统。在福斯特看来，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自然生态是无价的，用自由市场来为生态资源估价，实际上是将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生态环境割裂成一个个不相统属的独立个体，这本身就否定了自然而不是保护了自然。福斯特借用著名绿色分子舒马赫（Ernst F.Schumacher）的观点指出：“试图度量不可度量的东西是荒谬的，并且（经济学家们）设置的详尽方法不过是从预想好的概念转到了从前的结论上，人们为了获得预期结果（把部分环境简化成商品价值）所做的一切，就是对不可度量的成本和效益计算出适当的价值。”<sup>[1]25</sup>在福斯特看

来，将生态资源纳入自由市场，实际上是鼓励用资本增值的原则来对待自然，而不是用尊重生态规律的态度来对待自然，这种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只能和保护生态的初衷南辕北辙。将自然资源纳入自由市场的范围，本质上是资本扩张的阴谋，是将资本家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合法化，给了资本垄断自然资源的特权而杜绝了劳动者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道路。

##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科技革命论的批判

在右翼理论家看来，依靠科学技术改善生态环境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因为，科学技术是“解决问题的王牌，这张王牌使它们在促进环境改善的同时也能增加财富（即增加资本和消费）”，因而“技术的魔杖最受欢迎”<sup>[1]86-87</sup>。福斯特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全面研究，认为右翼理论家们依靠科技进步化解生态危机的方法貌似合理，实际上根本行不通，其原因早在19世纪就已经被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所阐明。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在系统研究英国煤炭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现了被后世称为“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的经济现象。杰文斯在其《煤炭问题》一书中解释道：“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比如煤炭，只能增加而非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因为效益的改进只会导致生产的扩大。”<sup>[1]88</sup>对此现象，杰文斯通过实证的数据分析得出原因，“如果鼓风高炉的煤耗与生产相比趋于减少，那么贸易的利润将会增加，新的资本将投入其中，生铁的价格下降，需要就会增加，结果更多上马的高炉最终会超出每一种降低了的产品消费。”<sup>[1]88-89</sup>生产和消费因为科技进步而导致的进一步扩大最终会抵消技术创造给生态带来的好处，转而导致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福斯特认为，在当代工业社会中，“杰文斯悖论”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为普遍，在因技术改进和能耗

降低促成生产扩大化过程中，环境污染不但没有被遏制，反而以加速度愈演愈烈。当代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体普遍通过技术进步的方式来降低能源消耗的办法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环境危机更加严重。

在对右翼理论家利用科技应对生态危机的批判中，戴维·佩珀（David Pepper）与福斯特遥相呼应。如果说福斯特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的实际使用效果上，戴维·佩珀则对狭隘的技术中心论提出了批判。所谓技术中心论，在戴维·佩珀看来，就是“承认环境问题，相信通过技术会解决这些问题并达到无限的物质增长”<sup>[2]336</sup>。戴维·佩珀认为，近代科学技术的最大特征，就是把整个世界二元化为人和自然，把自然机械地分割为不相联系的个体。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在征服自然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就是因为它擅长把不相联系的自然个体用数学的方法进行归纳和演绎，进而发现自然运动的机械规律，从而为大量创造物质财富铺平了道路。技术中心主义是一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它把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生态联系解读成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把自然事物之间的关系解读成物质个体的机械关系，不但忽视了人与自然共处于生态环境之中的有机联系，也忽视了自然物质之间的有机生态关系，正是技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将资本主义的生态治理引向歧途。戴维·佩珀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政治精英们正是利用科技专家所具有的理性力量来辅助他们的决策，利用科学技术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威信来赋予决策以合法性。比如在英国，政府官员为了大规模发展核能，会赤裸裸地说：“我们已经做出了决策，现在，让我们找一些科学家来创设出证明此决定的科研成果吧。”<sup>[3]332</sup>正如法兰克福学派著名思想家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所认为的那样，资本家完全可以通过控制科技专家的方式实现扩大生产而罔顾污染环境的事实，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科学技术

不仅没有使人脱离蒙昧，反而使人重新坠入蒙昧的深渊。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批判

右翼理论家坚持新马尔萨斯主义（Neo-Malthusianism）的立场，认为生态问题的决定性原因是人口过度增殖，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增殖是生态恶化的罪魁祸首，完全忽视了隐藏在生态危机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美国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哈丁（Garrett Hardin）提出了著名的“公地悲剧”理论。哈丁假设了一个公共牧场，认为如果牧人不断增加草地上奶牛的数量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结果就会出现奶牛相对于牧草的过剩情况，由于有限的牧草不足以供养无限增多的奶牛，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牧场生态遭到毁坏。哈丁认为，悲剧是财产权不能清晰界定的结果，公众利益要想得到保障，必须通过自然和社会资源的私有化改革来对个体的损害行为进行有效限制。哈丁的这一理论实际上把生态危机的责任推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受害者身上，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各国拒绝给予第三世界国家援助的理论依据，是一种带着生态面具的法西斯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新马尔萨斯主义展开了严肃的批判。对于右翼理论家坚持认为的“人口过剩”造成生态危机，佩珀提出疑问：谁是多余的人？多余的人“当然不是我们，因而必定是他们——移民工人，少数民族、第三世界的饥饿民众”<sup>[4]14</sup>，这反应了资产阶级生态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佩珀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稀缺不是绝对稀缺而是相对稀缺，资本主义完全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以及其它手段创造替代品，但是资本主义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工业预备军”的大量存在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必要前提。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认识到，马尔萨斯所论述的人口过剩是相对于粮食

的过剩，但是实际上仅是相对于资本的过剩。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人口之所以过剩，根本原因只在于私有制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彻底废除私有制，转而实施公有制才能有效解决当代世界严重的人口过剩问题，才能够使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才能够合理运用科学技术充分挖掘自然供养人类的潜力。

根据福斯特和佩珀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在两个方面批判了右翼理论家的新马尔萨斯主义。一是认为新马尔萨斯主义错误地坚持了机械唯物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就环境问题看环境问题，忽视了环境问题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他们没有看到特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在中介人类与自然关系上的极端重要性，坚持的是一种机械的自然环境决定论，而不是一种人与环境辩证协调的共同发展论。二是认为环境主义者犯了反历史主义错误。环境主义者不愿意把资源枯竭这个问题放在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关系中来论述，他们把资源枯竭看成是一切社会制度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实际上，资源枯竭的程度在不同社会制度当中是不同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资源短缺现象主要不是自然资源本身的不足，而是由于社会不公正所导致的商业垄断和分配不均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所面临的生存的自然极限，其实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中，如资本主义，人类生存的自然界限很快到来；在另一种社会制度中，如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人类生存的自然界限可能会无限制地向后推移。

## 二、绿色思潮也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

与右翼理论家相反，西方绿色思潮作为左翼理论的代表，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是生态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是西方绿色思潮又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有所不同，仅仅是在生态危机的表象上看待

生态危机，没有深入到社会制度的层面去看待人对自然的影响，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西方绿色思潮持批评、引导和改造的立场。

###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

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是所有绿色分子高举的一面大旗。生态中心主义否定人类在生态圈当中的特殊地位，主张人类应该顺应自然原则来生活。在生态中心主义的基础上，西方绿色分子提出了经济学上的稳态经济主义、政治学上的深层生态学以及伦理学上的道德革命论作为应对生态危机的主要办法。

福斯特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生态中心主义的源头——“真正的社会主义”（*true socialism*）的批判。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一股声称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潮就开始在欧洲传播，而卡尔·格律恩（*Karl Grün*）就是其代表。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所持的自然伤感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反人类的生态中心主义。马克思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试图用自然本身所提供的精神方法来克服人类对自然的异化，实际上否定了人类实践在自然面貌改变过程中的深刻作用。福斯特指出，这种自然伤感主义的理论目的，代表了封建小地主和资本主义小生产者的利益诉求，只能以自然伤感主义的陈词滥调告终。

戴维·佩珀则从更为宽广的人类历史的角度来批判生态中心主义。戴维·佩珀说，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应该按照生态原则和系统论原则生活，人类不是它关注的中心，自然生态系统才是它关注的中心，人类仅仅是生态系统的—个部分。”<sup>[2]</sup><sup>329</sup>生态中心主义是两种思潮融合的结果，一方面是自古以来人们朴素的有机自然观。一些生态学家主张，人类应该完全依照生态法则生活，这种生活要求人类使用小规模科学技术顺应自然而不是使用大规模技术改造自然，人口和经济应该在确保生

态循环的前提下保持缓慢增长。另一方面,生态中心主义也与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密切相关,这种思潮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破坏了人类本来融洽的社会关系,而且也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天然关系。在这些浪漫主义者看来,人类的健康和谐生活就在于依存自然发展的规律过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生活。戴维·佩珀认为,虽然生态中心主义对唤醒人类的保护环境意识,鼓励人类关爱万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它本质上毕竟是一种唯心主义,这种思想不但不能实际干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而且还因为它强烈的反人类倾向而把生态社会建设引向错误的方向。他指出,生态中心主义否定了自启蒙时代就奠定起来的理性价值观念,实际上否定了人的发展权利,生态中心主义不但不能根治生态危机,反而有可能导致反民主、反人类的法西斯主义。

## (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道德革命思想的批判

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一些左翼生态理论家提出了道德革命的应对方法。他们假设,个体道德水平的提高是社会生态意识提高的基础,如果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每个个体都能改变自己的自然观和消费观,那么生态危机就会自然消失。还有左翼生态理论家提出了针对企业主管和商业领袖的环境道德革命设想:认为如果这些经济活动的精英分子能够接受生态道德,不将获取利润作为根本的经营目标,那么人类的总体福祉就会因此而得到保护。前者以美国著名的绿色分子、新环境伦理的创始人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为代表,利奥波德这样设想,“我们滥用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它视为属于我们的商品。当我们把土地看作是我们属于的共同体时,我们才会怀着敬爱使用它。”<sup>[1]36</sup>后者以当代西方环境经济学家保罗·霍肯(Paul Hawken)为代表,他认为:“如果杜邦、孟山都、

陶氏化学……认为经营企业是为了服务于人民,帮助解决问题,利用工人的才智提高人民的生活,并从赋予我们生命的自然中学习,那么我们就仍有机会。”<sup>[5]216</sup>在福斯特看来,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大框架下,通过道德诉求来治理环境危机的方法是十分幼稚的,因为这种道德革命罔顾全球资本主义“踏轮磨坊”式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创造了一个“犹如巨型松鼠笼子”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把每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人们不敢也不可能从这种体系中脱离。对资本家而言,“不管谁是董事会主席,他都必须创造最大的利润和市场份额,如果做不到,他就不会再是董事会主席了。”<sup>[1]42</sup>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只有继续呆在体系内,才能保证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一旦被踢出去,不仅意味着丧失了发展的机会,甚至丧失生存的机会。福斯特认为,道德革命论者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他们的斗争打错了靶子,因为相对于“个人对生态的不道德”,生态主义者忽视了决定生态环境最关键的方面,即“体制的不道德”才是“更高的不道德”。福斯特断言:“只有承认环境的敌人不是人类(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集体),而是我们所在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我们才能够为拯救地球而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革命寻找到充分的共同基础。”<sup>[1]43</sup>也就是说,生态主义者只有不仅致力于重建个人道德,而且与资本主义生产这种更高的不道德展开斗争,生态道德建设才能得到根本的保证。

## (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在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绿色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是天然盟友,绿色思潮所持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决定了他们认为应对生态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应自然规律来生活,而对自然生活的推崇和对权威制度的排斥恰恰是无政府主义的核心

见解。

首先，自然组织不应该被视为社会结构的样板和范例。生态无政府主义“往往把自然看成是外在于社会的，但后者应遵守自然的规律并把自然看作一个模型”<sup>[6]254</sup>。生态无政府主义认为，在生存之链中，任一生物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价值，只要尊重每个物种的本性，一切物种都会各安其位，自得其乐，但是如果有物种偏离了生存之链的安排，生态灾难就会降临。戴维·佩珀认为，一切价值只能是客体对主体的价值，自然界本身不可能有价值，只有有了人的存在，自然界才有价值，生态无政府主义认为自然界有其独立的价值的观念是荒谬的。

其次，生态无政府主义无法正确解释生态危机的产生原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阶级产生之后整个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正是阶级关系导致了生态掠夺和环境破坏。因此，生态无政府主义认为，消除生态危机需要“首先废除国家作为废除资本主义的一个独立行动，因为国家创造了资本主义”<sup>[6]253</sup>。他们认为，正是国家建立了等级制，只要否定了代表等级制的国家，不仅资本主义可以被消除，生态危机也可以自动消除。在戴维·佩珀看来，生态无政府主义否定特定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是造成生态灾难的根本原因，使其找错了斗争的标的。

最后，生态无政府主义的策略具有空想性，不可能取得积极的生态成果。为了达到否定国家的目的，生态无政府主义采取了多种策略，其核心主张是反对集体主义提倡个人主义，反对经济增长提倡回归自然，反对权威主义提倡个体自治。由于生态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了解造成生态危机的内在机理，因此他们表面声称反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等级制，但实际上他们对既存的资本主义等级制无能为力，对现有的资产阶级秩序无法产生任何冲击。因

此，它最终也无法挣脱资本主义的罗网。

###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红绿结合”的革命策略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在批评西方左右翼两种绿色思潮基础上阐明生态危机解决之道的，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制度这个问题上有激进、温和甚至“第三条道路”的分野。具体地说，有三种基本态度：一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如福斯特；二是对资本主义持缓慢改良的态度，如奥康纳；三是悬搁社会性质问题，推崇某种程度的乌托邦实验，如戴维·佩珀。正是因为对待资本主义制度上的不同态度，导致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以革命或者改良的方式应对生态危机的主体力量这个问题上，也持三种基本态度：一是坚决依靠工人阶级或者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革命联盟来推翻资本主义政权；二是依靠新兴社会阶层或者某种程度的红绿联盟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三是借助先锋绿党和绿色知识分子的力量来进行乌托邦实践。

（一）福斯特：否定资本主义是人与自然和解的前提

福斯特认为，在马克思成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马克思使用“新陈代谢”这个概念来概括人的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sup>[7]207-208</sup>。福斯特断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相互敌对，使这种新陈代谢中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即生态危机源于新陈代谢关系的断裂，而新陈代谢关系的断裂又是资本主义这种特定生产关系的本质属性，因而要克服生态危机就必须扬弃资本主义制度和根本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福斯特认为：“在当前历史时刻，需要的是一场……具有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同样规模的‘环境革命’。”<sup>[8]90</sup>

福斯特认为，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和自然的冲突，而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决定

了他们进行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决性，因此，要想解决这种冲突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一次新闻访谈中，当福斯特被记者问到当代美国社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时，福斯特回答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并没有过时，当代美国社会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被各种“新社会运动”代替，在这个意义上，“考察人类历史的演变过程，我们发现仅仅是阶级运动这一支力量，就可以形成一股改变世界历史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仅能重新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而且能把一种生产方式改造成另外一种生产方式，因此，当代历史仍然是阶级斗争的历史。”<sup>[9]45</sup>

福斯特同时也注意到生态时代各种环境运动与阶级斗争相互脱节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他认为正是因为北美的生态运动向来就没有借助阶级斗争的传统，而是借助“新社会运动”的力量给政府施加压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布什和克林顿执政期间，环境保护主义者们在对木材工业发难这件事上屡遭败绩”<sup>[9]122</sup>的原因，因为劳动者同生态活动家们一直处于互相敌对、互不信任的状态之中。福斯特以一批生态主义者保护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的艰苦斗争为例，说明了无视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阶级压迫、种族冲突、性别歧视和国际政治经济不平等问题的纯环保运动根本无法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他坚持认为，要推翻现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决不能放弃传统的阶级斗争的方式，要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组成广泛的环境保护的联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生态社会主义，才能确保新的社会成为环境友好型社会。

（二）奥康纳：通过建立生态民主国家解决生态危机

奥康纳基于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的应用实际，强调国家政权对于环境保护的关键性作用。奥康纳认为，国家的功能是中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

就是去寻求资本家的共同利益，而资本家的共同利益就是获得生产条件。奥康纳说：“资本主义的国家如果想维持其合法性，就必须以全体人民的名义来行使自己的职能，或者必须把自己打扮成这个样子。”<sup>[10]246</sup>由此可见，奥康纳诉诸国家的“全民利益”管理功能的观点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他的国家观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马克思关于变革社会的激进立场在奥康纳那里已经演变成为一种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下的生态民主化进程。

在奥康纳看来，要治理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并不需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根本地否定，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进一步发扬国家政权固有的中立性属性，并对其进行民主化改革就行了。将来到底是出现更差的环境条件还是更好的环境条件，取决于不同的政治力量进行的博弈成果，取决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内部调整以及科学技术革新的程度。西方绿色运动的“全球性思考，地区性行动”斗争策略根本上无法对具有决定性的全球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产生任何冲击，“绿色主义者不仅要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而且也要地方性地思考，全球性地行动，然后达到既是全球性地又是地方性的思考和行动。”<sup>[10]476</sup>这就意味着，各派绿色运动力量乃至社会激进力量必须联合起来，以此形成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现行体制的国际性民主运动。

奥康纳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方法，具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是要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奥康纳实际上追求的是一种在生态思想引领下的以生态主义者为主力军的反资本主义现行体制的大联合。奥康纳并没有像传统马克思主义那样，把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视为践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力量，这是因为奥康纳本身对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的解决抱

有一定的信心,相信西方民主政治的内生力量。“在全球资本的总体化力量面前,单个社会运动相对来说是软弱无力的。这就提出了互为关联的整体性战略的必要性。”<sup>[10]400</sup>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和自然的首要前提就是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有各种绿色运动参与其中的市民社会,通过建立生态民主国家解决生态危机。

(三)本·阿格尔、戴维·佩珀:依靠第三支力量进行生态革命

在本·阿格尔看来,生态危机的产生与消除,是资本主义发展变革中人的需求辩证作用的产物,这种辩证运动具体表现为“期望破灭的辩证法”。阿格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消费社会的盛行,深陷的生态危机使资本主义社会面临根本变革的危机关头。阿格人说:“虽然60年代的激情已暂时消失,但经济的、生态的和社会的危机却大量存在,急于要求对激进变革的可能性做通盘考虑。”<sup>[11]416</sup>正是因为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使自然生态面临崩溃的危险,因此缩减生产就成为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生存的大问题。生产大幅度缩减会严重地影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里,极大丰富的商品向来被认为是对异化的生产的一种补偿,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为了避免生态危机而选择了大幅度削减生产,人们理所应当认为消费社会就会逐渐消失。这种在消费中获得异化满足的生活方式的消亡,必然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当人们认识到这种异化消费仅仅是虚假需要的满足,形成的是消费社会中的“虚弱的人类”,而不是人的创造性的个性发展,就会对建立一个充满创造性的新社会满怀期望。

阿格尔把马克思主义和北美土生土长的民粹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策略。他首先是坚持工人阶级在建设生态社

会主义社会中的主力军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资本的官僚主义管理和技术统治论受到资本主义发展全方位地认可,使得劳动者对劳动的整个过程毫无所知,熟练劳动已经不再需要,劳动中积累的知识也不再需要,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知识在细化分工当中也变得无足轻重,工人在劳动中感到的不是创造性的愉悦,而是前所未有的挫败感。“总起来看科技革命并没有使工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而只是把他们从工厂中排挤出来,使他们投入职员的行列或者从事低报酬的、不需要什么训练、技术的看门和女招待之类的工作。”<sup>[11]473</sup>在这个意义上说,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和第三产业当中的雇佣工人,是生态社会主义革命潜在的主力军。与福斯特的激进立场有所不同,阿格尔谋求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后现代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当中寻求一种平衡,他将之称为“第三条道路”。他基本上赞同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根本变革的立场,但同时他的革命策略当中不仅包括反殖民主义运动、民族权益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反核武器运动的成分,甚至还包括同性恋运动的一些思想。为了避免互不统属的新社会运动互相抵消或者被资本主义分化瓦解,阿格尔强调,所有新社会运动必须在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为革新资本主义整体社会结构而形成合力。

#### 四、结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红绿结合”的生态革命理论表现出对当代西方社会工人运动的信赖和对新社会阶层生态运动的认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经济基础在影响意识和行为中的关键性,而工人阶级作为经济行为的集体承担者,一定会在社会变革中充当关键性的作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西方左右翼两种绿色思潮,认为他们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原则,“试图通过教育和示范性生活

方式实现的一种大众意识的革命是有局限的而且可能是令人遗憾的。”<sup>[14]</sup>作为当代西方具有现实影响力的生态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吸纳了西方左右翼两种绿色思潮的积极成分，正视并认同西方社会风起云涌的生态社团和生态运动，建构了“红绿结合”的生态革命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红绿结合”的生态革命理论的正确之处，也就是当代西方左翼两种生态思潮的迷误之处。第一，当代西方左翼两种生态思潮坚持用马尔萨斯的静态历史观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口趋势、经济趋势或者政治生态学理解为自然法则，实际上是把人等同于草木禽兽，必将导致完全错误的结论。第二，当代西方左翼两种生态思潮反对工业社会、反对工业增长，看似对资本主义现存秩序毫不妥协，但是由于摒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导致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提出回归荒野的激进之策和道德革命的空想之举。正如马尔萨斯的意图是希望得出社会主义完全无用、这个世界必须“总有穷人”的结论一样，看似激进的当代西方生态思潮最终只能以对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认可而告终。这说明，任何支持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学者都应该认清一个实质：支持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就意味着认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当代西方左翼两种生态思潮否定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否定经济增长的必要性，本质上还在于没有认清不同生产关系下的科学技术的不同能动作用，殊不知，在现有社会情况下，任何经济收缩和道德进步的主张注定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当然，当代西方左翼两种生态思潮的生态危机解决之道并非全无道理，它的合理之处在于它真切地指明了一种现状之上的事实，即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实现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不去调整制约人与自然关系的人与人的关系，不去追求公正合理自由的社会制度，经济增长的生态极限注定很快就会到

来。在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之下，诉诸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片面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注定会把整个国家推向崩溃的边缘。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西方左翼两种生态思潮的理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他们的生态危机解决之道是资本狂欢时代的警世危言，是体制僵化国家的末日之钟。

#### 参考文献：

- [1]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 耿建新, 宋兴无,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2] David Pepper. Modern Environmentalism: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3] [英]戴维·佩珀. 现代环境主义导论[M]. 宋玉波、朱丹琼, 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1.
- [4] [英]戴维·佩珀. 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M]. 刘颖, 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2.
- [5] Hawken. The Ecology of Commerce [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3.
- [6] [英]戴维·佩珀. 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M]. 刘颖, 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2.
- [7] [德]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 [8] J. B. 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 [9] J. B. Foster. Is it not a Postcapitalist World, nor is it a Post-Marxist One [M]. Monthly Review, 2002.
- [10] [美]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1] [美]本·阿格尔.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魏璐珂

# 福建民营经济强省战略目标下 推动泉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陆焱平

(中共泉州市委党校, 福建 泉州 362000)

**摘要:** 泉州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位居 26 座万亿城市之首, 被誉为“民营经济第一城”。泉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将在实现泉州自身综合实力跃升、助力福建由民营经济“大省”向“强省”迈进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受新时代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影响, 泉州民营经济发展也面临传统产业比重偏高、企业整体实力有待加强、企业发展信心不足、产业发展人才短缺等痛点、堵点问题。为破解这些难题, 需要各级政府、企业、社会等共同努力, 包括上下联动, 提振发展信心; 破立并举, 强化机制保障; 向“新”提“质”, 提升竞争实力。

**关键词:** 福建; 民营经济强省战略; 泉州; 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7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4)06-68-7

泉州民营经济呈现出“78999”特征(贡献全市 72% 的税收、83% 的 GDP、90% 的技术创新成果、92% 的城镇就业、97% 的企业数量), 成为泉州发展的最大底气、最大优势和最宝贵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两个都是”“两个健康”, 并多次就民营经济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批示。<sup>[1]</sup>2023 年 7 月以来, 国家、福建省、泉州市等各层面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系列政策相继出台。2023 年 7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

布<sup>[2]</sup>, 将不断创新和发展“晋江经验”第一次写入中央文件, 极大鼓舞了泉州广大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8 月 16 日中共福建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出台 18 个方面 37 项政策举措。8 月 18 日, 泉州市委十三届五次全会审议《中共泉州市委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不断创新和发展“晋江经验”, 勇当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主力军的意见》。2024 年首个工作日, 国家发改委在泉州晋江召开创新发展“晋江

**基金项目:** 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研究基地 2023 年度立项课题“民营经济强省战略目标下推动泉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陆焱平, 中共泉州市委党校讲师,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开放经济。

经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进一步鼓励民营企业发展。

泉州民营经济如何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健康的发展道路，如何不断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如何为新时代福建省民营经济强省战略的实现发挥主力军作用，成为摆在泉州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面前亟需破解的问题。

### 一、泉州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

(一) 促进福建省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目标的实施

福建是全国第一个提出要推动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实施的省份，作为福建省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泉州民营经济发展质量对福建省民营经济发展质量起到重要的、关键的作用。泉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将为福建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的实施贡献“泉州力量”，作为勇担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的主力军，推动福建从民营经济大省向民营经济强省转变。

(二) 推动泉州自身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泉州因民营经济而生、因民营经济而兴。民营经济强则泉州强，民营经济好则泉州好。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高质量发展对民营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泉州市民营经济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对于泉州未来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新质生产力这条新赛道上，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如何立足当地实际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泉州而言，因地制宜就是推动民营经济在高质量发展中创“新”提“质”。民营经济既是泉州的传统优势和“看家宝”，也是今后泉州新一轮发展的巨大潜力和竞争力所在，必须不断激发民营经济澎湃动能，才能推动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从而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

(三) 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

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的习近平在1996—2002年六年期间七下晋江深入调研，总结提炼出以“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晋江经验”，指引泉州民营经济经历了从探索发展到提速发展、跨越发展再到高质量发展的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时讲到，“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晋江经验”不仅是对民营经济从孕育到成长、从发展到壮大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深邃思考、积极实践。<sup>[3]</sup>“晋江经验”在泉州诞生，但它不仅是属于泉州晋江的宝贵经验，更是整个福建乃至全国的宝贵经验，也是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制胜法宝。实践证明，泉州很多传统企业如安踏、九牧等遵循“晋江经验”提出的“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实现了传统产业的高新化发展。泉州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对于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将不断丰富“晋江经验”的内涵，再创“晋江经验”新辉煌，为全国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形成更多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 二、泉州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 传统产业比重偏高

泉州市制造业发达，以传统产业为主，总规模超2万亿元，已形成纺织服装、鞋业、建材家居、石油化工、机械装备、食品饮料、工艺制品、电子信息 and 纸业印刷等九大千亿产业集群。但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所明确的范围，泉州仅有电子信息和（高端）装备制造可被纳入“新兴”范畴，近年来大力发展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生物医药等

目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产业规模尚小，整体产业层次偏低。如表1所示，与福州、厦门相比，泉州2023年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比福州少将近1500家，比厦门少将近1200家。

表1 2023年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地区	福州	厦门	泉州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家)	4509	4220	3060

数据来源：根据福州、厦门、泉州三地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 (二) 企业整体实力有待加强

一方面，龙头企业数量较少。泉州是我国较早重视发展民营经济的地区之一，虽然起步早，民营经济占比高，但龙头企业数量不多，以安踏、特步、九牧、达利、百宏聚纤等企业为主要代表。如图1所示，2023年福建省100强民营企业中泉州仅有17家，与厦门33家、福州32家相比差距明显，民营企业大而不强的问题突出。另一方面，企业研发创新能力不足。泉州民营经济主要集中于纺织鞋服、食品、石材、卫浴等传统产业，近年受土地、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影响，企业利润空间不断压缩，民营企业对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意愿不强，使泉州企业在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等方面的培育和进展上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竞争力。再一方面，科技创新投入不足，2023年泉州市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为1.96%，低于厦门(3.3%)，福建(2.16%)，全国(2.65%)平均水平。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3中国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榜单”中19家闽企上榜，其中福州8家，厦门6家，而泉州仅有3家民企上榜(百宏聚纤、安踏体育、九牧集团)。

### (三) 企业发展信心相对不足

当前，摆在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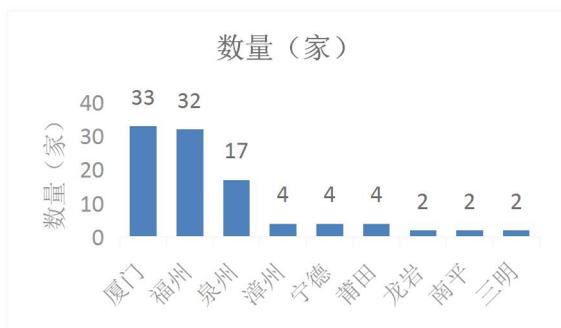


图1 2023年福建省100强民营企业分布数量

前最大的难题仍是发展信心不足。一是世界发展环境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特别是国内总需求不足和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内国际市场开拓难度加大。二是实体企业经过三年疫情冲击，普遍处于发展低谷，“活下来”成为众多民营企业近几年最大的工作重心。近年来，民间投资明显下滑，企业把不准未来发展方向，多持保守观望态度，选择尽量不投资或少投资。三是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够。近年来，针对民营经济发展虽然各层级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但落地实施还存在较大差距。企业家担心市领导换届后会出现“新官不理旧账”的情况。部分措施刚出台没多久，又被新的措施替换掉，政策缺乏连续性、稳定性。

### (四) 民营企业内部腐败问题较为严重

内部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近年来，包括泉州在内的民企腐败问题频发，涉案金额大、影响面广、隐蔽性越来越强。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也将治理民营企业内部腐败问题提上重要议程。很多民营企业缺乏完善的企业内部腐败发现和处理机制，部分企业主要依靠企业主自身积累的甄别能力和经验找出腐败问题。同时，大部分企业尚未建立专门的监督部门，缺乏主动的内部监督，偏重事后调查，针对事前的防范和约束机制尚未建立。多数企业为了把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往往通过私下协商方式将大事

化小小事化了了，对利用职务便利侵害企业利益的行为惩治力度不大，腐败者违法成本不高。

### （五）产业发展人才相对短缺

相比于福州、厦门，泉州整体薪资水平对人才的吸引力较弱，人才引、育、留、用等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尤其在创新型和高技能型人才方面更是匮乏，这使得泉州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缺乏足够的人才支撑。目前泉州有六所本科院校和众多高职专科以及中职院校，但是由于众多高校课程和专业技能培训与企业实际需求之间不匹配，企业面临人岗不匹配、招不到合适人才的尴尬境地。近年来泉州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发展迅速，但既具备专业外贸知识又了解外国消费情况的复合型人才缺乏，特别是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小语种人才非常紧缺。

## 三、福建省民营经济强省战略目标下泉州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

从城市能级而言，泉州作为万亿俱乐部城市中少有的普通地级市，要想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全方位的支持，较之诸多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要实现泉州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企业自身、各级政府、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多措并举。

### （一）上下联动，提振发展信心

1. 创造平等竞争的成长环境。一是竞争机会公平。拓宽投资领域，除国家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外，尽可能降低或放开民营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鼓励民营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参与盘活国有存量资产。建立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常态化机制，及时发布鼓励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参与盘活的项目信息。支持民营企业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二是建言机会平等。研究制定进一步提高泉州民营企业家政治待遇的若干措施，

合理增加民营企业家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比例，提高企业家政治地位和社会荣誉感，充分发挥优秀企业家的示范带动作用，包括评选年度优秀泉商、列席重要会议、参与涉企政策制定、完善领导联系企业机制等。三是成长机会平等。积极为企业家成长创造良好环境，每年推荐一批企业家到全市涉企部门挂职锻炼，帮助提升依法依规办事水平，增强与机关部门的沟通能力，更好促进政企交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同时，开通绿色服务通道，给每年评选出的优秀企业家颁发“优秀企业家卡”，由组织部、人力资源保障局、税务局等相关部门落实优秀企业家在税收优惠、子女就学、看病就医、政务代办等方面的优待服务。

2. 营造爱企护企的社会环境。一是致力营造亲商重企的良好环境。充分利用泉州通、电视、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等融媒体平台，通过“传统媒体+新媒体”的宣传方式，加大对爱拼敢赢的泉州民营企业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宣传，树立民企光荣、民营企业家光荣的舆论导向，营造浓厚的“尊商重企”社会氛围。二是积极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严厉查处侵犯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各种违法行为，围绕全面平等、依法保护原则，通过规范执法、公正司法，切实维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包括民营企业财产权益、创新权益、自主经营权、企业家生命财产安全，用实际行动展现政府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权益的决心，让民营企业一心一意做实业、做主业。三是畅通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诉求通道。注重发挥好泉州市及各县（市、区）工商联和商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完善民营企业诉求响应平台功能。探索成立由市委政法委、市工商联牵头建立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诉求绿色通道联席会议，推动依法解决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涉政法领域诉求的共性或重大问题，形成反应快速、公平公正的诉求搜集、

办理工作机制，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和广大企业家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3. 促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各地学习借鉴晋江经验，就要像晋江市、镇两级政府那样，变以管理为主为以服务和引导为主，做到既不越位，又不缺位、错位或不到位。”<sup>[4]</sup>继续践行好“四到”理念（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重点当好“三种”角色（引路人、推手、服务员）。一方面，实施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打通同部门之间的业务壁垒、各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壁垒，实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数据共享、业务协同，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提升泉州政策找企平台服务，畅通惠企各项奖补资金直达机制。推动市发改、工信、财政等涉企部门按照“免申即享”服务模式出台惠企政策，大力推广告知承诺制。另一方面，精准把握企业需求。制定出台政策前深入企业进行调查研究，真正了解企业所需所想所盼，做到问需于企、问计于企，针对不同的企业出台更精细化的支持政策。在基层设置企业转型专属服务岗或服务窗口，并根据收集的基层需求针对性制定出台普惠性、适配性更高的政策。探索建立常态化“轻骑兵”“大篷车”“帮代办”下乡进企机制，推动这些创新做法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要对已出台政策进行全面梳理整合，一定程度上形成体系，避免政策措施的“碎片化”。及时加大对国家、省、市各层面政策的宣传解读，提高企业对政策的知晓度及应用度。

## （二）破立并举，强化机制保障

1.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包括政府、银行等在内的社会各界亟需真正转变思想观念，打破所有制歧视。政府方面，加强顶层设计，营造适合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sup>[5]</sup>福建省委省政府要立足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总体目标进行资源的总体统筹协调，在做强福州省会城市的同时，也应给予泉州民营经济

更大的支持和倾斜力度，包括财政奖补资金、税费、金融、人才支撑等全方位的保障。探索开展泉州13个县市区民营经济营商环境评价，立足民营视角，构建以民营企业满意度为导向、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互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融资方面，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稳步提升民营企业贷款业务量的增长。鼓励银行通过规范涉企收费、执行贷款利率优惠、减免服务收费等方式有效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畅通多元投融资渠道，支持泉州民企不断拓宽境内外直接融资渠道，探索发行绿色债、境外债、熊猫债等创新产品。将绿色发展融入企业长期发展规划中，开展碳交易权、排污权等业务，开发电力绿色贷、节水绿色贷、碳中和债等产品。

2. 探索建立民营经济专门发展机构。目前福建省发改委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处，另有莆田和漳州两市专门设立民营经济发展机构。泉州作为民营经济大都市，为更好地服务广大民营企业、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应积极推动成立泉州市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设立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市发改委，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工作情况，提出工作建议，督促落实领导小组会议议定事项。同时建立民营经济工作会议制度、定期报告制度、上下贯通的工作机制和协调体系、运行评估机制、督导考核机制等五项协调机制，确保民营经济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3. 建立民营企业内部防腐机制，持续增强风控力。一是推动民企健全内控机制。帮助企业提升内控机制，堵住可能存在的漏洞。有关部门积极组织互联网头部企业、大型集团公司法务、内控部门，与中小企业开展案例分析、经验交流。二是探索建立民企员工职业信用数据库、从业“黑名单”。探索搭建企业用工信息共享平台，将员工劣迹记入数字档案，方便用工企业进行背景查询。在劳动合同

中约定劳动者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时，用人单位可解除劳动合同，并让其支付相应的违约金，从源头构筑民营企业员工不敢腐的堤坝。

### （三）向“新”提“质”，提升竞争实力

1. 注重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锚定转型升级方向。不断推动泉州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一是“高端化”。推动传统产业由微笑曲线底端向研发、售后服务等高附加值的两端进行不断延伸。在提升品质、品牌、品味上下功夫，将泉州多元丰富的文化元素不断植入产品，做出人无我有的独特优质产品，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国潮泉州”的美誉度和知名度。二是“智能化”。推动智能化改造，抢抓泉州获批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作为福建唯一入选）的契机，加快大数据、云计算、5G、物联网、数字孪生、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应用，全面推动生产端的智能化和产品端的智能化。三是“绿色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sup>[9]</sup>。积极鼓励企业将国家“双碳”目标融入企业的长远发展规划，加大绿色数字技术和设备的投入与应用，有序推动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工作，根据九大千亿产业集群特点积极创建绿色企业、绿色园区，着力推动有条件、实力强的企业将绿色改造贯穿全过程，生产绿色技术产品和构建绿色供应链，提高传统产业“含绿量”。四是“融合化”。包括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之间的融合发展特别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等。在服装、鞋业、卫浴等制造业优势领域，在工艺设计、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方面，加快形成一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推动泉州传统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坚持科技赋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

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sup>[6]</sup>。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统产业仍是泉州经济发展的底盘，不能轻易放弃。立足泉州自身发展实际和比较优势，传统产业正是泉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支撑，要不断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泉州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创新的“加法”，才能做好企业发展的“乘法”。<sup>[7]</sup>促进创新的制度安排是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在拉动力。<sup>[8]</sup>合力推动创新资源共享，构建一体化区域创新体系。完善协同创新的政策互动、资源共享和市场开放机制。一是搭建集泉州19家大院大所、各类高校、龙头企业等科技创新资源共享的信息平台。促进大泉州范围内科技项目库、专家库等资源共享，创建集产业发展、研究动态、政策发布为一体的信息共享平台。二是营造龙头企业、中小微企业共同创新的良好氛围。支持九大千亿行业龙头企业联合省内外著名企业、科研院所等共建产学研用联合体、创新研发机构、重点实验室等攻克技术短板。鼓励民营龙头企业担起产业技术创新的领军任务，增加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将每年销售收入一定比例投入研发。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科技创新的示范引领、辐射带动和互助帮扶作用，推动行业共性技术难题的攻关，组织技术联合攻关，激发中小微企业创新创造活力。

2. 注重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稳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成本大，风险高，只靠民营企业自己去突破，成功的机率很小。政府部门要加强产业发展顶层设计，选准半导体、新材料、精密仪器、生物医药等泉州几个具备一定基础和发展潜力的产业，加大政府性引导资金撬动作用，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带动民营企业投入，吸引和全球人才、资金、数据等要素资源投入泉州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这些产业加快成为

先导性、支柱性产业。

3. 强化人才战略支撑。一是设立人才引、育、留、用专项基金,通过柔性引才引进更多高层次人才助力泉州民营企业发展。支持企业引进“高精尖缺”人才、复合型人才、工匠型人才,对引进单位给予一定额度的“引才奖励”。探索完善民营企业人才柔性引进、使用机制,减少厦门、福州等地对人才的虹吸,充分利用泉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促进以文化留人。探索通过“以赛引才”“以事用才”等灵活的方式吸引更多高端人才为泉州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赋予产业人才享有创新成果的分配权,为人才提供个性化服务,提升人才创新积极性和贡献度。二是高质量推进校企协同育人。自主培养本地化人才,鼓励华侨大学、泉州师院、黎明大学、泉州经贸学院和泉州财贸干校等本地高校立足本地产业特色与人才需求特点,科学制定符合现在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让专业服务产业,让产业引领专业,为民营企业输送供需匹配的人才。三是职称化认定和保障。打通民企内部专业技术工人职称评聘通道,让企业真正拥有技术工人。深入实施专项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支持开展职工培训,不断提升职工能力水平。四是建立企业家教育培训制度。把对新生代企业家的教育培训纳入到全市人才工作的整体规划,研究建立具有针对性、计划性的培训制度,加强企业家后备人才,特别是年轻一代企业家的培养,形成企业家队伍的“梯队”结构。五是建立人才信息共享平台。政府牵头整合各地、各行业商协会、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资源,在制造业细分领域,建立集信息发布、专业交流、技术研讨、业务培训、智库对接等功能为一体的共享平台,完善行业人才数据库,提高人才引智的精准度。

#### 参考文献:

- [1] 于革,梁永郭.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论述[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6):10-12+30.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EB/OL].(2023-07-14)[2023-07-19].[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7/content\\_6893055.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7/content_6893055.htm).
- [3] 尹力.弘扬“晋江经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2-08-19(11).
- [4] 习近平.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N].福建日报,2002-10-04(03).
- [5] 黄志锋,林国宏.福建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分析[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22,40(05):96-103.
- [6] 习近平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2024-05-23)[2024-05-23].<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40523/06eca2e523704630a700a60f51d193b9/c.html?page=4>.
- [7] 梁雅楠,张成,王小广.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民营企业转型发展:困境、溯源和对策[J].当代经济管理,2024,46(12)34-41.
- [8] 周丽萍.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41(01):30-33.
- [9]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EB/OL].(2024-07-18)[2024-07-21].<http://www.news.cn/politics/20240721/cec09ea2bde840dfb99331c48ab5523a/c.html>.

责任编辑:魏璐珂

# 一级学科视域下推进基层党校 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的思考

——以 F 省 P 市党校系统为例

赵金宇

(中共莆田市委党校, 福建 莆田 351100)

**摘要:**“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在国家层面得到确认以后,原“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两个二级学科如何实现融合发展,达到党史和党建“1+1>2”的效果,是值得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党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五路大军”之一,在加快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三大体系”、培育壮大党史党建学科人才队伍和推动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中责任重大。一级学科视域下,基层党校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中存在意识不强、人才短缺、能力薄弱等突出问题,在实践中应着重从优化顶层设计、建设人才队伍、提升学科素养、突出地方特色等方面戮力探索融合发展之路。

**关键词:**基层党校;党史党建;一级学科;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D261.41; ;D239-4; D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072(2024)06-75-7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sup>[1]</sup>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同样强调:“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sup>[2]</sup>这些论述为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发最新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正式把“中共党史党建学”新增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是“党

史研究和党建研究长期发展的积极结果”<sup>[3]</sup>,也是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需要。党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五路大军”之一,在加快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三大体系”、培育壮大党史党建学科人才队伍和推动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中责任重大。而党校系统中的基层党校量大面广,是党校系统中最贴近基层、贴近党员干部的重要部分。在日常教学、科研、咨政工作中,广大基层党校在探索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经验和规律方面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因此,在一级学科视域下推进基层党校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助推

**作者简介:**赵金宇,中共莆田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时代基层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是值得深入思考、明确回答的重要时代课题。

### 一、推进基层党校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

本文所指基层党校是相对于中央党校和省级党校而言，主要指市、县两级党校。“据统计，全国共有省级党校34所，副省级党校15所，市地级党校360多所，县级党校近2500所，拥有近10万教职工……市县两级党校大约承担了90%以上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任务，是教育培训基层党员干部的主力军。”<sup>[4]</sup><sup>29</sup> 党史和党建作为党校系统的传统优势学科，承担着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以及科研咨政的重要职责。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设立后，推进基层党校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和跨越发展，进而发挥党史和党建“1+1>2”的效果，对提升基层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党性修养和履职能力，对服务地方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大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推进基层党校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的实践是践行党校初心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首次提出“党校始终不变的初心就是为党育才、为党献策”<sup>[5]</sup>。党史和党建学科作为党校系统的主要学科，始终与党校事业同频共振，始终践行党校初心，在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早的两所党校——安源党校、北京党校就已经开设了党史和党建相关课程，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培育革命人才作出了突出贡献。就安源党校来讲，1924年12月安源党校正式开学，刘少奇亲自担任校长，陈潭秋、肖劲光等优秀师资担任教员，开设了《政治经济浅说》《俄共党史》《少年运动史》等特色课程。据不完全统计，在持续9个月的

办学过程中，安源党校有学员近90名，为党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革命骨干。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基层党校，安源党校和北京党校坚守党校初心，书写了光辉的篇章。建党一百年来，党已经有了自己系统的历史，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从学科理论上也形成了“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两个独立的二级学科。事实上，在近百年基层党校办学过程中，党史和党建学科相互交织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具备成立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特质和条件。新时代新征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推动新时代基层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必须适应学科发展规律，在一级学科视域下着力推进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

（二）推进基层党校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的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应有之义

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sup>[6]</sup>这句话反映出哲学社会科学对国家民族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也为党和国家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带来重要启示。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同样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sup>[7]</sup>“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sup>[7]</sup>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百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积淀了十分丰富的精神财富、理论财富和实践经验，极其有必要从理论上和学术上加以深入研究，从而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哲

学社会科学。当前,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一级学科,尽管在学科定位、学科边界、学术规范等方面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但也积极回应了学界多年的期盼,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新时代新征程,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和自主知识体系,各级党校包括基层党校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和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理应在推进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中贡献自身的智慧和力量,这也是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推进基层党校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是提升基层党校学科建设水平的迫切需要

教学是党校的中心工作,学科建设是党校教学工作水平的重要保障。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明确规定:“学科建设是加强党校(行政学院)教学科研工作、提升师资水平、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建设。党校(行政学院)学科建设应当重点建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加强党性教育学科建设。”<sup>[8]</sup>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成立以前,“党的建设”这个二级学科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共党史”这个二级学科属于党性教育学科的范畴,它们都是《条例》提出的要重点建设的学科。党史和党建作为两个二级学科时分别是需要重点建设的学科,党史和党建学科合二为一成为融合发展的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后仍然是需要重点建设和加强建设的学科。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党校认真贯彻落实《条例》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导,重点推进党史党建学科的融合发展,努力形成具有党校特色的、完善干部培训需要的学科体系,满足提升学科建设水平的迫切需要。

## 二、基层党校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由于全国基层党校体制结构相似,我们以F省P市党校系统为考察对象来探讨基层党校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的现状与问题。P市属于F省的一个地级市,行政区域内共有市级党校1所、县级党校4所,构成了“1+4”的党校系统格局。1983年,F地区撤地设市,同年12月市委党校成立,党史党建教研室同步设立。2006年5月党校、行政学院合并,2007年又加挂“市社会主义学院”牌子,逐渐形成“一校两院”的办学体制。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作为开展党史党建和党性教育教研工作的老牌教研室,历经40余年发展延续至今,为党史党建学科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但一级学科视域下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仍存在“两张皮”现象。P市各县级党校因机构人员编制的限制,并未设置党史党建综合的或者党史、党建单立的教研部门,一级学科融合发展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 (一)学科融合意识不强

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设立后,全国各大高校行动迅速,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成立国内首个实体性中共党史党建学院,进一步加强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而党校系统在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建设上动作缓慢,明显落后于高校。P市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虽然是一个集党史党建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内设机构,但整体上缺乏党史党建一级学科融合发展的长远考量,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建设不够完善,达不到一级学科建设的需求。P市各县级党校受客观条件制约,党史党建学科建设更是相对滞后,学科整体规划意识不强。大多数情况下,基层党校党史党建学科缺乏一级学科建设的整体思维,再加上基层党员干部的实际工作需求和实用主义导向,基层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的教师在教学、科研和咨政中,有意无意地出现重党建、轻党史的

情况。这就容易把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大党史党建”缩小为“小党史党建”，导致认识上出现偏差，不利于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再加上党校系统内一些专家学者对党史、党建两个学科之间能否实现“融合发展”存在不同的思想认识，认为党史党建“融合发展”容易导致党史被弱化，同样不利于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整体性发展，就必须打消诸多顾虑，才有助于学科的融合发展、长远发展。

### （二）学科融合人才短缺

学科发展，人才为要。有一定的人才队伍，才能持续推动党史党建学科朝着共同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研究视角等方面发展，进而实现融合发展。从目前的情况看，P市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有专职教师4名，研究方向各不相同，但大都偏向党建领域，党史研究涉猎较少，未凸显一级学科的功能作用和优势学科的重要地位。因受到教研岗位编制数量的限制，教研室已经多年没有新进教研人员，师资队伍面临青黄不接、人才断层、后继乏力的困境。P市各县级党校本身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师大多兼任行政事务，专门从事党史党建教学与研究的人员较少，专业背景不强。近几年，市县两级党校通过人才引进或公开招聘等方式引才，但是引进人才中鲜有党史党建专业背景的科班人才，党史党建领域领军人才、带头人才更是极度缺乏。“有学者经过初步统计后指出，目前全国‘中国共产党历史’本科专业招生的高校约有12所（有些高校仅在教育部备案，但未实际招生）。”<sup>[9]</sup>而高校、党校、社会科学院等培养的“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专业的硕士、博士毕业生只有少部分入职基层党校，数量上无法满足学科融合发展的需要。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设立后，这方面的人才培养才刚刚开始，效果还未显现出来。人才短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

### （三）学科融合能力薄弱

中共党史党建学作为新晋的一级学科，必然需要构建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一级学科视域下，推动原“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两个二级学科实现融合发展，要求相关教研人员具备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学术研究能力。推动研究对象融合、研究领域融合、研究视角融合、研究方法融合等都对基层党校相关教研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F省P市党校系统党史党建学科的大多数教研人员并未经过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和学术训练，加上基层党校偏重宣传宣教，缺乏有深度的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在学科融合发展上容易出现党史和党建各管一摊的“两张皮”现象。如，宣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往往就党建谈党建，缺乏党史维度，史论结合不够，没有站在百年党史的宏阔视野上考虑问题。

## 三、推进基层党校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的路径探析

F省是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南方重镇和理论高地，党校系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军。据统计，F省党校系统有省级党校1所，副省级党校1所，市级党校8所，国家级试验区工委党校1所，县级党校80多所。其中，基层党校占据大多数，理应在构建闽派社会科学和“社科强省”建设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中探索出有效路径。究竟该如何融合？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一级学科“绝不是原有党史学科和党建学科的简单相加，更不是各顾一摊、各执一端，而是要实现这两个学科的融合发展，进而担负起该学科应有的使命”<sup>[10]</sup>。这是当前学界的普遍共识，基层党校也应该在此理念指导下推进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

### （一）从优化顶层设计中加强融合

“2024年1月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要求（试行版）》，将中共党史党建学

一级学科下设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等4个二级学科”<sup>[1]</sup>，为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提供了权威依据和具体方向。自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设立后，党校系统也陆续开始探索党史党建融合发展的路径，从顶层设计上建立相应的学科发展平台，如贵州省委党校成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中心、山东省委党校成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这对加强基层党校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起到规范指导和引领作用。推动基层党校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也需要优化顶层设计。一方面，中央党校和省级党校层面应当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引，不断加强中共党史党建学课程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围绕中共党史党建学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以及学科理论、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对基层党校党史党建融合发展给予业务指导。具体来讲，就是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视域下，结合党校工作实际，从如何打造党史党建融合的精品课程、如何撰写党史党建融合的科研文章和决策咨询件等方面，加强对市县两级党校党史党建教研人员的业务培训。另一方面，市县两级党校要认真落实顶层设计，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深刻认识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设立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基层党校系统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的重大作用，避免出现“上热下冷”现象。及时梳理基层党校党史党建学科在教学、科研、咨政方面存在的短板和不足，有效借助上级党校的师资力量和研究平台，积极推进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

### （二）从建设人才队伍中加强融合

学科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人。前述问题的解决，关键要有一支能研究学科前沿问题的人才队伍。推动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当务之急是抢抓机遇，利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设立和下属二级学

科设置的契机，培养基层党校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专业人才，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动态师资库，为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积蓄力量。一靠外来引入。基层党校在引进或公开招聘新进教研人员时，可以适当向“中共党史党建学”专业倾斜，在编制允许范围内统筹使用，为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注入新生力量。二靠内部培养。通过建立传帮带、访问学习和挂职锻炼等培养机制，重点培养一批专业基础知识扎实、学术创新能力突出的中青年师资队伍，厚植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的人才优势。三靠整合人才。利用数字信息技术，依托地方党委政府人才管理部门，摸清市域范围内党史党建专业人才底数，建立市域中共党史党建学专业人才库，将高校、基层党校、科研机构、地方史志办、党建办等部门的相关人才纳入统一管理，整合人才资源，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共同提升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 （三）从提升学科素养中加强融合

党史党建学科要内涵式融合发展，必须提升师资队伍理论素养，练好内功。作为基层党校党史党建学科的教研人员，要特别注意提升三个方面素养：第一，政治素养。党校不是一般学校，党校教育培训对象不是一般学生，政治上必须有更高的要求。基层党校系统学科建设特别是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必须注重提升师资队伍的政治素养。基层党校系统党史党建学科教研人员必须时刻牢记“党校姓党”根本原则，始终坚守“党校初心”，自觉地坚持和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导自己的教学、科研、咨政工作，坚持用学术讲政治，做到学术探索无禁区、党校讲坛有纪律，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第二，学术素养。基层党校系统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必须提升该学科教研人员的学术素养，厚植专业功底。当前，学界关

于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在研究对象同一性、研究指导思想同一性、研究目标同一性等方面取得一定共识，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三大体系”成果也逐渐丰硕。党校教研人员应当充分吸收学界关于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通过学术交流、师资培训等方式，提升学术素养。另外，基层党校系统党史党建学科教研人员还要处理好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的关系，要使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互相促进，以研究促进宣传、以宣传促进研究，二者相得益彰。第三，创新素养。推动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亟需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探索创新，以打造原创性和标识性概念为出发点，提升学术原创能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因此，基层党校党史党建学科教研人员“必须增强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在学术界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精神，在结论观点、使用材料、研究方法、研究领域、探索视角、布局谋篇等方面进行行之有效的创新探索”<sup>[12]</sup>。

#### （四）从突出地方特色中加强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校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坐而论道，而要有党校的特点。”<sup>[4]21</sup> 党校不同于高校，基层党校也不同于中央党校和省级党校。在推进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过程中，必须注重学科分类建设，突出侧重点，找到融合点。F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也是“中央苏区”所在地、“古田会议”召开地、“长征出发地”，具有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的独特优势。以P市为例，这里孕育出了“闽中红旗不倒”精神、东圳精神、木兰溪治理精神等，也创造出了“党建引领、夯基惠民”“全市一张图、全域数字化”等党建品牌，并成功入选“中国改革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和“2023年全国社会治理创新案例”，这些都是党史党建学科领域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实践成

果。基层党校要重点围绕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深挖和用好这些“理论富矿”，大力推动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当前，“学习党的历史”正式写入党员义务，“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写入基层党组织的基本任务，同时党中央还专门出台《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以及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和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现实要求，都为基层党校加强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提供了明确路径和实践场域。在此基础上，基层党校要结合新时代的任务要求，聚焦主责主业，充分挖掘地方党史、基层党建创新案例等党史党建教学内容，在一级学科视域下开发地方特色的党史党建课程，围绕地方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开展好对策性研究。比如，可以重点围绕基层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党务创新实践等，努力实现教学出题目、科研做文章、成果进课堂、咨询进决策。

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一级学科后，基层党校不能当局外人，不应该“袖手旁观”、坐失良机，应该深入思考如何把握历史机遇，在教学、科研和咨政工作中，找到党史党建两者之间的融合点和方式方法，在研究范围、内在逻辑、知识体系的一致性中探索具体融合路径，同时要推动中共党史党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联动发展，走出一条基层党校系统的特色学科发展之路。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43-44.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32.
- [3] 郭若平.从党校教育看“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理差异及其调适[J].中共党史研究,2023(01):54-58.
- [4]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5]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J].求是,2023(07):4-13.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75.
- [7]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EB/OL].(2016-05-18)[2024-07-01].<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html>.
- [8]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EB/OL].(2019-11-03)[2024-07-01].[https://www.gov.cn/zhengce/2019-11/03/content\\_5448149.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19-11/03/content_5448149.htm).
- [9] 吴志军.关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调研报告[J].中共党史研究,2023(03):117-135.
- [10] 丁俊萍.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融合发展的历史基础、现实逻辑与若干思考[J].党史教学与研究,2023(03):17-29.
- [11] 宋学勤,卫玮岑.一级学科视域下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的建设[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4(02):5-22.
- [12] 师吉金.一级学科视域下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思考[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22(05):36-41.

责任编辑:丁春华

(上接第36页)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1).
- [3]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15.
- [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44.
- [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7]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3-11-19(02).
- [8] 习近平.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J].求是,2023(1):4-14.
- [9]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5.
- [10]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
- [11] 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N].人民日报,2023-03-06(01).
- [12]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0(13):4-15.
- [13]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三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1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27.
- [15]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3-11-19(02).
- [16] 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J].求是,2023(16):4-8.
- [17] 习近平.国家主席发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N].人民日报,2024-01-01(01).

责任编辑:丁春华

# 新质生产力赋能福州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探析

叶娟惠

(福州市社会科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新质生产力可以促进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绿色发展, 推动传统海洋产业升级与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构建, 推动互利共赢“蓝色伙伴关系”的建立。但目前福州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着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协调发展不足、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大等现实困境。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 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要聚焦海洋新兴产业, 推动海洋全产业链协同创新; 要促进新质生产力与海洋产业融合发展, 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要强化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的理念, 筑牢海洋保护屏障。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 福州市

**中图分类号:** F127; P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4) 06-82-9

2023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2024年1月3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024年3月5日, 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新质生产力是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为主导的生产力, 不仅是符合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力<sup>[1]</sup>, 也充分代表着海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 有利于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而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那么, 新质生产力在理论逻辑上如何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驱动福州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有哪些? 要大力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 赋能福州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应重点抓好哪几个方面的工作? 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有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在海洋经济中的应用, 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 一、新质生产力赋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一) 通过要素升级促进海洋科技创新实现革命性突破

海洋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高素质的新型劳动者、先进的劳动资料、更广阔的劳动对象的深刻变革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 加速海洋科技的革命性突破, 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海洋战

**作者简介:** 叶娟惠, 福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略型人才 and 海洋应用型人才等高素质新型劳动者，基于更加专业的知识和先进的技术，在深海智能技术与装备、海洋工程装备、蓝色粮仓、可再生能源和海洋环境安全保障等领域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颠覆性突破，推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发展产业。〔2〕二是引入了海洋新材料和海洋新技术的生产工具等先进的劳动资料，这些劳动资料具有高效、智能、安全、低碳等特点，提高了海洋装备的耐压、耐盐和耐腐蚀等性能，加快海洋经济由“深海进入”转向“深海探测”迈向“深海开发”，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是从浅海、近海到深海远洋、极地太空等更广阔的劳动对象，拓宽了获取自然资源的边界和物质资料的范围，丰富的劳动对象品类拓宽了海洋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力，为海洋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坚实支撑。

（二）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传统海洋产业升级与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构建

革命性、颠覆性、前沿性的科技创新成果要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以产业为载体。海洋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数据生产要素连接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的生产要素，实现要素资源优化创新配置，加快传统海洋产业向高效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依托数字技术、海洋数据、海洋人才、海洋金融等生产要素的有力支撑，构建高效协同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海洋新质生产力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运用，培育高技能劳动力、提高产品附加值，促进传统海洋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三链”融合，推动传统海洋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实现“质变”；另一方面，海洋新质生产力通过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化产业的深度融合，强化海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溢出效应，构建具有高技术含量的现代产业格局和新型海

洋产业体系，推动海洋产业实现规模性的“量变”。〔3〕我国海洋领域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比重约9:1，亟待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促进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海洋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海洋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构筑智慧海上风电、智慧海洋油田、智慧海湾等“下海新业态”，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三）通过生态型经营驱动海洋经济实现绿色发展

海洋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能够提升海洋资源、海洋环境的承载力，提高自然海洋与经济海洋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海洋产业朝着低污、低耗、低碳的生态经营模式转型，实现海洋经济绿色发展。〔4〕一是新质生产力助力海洋产业集约、高效、绿色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通过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创新、技术迭代、优化流程等，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率，降低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减少海洋生态环境污染，实现要素和资源的节约，推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二是新质生产力助力实现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海洋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构建完整的海洋环境全域多维监测网，能够对海洋生态环境进行远距离非接触的动态观测和重点监测，解决人工监测成本高、数据不连续等问题，提升海洋生态环境的治理能力和水平。三是新质生产力助力解决海洋环境污染问题。海洋新质生产力借助海洋生物技术和生物治理工具，能够有效解决生物入侵、原油污染等海洋环境问题，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四）通过开放合作建立互利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

海洋的开放性和连通性决定了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国内发展情况，并积极与国际接轨。海洋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推动海洋治理的国际

共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具体务实、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助力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一方面，海洋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助力“蓝色伙伴关系”的建立。不同国家和地区通过数据共享、技术共享、技术互助等，推动海上基础设施、海洋科技、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与交流合作，降低发展“蓝色经济”的成本，实现全球海洋资源的优化配置，共同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海洋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提高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的制定与实施能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开展“蓝色经济”的政策对话与磋商、拓展全球“蓝色伙伴关系”、推动海洋领域全方位协调合作提供了平台，提升中国在海洋经济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为中国全球海洋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有力支撑。

##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福州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不能适应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1. 涉海科研力量相对薄弱，核心竞争力有待加强。虽然福州市积极做大做强福州海洋研究院、成立6个海洋重点产业联合研发中心、成立福州市海洋与渔业科技创新联盟、布局建设了海洋经济科创高地，但是从事海洋科技研究的专业机构，如海洋技术创新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等科研机构数量较少，与青岛、厦门等沿海城市相比，整体科研力量分散，海洋科技投入低、科研能力薄弱，海洋科技创新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缺乏核心竞争力，海洋科技人才队伍的质量和结构不能满足海洋科学研究能力提升的需求，制约福州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涉海企业规模小，海洋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有待提升。2023年福州市海洋经济重点企业共158家，其中民营企业的数量和产值占比均在70%左右，海

洋新兴产业以福清市新大泽螺旋藻有限公司为代表，海洋船舶修造以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和福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现代海洋渔业以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虽然福州主要涉海企业已初具自主创新能力，但拥有完整自主科技创新研发能力的大型企业较少，具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不多，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不够，创新意识不够强，开展科技创新研发的动力不足，以至于海洋资源开发科技含量不高、深度不够，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率较低。<sup>[5]</sup>

3. 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产学研一体化格局有待完善。西方国家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以上，而我国的平均贡献率只有30%左右，海洋科技创新对海洋开发的引领和支撑作用相对不足，海洋科技成果转化速度较慢。福州海洋科技成果颇丰，但“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政产学研用”之间创新合作机制不够健全，造成部分海洋科技成果缺乏实际应用价值。同时，福州市海洋科技创新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科研，轻推广”的现象，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产业化平台建设不够完善，实际应用价值高的科技成果未得到有效推广和运用，制约了科技产业化和科技产业规模化。

（二）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协调发展不足，制约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构建

1. 海洋产业结构不平衡，不利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虽然福州海洋三次产业总体呈现“三二一”的结构，但第一产业比重偏高，海水养殖、远洋捕捞、水产品加工等海洋传统产业占比大；海洋第二产业比重低于国内其他沿海城市，海洋船舶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等尚处于初级阶段，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扶持力度不够；海洋第三产业占比低，海洋信息服务、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等海洋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有待进一

步创新发展。福州海洋产业“以养为主，养捕结合”，海水养殖业居于主导地位，产值占比约70%左右，近海捕捞业产值占比约20%左右，远洋渔业产值占比约10%左右，海洋传统产业占比高、新兴产业占比少，高耗能产业多、绿色产业少。<sup>[6]</sup>

2. 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低，制约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福州过度依赖海洋资源而形成了单一的产业结构，大部分产业存在于产业链的低端，新兴产业发展的动能不足、培育机制不够完善。福州近海捕捞业以“大小鱼通吃”的拖网、张网作业捕捞为主，捕捞方式粗放，捕捞作业结构不够合理，远洋渔业捕捞以粗加工产品为主，水产品经济附加值低，产品精深加工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而海水养殖业以家庭经营为主，生产规模较小，技术含量低，分散程度较高，承受风险能力弱，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同时，福州海洋上下游产业链延伸不够，高端服务业占比低，海洋第二、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不够合理，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低，不利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发展不足，海洋产业体系“供给老化”明显。福州作为沿海省会城市，拥有福州大学海洋学院、福建农林大学海洋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海洋与生化工程学院等一批涉海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但存在海洋科研与产业发展还不能完全融合，科技创新的人力物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充分整合，海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不高，“研用脱节”等问题。福州海洋传统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科技含量高的新兴产业和高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海洋传统产业亟待通过科技创新、效率变革和结构调整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发展，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

(三) 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大，制约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人口集聚和沿海工业发展，增加海洋资源环

境压力。一是污染物未经有效处理直接排入海中，污染海洋环境。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随着福州市用海项目的开发建设、沿海工业企业项目的增加、沿海人口的集聚发展，海洋污染物的处理能力不能满足海洋开发的需要，生活垃圾、生产垃圾等污染物未经合规处理直接排入海中，特别是闽江口和罗源湾海域，给海洋环境带来压力。二是非法采挖海砂，破坏海洋环境。由于利益的驱使以及海洋执法不严、监管的漏洞，采挖海砂的黑色产业不断壮大，不仅破坏了海洋生物的栖息地和繁衍场所，而且破坏了海底的生态环境系统，给海洋环境带来不可逆的破坏。三是渔业拖网捕捞作业网具的反复拖曳影响海洋渔业资源，海水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养殖污染垃圾也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污染。

2. 海洋环境监测和预警服务平台不够完善，限制了对海洋环境的认知。虽然福州近海海上试验场已初具规模、福州一站多能海洋综合观测监测检验平台已建成并投入使用，但与山东威海国家浅海综合试验场、浙江舟山国家海洋试验场等沿海城市试验场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部分区域监测点的覆盖范围不够广，监测数据的质量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对海洋环境的监测和预警综合平台还不够完善、技术水平还不够高，无法实时有效获取海洋环境相关数据，在应对海洋生物灭绝、外来物种入侵、海平面上升、赤潮等海洋环境破坏和海洋自然灾害时，难以通过科技手段及时采取有效的预警防控措施，不利于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技术政策不够健全，制约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在全国层面缺乏关于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系统性规划，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相关规定的源头治理思路不够清晰，缺乏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整体性、统一性

规划和指导,缺乏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后的绩效评价和监督要求,系统完整的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标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在地方层面缺乏关于海岛、海域、海岸带保护修复的系统修复、陆海统筹的规划或行动方案。虽然,福州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作,积极推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制定了《福州市“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专项规划》《福州市“十四五”渔业发展专项规划》,但系统完整的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技术标准体系不够健全,普适性的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文件尚未形成,制约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的开展。

###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福州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

海洋新质生产力对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推动福州“向海进军”的关键。要提升海洋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能力,促进新质生产力与海洋产业融合发展,发挥科技创新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同时强化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的理念,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 (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坚持自主创新发展

1. 支持涉海院校和科研机构建设,打造福州海洋创新人才高地。一是根据福州市海洋食品与生物医药、海洋新材料与新能源、海洋装备、海洋生态环境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加强福州海洋研究院、海洋领域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建立海洋领域实质性科技创新联盟,加强海洋科技联合攻关,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二是支持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闽江学院等福州本地高等院校建设特色优势海洋学科,提升福建海洋职业技术学校、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的海洋产业技能教育水平,加快福州船政海洋(职业)大学建设,争取海内外一流海洋高校院所来榕合作办学或建设虚拟大学,加强海洋人才

培养,打造福州海洋创新人才高地。三是依托“榕博汇”“闽都人才集聚工程”“闽都英才”等人才创新工程,引进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海洋领军人才,探索建立灵活、多样的人才管理新机制,“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组建一支结构、类型、层次多样化的高层次、多领域的海洋人才队伍。

2. 提升涉海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激发创新主体活力。一是支持海洋龙头企业建设高水平的海洋创新实验室、海洋技术研究中心,对海洋核心技术问题进行系统化研究;鼓励大中型海洋企业与涉海院校和科研机构就海洋关键技术进行联合攻关,提升海洋企业关键技术的开发能力;鼓励中小型海洋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联盟等方式,为企业的产品开发、工艺创新、管理创新等提供技术支持。二是推动海洋科技创新孵化器的建设,借鉴“创业导师+创业辅导+专业孵化”的培育孵化模式,加大中小微海洋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培育力度,使海洋企业从小变大,海洋产业由弱变强,形成一批具有创新活力的海洋科技型企业,加快构建完善的海洋科技创新孵化培育体系。三是支持福州涉海院校与海洋企业联合共建海洋人才培育基地和见习实习基地,合作开展海洋职业技能培训、海洋科技创新创业培训,创新水技人才、“蓝色工匠”和新型职业渔民培训工程,提高海洋工作者的科技创新技术应用水平,提升涉海人才的综合素质。

3. 推动海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打造海洋科技开放共享平台。一是加大海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的政策支持力度。修订完善海洋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相关政策,加大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关于海洋科技成果转让、许可、作价投资等成果转移转化自主决定的政策支持力度,落实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所得税递延纳税等支持政策。二是加强海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平台的建设。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

渔业周·渔博会、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等为平台，引导海洋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沟通协作，促进海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三是完善海洋科技创新成果推广服务体系。依托国家技术转移海峡中心、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协作福建分中心、“知创福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等，为海洋知识产权注册申报、科技成果咨询和评估、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科技融资代理等提供专业服务，加速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同时，积极推进海洋技术成果交易市场建设，打造集展览展示、项目推介、信息咨询、技术诊断、专利转让等于一体的多元化服务平台，多措并举拓展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渠道。

## （二）聚焦海洋新兴产业，推动海洋全产业链协同创新

1. 加快动能转化，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一是在海洋科技新兴产业方面，壮大培育海洋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依托东南造船厂、马尾造船厂等海洋装备制造企业，重点突破多用途海洋工程船、远洋船舶、高端海工装备制造等领域的核心技术瓶颈，推动海洋船舶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支持创新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小企业，重点开发高市场占有率、高附加值的智能化深远海养殖平台、深海采矿、新型冷冻压缩机、大功率风电机组等海洋装备，推动连江等海湾建设海洋工程装备总装基地。二是在先进海洋服务业方面，重点发展海洋通信与大数据产业、海洋环境监测服务业等产业，提升海洋信息服务业水平，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大活力。加快实施“宽带入海”和“光纤入岛”工程，完善海上通信设施和海洋观测站；依托滨海新城智慧海洋大数据中心、“清华—福州数据技术研究院”等，提升海洋导航、水文气象、航运管理、跨国海洋电子交易、海洋物联网等服务海洋发展的能力。三是在未来海洋产业方面，重点发展海上风电、“渔光互补”

光伏、福清核电等临海能源产业，形成海洋经济的新增长点，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sup>[7]</sup>

2. 加速优势资源集聚，促进海洋产业集群发展。积极探索“龙头企业+产业集群+特色园区”的创新发展模式，通过海洋产业集群发展实现海洋新质生产力在空间布局上的优化，加快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一是提高临港产业集聚水平。重点打造江阴、可门、罗源、松下等四大千亿特色临港产业基地。江阴港城经济区依托坤彩科技珠光材料、友谊新材料专业胶带、聚氨酯、丙烯等产业优势，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千亿级化工新材料基地。可门港经济区以聚酰胺产业和动力储能电池配套产业为切入点，大力发展聚酰胺材料及动力储能电池新材料，培育先进织造染整产业，打造千亿级化工新材料产业基地。罗源湾以宝钢德盛、三钢闽光等为龙头企业，重点发展高附加值不锈钢、碳素结构钢、精密合金钢、耐候结构钢等特优钢、特种钢，打造罗源湾北岸千亿级不锈钢生产基地。松下港区是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和国家首批进口粮食指定口岸之一，构建“一条鱼、一块肉、一粒果、一袋米、一桶油”大宗食材供应链，打造全国及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综合性食品产业中心。二是大力发展海洋产业园区。推进福建海峡现代渔业经济区、元洪国际食品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建设，加速闽台（福州）蓝色经济产业园的改造提升，打造连江浦口、马尾亭江、福清元洪和龙田等特色水产预制菜产业园区，提升海洋产业园区标准化水平。

3. 强化创新引领，推动海洋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海洋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发展要从两个方向着力。一是围绕海洋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做大做强产业链的主企业，深入了解水产养殖、远洋捕捞、加工等海洋产业的发展需求和技术瓶颈，针对产业链的薄弱环节部署创新链，推动海洋创新技术的运用，实现产业链的补链、固链和强链。同时，

根据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对海洋产业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针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开展科技创新,将创新链嵌入到产业链中,对产业链关键技术进行攻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促进传统养殖、水产品加工等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福州海洋研究院等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是创新链的主体,要主动对接海洋产业、海洋企业的需求,加速海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实现海洋行业先进技术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打造从技术研发到试制运用的耦合“双链”模式,推动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使创新链的成果真正转化为海洋经济效益。强化福州作为东南沿海重要门户、福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枢纽城市的功能定位,重点依托国家海洋经济示范区和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建设,促进闽江口湾区资源统筹开发,优化海洋资源市场要素配置,探索涉海金融服务模式创新,营造清新友好的海洋企业营商环境,进一步推动海洋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和现代化协同。

(三) 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1. 大力发展生态高效养殖业,促进养殖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加快海上传统养殖设施优化升级。开展生态增养殖工程,推动木质网箱、筏式吊养等近海传统养殖设施改造,开发舱养式养殖工船等大型深远海养殖装备,构建半潜式、全潜式深远海装备养殖平台,推动从近海养殖走向深远海养殖,促进养殖的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实现海洋产业和海洋生态协调发展。科学规划深远海养殖产业链,加强深远海养殖产业链主的引领带头作用,建立深远海养殖企业和产业联盟,实现海洋产业集聚发展。二是科学布局海水养殖空间。开展养殖苗种创新工程,合理规划养殖品种和规模,解决养殖户品种单

一、跟风养殖的难题。在海洋生态的承载能力范围内,采用立体化、多层次的养殖方式,确定养殖密度和养殖规模,通过海洋空间资源利用率最大化,实现海洋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三是创新现代化海水养殖模式。大力扶持涉海企业发展陆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抗风浪深水网箱养殖、标准化池塘养殖等高效生态养殖方式,推进连江、福清国家级海洋牧场建设,开展石斑鱼、大黄鱼、鲍鱼等立体式、生态型海上智慧养殖,提高福州市水产养殖自动化程度和集约化水平。

2. 大力发展现代远洋渔业,打造完整的远洋渔业产业链。一是鼓励远洋渔业企业提升质量效益。积极引导投融资机构和远洋渔业龙头企业建设现代化远洋渔业船队,对远洋渔船和装备进行改造升级,鼓励“造大船、闯深海”,发展大洋渔业,延伸过洋性渔业,开发南极磷虾资源,提升远洋渔业质量和效益。加快宏东远洋渔业产业园、深海时代产业园建设,鼓励龙头企业集聚行业力量,建设国内外远洋渔业基地,推动远洋渔业全产业链发展。二是加快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建设。按照“一港、两园、三中心、五区”规划,加快远洋渔业母港等基础设施建设,引导远洋渔业上下游企业投资建设加工配送中心、冷链物流仓储等项目,带动加工、物流、商贸等相关产业发展,完善“远洋捕捞、水产品交易、冷链物流、水产品精深加工、渔需物资、总部经济”全产业链体系,打造海洋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现代远洋渔业集群。三是加快构建远洋渔业“一条鱼”全产业链。引进“卫星+互联网+渔业”一站式数字渔业服务平台,完善资金、智库、人才等远洋渔业发展保障体系,加快建设集交易、结算、信息、金融、展销、商务等功能于一体的远洋水产品交易市场,实现远洋水产品线上线下交易互通,打造远洋渔业完整产业链,通过发挥“一条鱼”全产业链的整体效应,推动福州海

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促进水产品精深加工流通,推动水产品加工系统化和基地化。一是推进水产品加工优化升级。重点培育对虾、鲍鱼、海带、烤鳗、鱼糜制品等五大福州特色水产加工类品牌,提高藻类、贝类、低值鱼类等大宗产品、低值水产品的高值利用技术,发展鲍鱼、鳗鱼、鱿鱼等珍品精深加工及综合利用技术,引导企业开发海洋生物制药和海洋功能性食品,提高水产加工的技术含量,提升水产品附加值,延伸水产加工产业链。二是推进水产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发展。集合福清龙田镇全国农产品加工业示范基地、马尾快安长安沿线水产品加工基地、福建海峡西岸(连江)水产品加工基地等三大水产品加工基地,发挥马尾冷链物流优势,形成上游深远海海工装备养殖、中游高附加值水产精深加工、下游冷链骨干物流基地的一体化福州水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聚区,推动水产品加工精深化和全产业链发展。三是推进加工水产物流体系建设。加快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提升渔区产地水产品冷链物流配送能力,扩大水产品冻库和冷链规模,完善从海上、渔船到餐桌的水产品全冷链物流体系,打造国际冷链物流枢纽。依托海峡国际农产品物流园,发挥电子商务的平台作用,培育高标准、高效率的水产品产业化流通新业态,打造水产品商贸流通枢纽平台。

#### (四) 坚持陆海统筹,筑牢海洋保护屏障

1. 强化海洋空间资源管控,实现海洋资源有效利用。一是提升海洋资源的有效利用能力。在坚持依法管海用海、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海洋技术创新,充分挖掘海洋资源的经济价值,开发利用海风、海水、海浪、滩涂等海洋资源,发展清洁能源、深海养殖等海洋高技术产业,实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海洋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的协调发展。二是健全海洋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科学规划港口、航运、

养殖、围垦、临港工业、旅游等项目的开发建设,实现海洋生态环境系统保护和污染防治联动。探索建立海洋与渔业、自然资源、海事、海警等涉海部门的执法协作机制,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海洋生态环境管理平台,凝聚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研发团队、船舶设备、人员队伍等,促进海洋生态环境管控的精准化、专业化。三是提升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监管能力。加强闽江口、可门、江阴、福清核电等重点海域生态环境实时监测能力,完善海岸溢油、化学品泄漏污染等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预警预测和联动应急机制,构建海陆空“三位一体”的监测网络;针对海洋重点养殖区,在赤潮高发的4—6月份,实时监测分析海域赤潮,及时发布赤潮预警信息,完善赤潮预测监视体系;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监测,构建海洋生物生态监测评估体系,满足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监管需求。

2. 加强海洋环境治理,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一是加强海洋生态恢复修复。开展海洋生态环境补偿试点工作,探索以增加蓝色碳汇和增强气候韧性为导向的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新模式,在闽江口、福清湾、罗源湾、兴化湾等海域实施互花米草防控治理、红树林保护修复、海岛生态修复、海岸生态修复、“退养还湿”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推进福清、连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促进海洋生态系统的高质量保护。二是加强入海河流综合治理。加强福清湾、罗源湾、兴化湾等临港工业集中区污染物的治理,定期监测临海工业区排污海域的环境质量,使闽江、敖江、龙江入海水质100%达到目标要求,持续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加快沿海、江河沿岸各乡镇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处理设施建设,构建入海排污口“一口一证”“一口一档”“一口一策”的动态管理机制,实现入海河流—河口区域治理常态化、网格化和动态化。三是加强海上污染分类治理。控制港口船舶污染,提高船舶、

港口防污设备的配备率,提升船舶含油废水、残油、废油、化学品洗舱水、船舶垃圾等分类接收处置能力。加强海水养殖污染防治,促进传统“木质+泡沫浮球”养殖设施改造升级,推广环保型全塑胶养殖渔排和深水抗风浪养殖网箱,实现绿色海洋生态养殖。加强海洋工程和海洋倾废环境监管。构建海洋倾废实时全过程监管体系,加强废弃物海洋倾废许可证办理、废弃物海洋倾废区选划等工作,实现常态化监管。

3. 发展海洋碳汇产业,助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鼓励发展海洋碳汇产业。充分利用福州海域、滩涂和岸线资源,发展海藻、海洋微生物、海上风电、滩涂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提高海洋减碳、固碳、储碳能力,推进海洋碳汇生态系统修复工程,将绿色生态价值转化为海洋经济价值。二是支持海洋碳汇示范区建设。在罗源、连江等地开展海湾碳汇潜力核算和提升,推进人工鱼礁和海洋牧场建设,对示范海域的碳储量、碳汇量等状况进行调查和评价,支持海洋碳汇基础能力建设,开发蓝碳碳汇项目,推动蓝碳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和可持续利用,实现蓝碳生态系统经济价值。三是创新“零碳”海岸带发展新模式。积极探索在海岸带建设“零碳”示范区,开展滩涂和浅海贝藻类养殖、绿色海水养

殖等海水养殖增汇试点工作,支持涉海企业建立碳基金,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岸带“零碳”经济发展新模式,助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 参考文献:

- [1] 谢宝剑,李庆雯.新质生产力驱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东南学术,2024(03):107-118+247.
- [2] 马文婷,邢文利,高若.数字经济赋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J].经济问题,2024(06):42-50.
- [3] 杜传忠,疏爽,李泽浩.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经济纵横,2023(12):20-28.
- [4] 蒋永穆,薛蔚然.新质生产力理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系框架与路径设计[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4(05):81-92.
- [5] 林治良,赵旻.科技创新驱动海上福州建设[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02):114-120.
- [6] 杨婷.“海上福州”战略背景下福州海洋经济竞争力的评价与提升策略[J].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04):10-14.
- [7] 刘小锋.海洋强国视域下“海上福州”建设路径研究[J].发展研究,2017(12):63-68.

责任编辑:郑梅钦

# 福文化在福州上下杭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的

林崛翊

(中共福州市台江区委党校, 福建 福州 350004)

**摘要:** 福文化是中华特有的传统文化。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拥有丰富的福文化资源, 包含商贸文化、会馆文化、民俗信仰文化等资源, 这些资源组成了上下杭独特的福文化, 让上下杭成为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承载地。从活态传承视域出发探讨福文化在上下杭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思路, 对促进福文化在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活态传承; 福文化; 上下杭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4)06-91-6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 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我们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 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sup>[1]</sup>福文化是中华特有的传统文化。千百年来, 过上富足殷实的幸福生活一直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美好梦想, 他们将这种梦想融入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形成多姿多彩的福文化, 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符号。研究福文化, 利用好、传播好福文化, 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

## 一、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福文化的表征

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处于福州城市的中轴线上, 紧靠闽江, 为闽商发祥地、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节点, 拥有丰富的福文化资源。它不仅保留了丰富的实体遗存, 还拥有商贸文化、会馆文化、民俗信仰文化等资源, 组成了上下杭独特的福文化, 让上下杭成为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承载地。

### (一) 商贸文化

闽商文化是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化,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 年首届世界闽商大会对闽商精神作了最佳注解——“善观时变、顺势有为, 敢冒风险、爱拼会赢, 合群团结、豪侠仗义, 恋祖爱乡、回馈桑梓”, 成为闽商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中国人强调修身养德, 认为高尚的道德品质是成就事业与完善人生的基础, 只有入世有为、敢于担当、立功立德、贡献社会, 才能成为真正幸福的人, 因而道德修养是福报之源、幸福之基、信仰之灯<sup>[2]</sup>。这正是闽商对幸福人生的价值追求。

上下杭是闽商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自清末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后, 上下杭因水陆交通便捷

作者简介: 林崛翊, 中共福州市台江区委党校讲师, 研究方向: 社会学。

成为各国商品的集散枢纽，商业街市迅速发展，一时间商家比肩、行栈林立，街区经历了商业发展于明清、通商开埠达鼎盛、近代革命渐衰败、建国改造功能变更等不同的阶段，谱写了福州商贸发展的辉煌篇章。<sup>[3]</sup>一些商人们不满足于只在福州及周边地区发展，从上下杭起航，把商务拓展到台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各国，开启寻福、造福之路。他们不忘初心，不断延展闽商文化的精神内涵，展现积极向上的福建商人的精神风貌和道德修养。从恪守祖训、坚持药真价实的徐建禧，到信守“纸票可随时兑回银圆”诺言的蔡友兰；从创办“星系”报业，为抗日救亡、弘扬中华文化作出贡献的胡文虎，到为阻挡日寇从水路侵入福州，自沉3艘3000吨商船的欧阳康；从组织成立“去毒社”，为“去毒社”“救火会”捐助救济款的张秋舫与罗金城，到出资创办槟城“三山学校”的杨鸿斌……上下杭活跃着这样一批商人：他们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以开放的心态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业伙伴，共同推动街区的繁荣与发展；他们讲究诚信经营、回馈社会，热心于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他们在面对国家、民族危急关头，心存民族大义，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这些都是闽商精神在上下杭中的重要体现，也是他们修身养德，追求高尚情操的价值体现。

新时代，广大闽商们践行着“诚信为本”“达则兼济天下”的重要理念，在全球商业竞争中保持自强自信、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态度，在各大行业领域展现时代风采。闽商精神已然成为永不磨灭的精神力量，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贡献了福建力量。

## （二）会馆文化

为了营造喜庆吉祥的氛围，人们会在建筑选址、装饰艺术、空间布局等方面融入福文化元素，形成特色鲜明的建筑文化。在上下杭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会馆。上下杭历史上曾有14所会馆，这些会馆的建筑大多堂皇精美，不少是继承祖籍地的传

统特色，并吸取福州地区艺术风格，个别也有采用西洋欧美式的。<sup>[4]</sup>例如永德会馆，会馆楼房共三层，第一、二层拥有较多西式建筑元素，第三层是民国重建时仿清代会馆建筑中的厅堂部分，歇山顶的设计为这座建筑增添了几分古韵，左右两侧挂落设计不同，保留有永春县和德化县工匠们特殊的建筑风格，是典型闽南祠堂建筑风格与西洋建筑的完美融合。古田会馆始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经过多次重修，如今仍保持着原有的风貌。重檐歇山顶，抬梁穿斗式减柱造构架，正厅和中厅皆有藻井，藻井饰金，精雕细刻，别有风格。<sup>[5]</sup>有的会馆与神庙合为一体，如南郡会馆四面红砖清水墙，进门依次为戏台、天井（两侧走酒楼）、大殿、厢房鱼池，大殿为重檐歇山顶，穿斗式木构架，雕木贴金，富丽堂皇，殿中祀天后妈祖；兴安会馆内进门是一个大石埕，一对青石雌雄狮分蹲左右，登石阶上正殿，中祀“天后妈祖”；建郡会馆、寿宁会馆内也设有戏台。福州商务总会魁星楼（又称“八角楼”），拥有攒尖式屋顶，穿斗式木构亭，檐角高翘，藻井木雕精美，还有山水人物画。除此之外，象征“福”的各种形态，如蝙蝠、蝴蝶、宝葫芦、莲花、喜鹊、松鹤等更是不胜枚举，潜藏各处。这些符号与会馆相互依存、相得益彰，不仅体现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还蕴藏着人们对“福”的向往追求、对美好生活的企盼，饱含工匠们的智慧与情感，它们共同构成了上下杭独特的“会馆文化”。

## （三）民俗信仰文化

“福文化”最早源自于民风习俗，中国民间自古就有崇福、祈福、盼福的传统，祈盼五谷丰登、天下太平。上下杭因商业集散的的特殊地位，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汇聚一堂，共同构筑起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和民风习俗。上下杭商帮众多，各大商帮建立会馆议事、互通商业情报，他们利用节庆举办各类活动，祈求神明对商业发展及出海平安顺遂的庇

佑。根据《双杭名阜》记载：“上下杭街区的商业发展与民间信仰密切相关。最初人们因张真君祖殿前存在河水‘两头涨’现象，而将它与商贸活动的美好寓意联系在一起。随着上下杭街区商业发展，各地商人聚集于此，带来各地区不同形式的民间信仰。”<sup>⑥</sup>上下杭会馆林立，这些商人将各地不同形式的民间信仰带到这里，丰富了街区的人文风俗，也让上下杭成为福建民间信仰的交融地。街区内拥有“商神”张真君、“海神”妈祖、“诚信神”关帝、“海神”陈文龙、“水神”陈靖姑等民间信俗，其中陈文龙信俗和张真君信俗尤为典型。

陈文龙尚书庙中供奉的是南宋末年名臣陈文龙，他一生为官清廉、忠心报国的事迹家喻户晓，与岳飞、于谦并称为“西湖三忠肃”，林则徐曾为他赋联，赞颂他和文天祥“隆名并峙”，该联至今仍保留在尚书庙内。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统一中国后，将陈文龙列为神祇，命令全国各地建城隍庙，供奉他为所在地域城隍庙的主神，由此陈文龙由人变“神”。明皇帝曾3次敕封陈文龙为“水部尚书”，所以民众称陈文龙为“尚书公”，神祠为“尚书庙”。陈文龙成为以闽江流域为主体的江河交通安全的保护神，由此受到从事水上商品运输贸易的商贾和水上居民的崇拜和敬仰。陈文龙信仰在闽台及东南亚等地广为流传，在国内外拥有广泛信众，每月农历初一和十五，民众都会自发前往陈文龙尚书庙焚香礼拜，祈求神佑。在福州，陈文龙庙遗址至今尚存5座，其中位于上下杭三通桥边的尚书庙规模最大、建筑最精美、历史最古老，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2007年“福州陈文龙信仰民俗”被列入福建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张真君祖殿内供奉的张慈观是福建三大信仰人物之一，是闽台最大的农业神。据《台江区志》记载，张真君学法数载，艺成云游于闽清、尤溪、莆田、福州、德化等地，行医治病，斩蛇驱魅，扬

善惩恶，解民困厄，45岁坐化于闽清金沙演法九龙潭头，显迹于闽中大地，事迹闻之朝廷，被赐封为“都天法主监雷三元普济大师”，后被明正德皇帝敕封为“法主”神号。张真君信俗传入台江后，与上下杭独特的商贸文化相结合，由“农神”转为“商神”，福州商会和金融公会会址设在殿内，演变出商圈酬神聚会的商务习俗。随着闽商走出国门，张圣君信俗走向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以及欧美日各国和澳洲等地，信众超过千万。商人们会到张真君祖殿“祈福”，祈求生意兴隆、和气生财；请一幅张圣君的“福字春牌”给自己增添福气福运；摸一块写有五种字体“福”字的石头，以期“五福临门”等。这些形成了张真君信俗中贴福、祈福、摸福、赐福等福文化表现形式，让张真君信俗闪现着福文化光芒。

这些民间信仰与福州文化相融合，还诞生出以闽剧、十番音乐等为表现形式的“躲债戏”、“迎尚书”、诞辰日、忌辰日、“春秋祭庙会”等民俗活动，让这里的福文化具有时代性、多样性，内涵深厚，可以说是福气汇聚之地。

## 二、上下杭福文化活态传承与发展的现实价值

### （一）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

与三坊七巷、烟台山不同，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的形成从一开始就承载着百姓的美好愿景。从地理环境上看，上下杭地处“山”“水”之间，上下杭北面是惠泽山，“镇闽王”无诸、“闽王”王审知均在此册封，可以说闽都的历史就是从这里起步的，使得这里必然拥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还有一座彩气山，因“彩气”与“财气”谐音相通，深受商人的喜爱，择选在此地建房。商人们视水为“财”，“水”为三捷河，河畔坐落着一座张真君祖殿，在古时涨潮时，两头河水在此交汇，形成“两头涨水”的奇观，因此商人们认为此地为“聚宝盆”和营生的福地，纷纷抱着“不尽财源滚滚随潮而来”

的心愿云集在这里建会馆、集商帮。可见，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在地理环境上就蕴含着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美好追求和对理想、未来的憧憬。

从人文情怀上看，上下杭神祇庙宇内现今依然香火不断，前来祭拜、参加活动的信众不计其数，这些信众来自厦门、福安、霞浦、宁波、台湾等地，可见影响之大。这些富有创造力的崇福、祈福、求福、盼福、迎福、纳福等民间信仰活动赋予上下杭街区鲜活的生命力，建构起福建人民的精神支柱、文化认同、情感归属；丰富而生动的民俗文化也体现了福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城市精神；“善观时变、顺势有为，敢冒风险、爱拼会赢，合群团结、豪侠仗义，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闽商精神，构筑起上下杭独有的福文化内涵，展现了福文化在上下杭存续的独特价值。因此，福文化在上下杭的传承与发展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它已融入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和价值追求，传承发展福文化是满足人们精神寄托的现实需要。

### （二）搭建连接海峡两岸同胞亲情的桥梁

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因商贸往来，与台湾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联系。街区内的许多商人和民众都曾前往台湾发展，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和民俗活动。每逢节庆及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多有台湾的信众前往上下杭参加，搭建起闽台友谊沟通的桥梁。他们以信俗文化为基础，寻根溯源，开展民间文化交流。深入挖掘上下杭更多福文化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有利于形成“两岸同根同源、闽台一家亲”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爱国爱乡的情感提供文化滋养，为加深两岸文化交流、促进民族团结发挥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福文化在上下杭的传承与发展是各地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此相融相汇，是灿烂中华文明的缩影。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在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中得以

体现，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 （三）宣传福州城市文化形象的窗口

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消费观正在从娱乐消费向文化消费转型。福州作为全国唯一以“福”字命名的省会城市，有着“福城”“有福之州”等美誉，在推动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福文化入手，打响福文化品牌，将为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的发展带来机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举办时，位于上下杭内的罗氏绸缎庄作为福州非遗展示馆，以“五福”元素——“福乐”“福匠”“福韵”“福传”“福人”为主线，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实物展陈的方式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展示福州非遗文化，突显了福州在非遗保护工作中的突出业绩和独特魅力。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成为传承弘扬福文化的实践沃土，向世界打开展示福文化的窗口，也让世界认识了上下杭。此后，上下杭又承办了2023年“茶和天下 共享非遗”主题展示交流、2023年福州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未来已来 福建游礼”2022第五届福建文创市集启动仪式等活动。由此可见，福文化的活态传承可以提升街区的影响力，增加街区文化厚度，提升街区文化品位，打通街区的“再造”功能，更好地向世界展示城市文化形象，也为地区经济复苏和发展助力。

### 三、上下杭福文化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实践策略

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富含生动多彩、形式多样的福文化元素。无论是形式多样的口头文学、美术、书法、戏曲、陶瓷等传统技艺，还是丰富多彩的传统礼仪、节庆、游艺等民俗活动，迎福、接福、纳福、惜福等都是最为常见且最为人所喜爱的表现主题<sup>[7]</sup>。随着时代的变迁，受到经济社会发展 and 城市建设影响，许多文化符号式微，渐

渐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若不及时挽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面临极大的损失。

### （一）保存历史街区“肌体”，注重风貌管控

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因“山”“水”而生，“鱼骨”状街巷体系和多元素融合的建筑风格是其独特的魅力所在。2014年上下杭启动修复改造，采用“镶牙式、渐进式、微循环、小规模、不间断”的方式，遵循“修旧还旧，保持总体街区格局、风格、风貌不变”的原则，但仍能看到空间格局、传统建筑风貌与现代元素之间的冲突，如咸康参号原建筑载体已被榕树嵌入，带着浓重的时代印记。为呈现建筑整体景观，让街区整洁划一，施工方将榕树修剪一半，反而破坏了“修旧如旧”的建筑机理，在自然逻辑上褪去了本体性。又如，上下杭原与闽江水连通，才有“真君殿前两头涨”的独特水文景观，后因中亭街改造，新桥仔河河道变箱涵，这种景观不复存在。“山”“水”区位优势在城市化进程中湮没，使得上下杭逐渐失去文化根基。如今上下杭内还有部分建筑景观尚在改造修复中，我们要充分重视这些建筑景观内含的历史底蕴和人文精神，尊重历史记忆，在保证不影响观感及空间机理的状态下进行修复，尽可能使用传统建筑材料和工艺，特别是保留建筑设计中的福文化元素，如雕梁画栋中的福字、蝙蝠图案等吉祥符号，避免过度商业化或现代化改造，破坏其历史风貌。类似像咸康参号这样的特殊案例，应探索更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如采用特殊技术保护榕树与建筑的共生关系，既保留自然景观，又彰显文化底蕴。对于无法恢复的水文景观，可以通过设计人工水系、景观小品、数字投影等方式模拟自然水景，再现当年汇潮的历史水文景观，让游客更好感受上下杭的独特魅力。

### （二）复现会馆文化样态，突显人文价值

历史街区是城市传统文化发展、成长的根基。文化与街区的融合是基于原有城市机理发生机制

的有机生长，是在基于历史传统、社会生活和场地条件理解的“适应原则”上的空间诠释。<sup>[8]</sup>因此，文化的融入要与历史街区空间格局、功能布局相适应。上下杭的会馆文化是嵌入在上下杭文化系统中的，它的复活可以带动与它交融共生的其他街区子文化，甚至是“盘活”整个街区的精气神。<sup>[9]</sup>会馆是商帮活动交流的聚居地，目前活态利用的会馆主要用于地区特色商品售卖和文化展示，如永德会馆转型为永春德化两县文化展示馆，不仅展示德化陶瓷的精美工艺，还展示永春纸织画、白鹤拳，德化纸狮、刻纸等两地非遗风采，开设非遗研学课程。这些做法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会馆文化样态，但会馆的功能不仅于此，它还提供谈判、观戏、食宿等功能。会馆可选择性地将这些功能予以复现，合理规划出形式多样的消费空间、展示空间、娱乐空间，尽可能在原有历史传统基础上招商引资，引入非遗产业态，有戏台的会馆可充分利用场所功能，在节庆日举办庆典活动，融入契合的闽剧、伕唱、佾舞等非遗文化，让传统与现代在合理的空间内相融合。

### （三）重构民俗叙事视角，增强文化认同

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写道：“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和陶冶人。”<sup>[10]</sup>上下杭以商业发展为根基，催生出商贸文化、会馆文化、民俗信仰文化，在群体作用下为上下杭的发展带来内生动力。如今川流涌动的贸易往来难以复现，会馆文化徒留其形，唯有从民俗信仰文化入手，兼容现代文旅消费理念，实现街区的文化复兴和文化传播，而要想实现这一目的，还需要以人为本。

近年来，“民俗非遗+旅游”的模式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潮流新风，从潮汕“英歌舞”到长乐“游神”，从泉州蟳埔簪花到漆扇制作，原本受到空间限制的民间传统技艺、习俗活动走出“圈子”，为

众人所熟知，为全国文旅消费提供新赛道，也让非遗以独特的文化传承方式从“博物馆”式静态传承转为走进百姓生活的活态传承。作为集多要素、多业态为一体的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要充分利用“福文化”富集优势，打造“福文化+”复合型业态。围绕陈文龙信俗、张真君信俗等开展民俗、文化交流活动，“在不改变其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不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寻找生产性保护的方式与旅游开发的和谐结合”<sup>[1]</sup>。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力，形成品牌效应，吸引各地游客、信众、学者、学生等群体共同参与，增强文化认同感，推动“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深度挖掘上下杭内生动的民间故事加以艺术性创造，巧妙利用会馆、亭台楼阁、水域等空间为民俗活动的开展创造场景，展演如《贻顺哥烛蒂》《红裙记》《拣茶记》等特色剧目。依托剧本杀、沉浸式小剧场、快闪、音乐节、民俗庆典等方式，更好吸引年轻群体感受地域文化。常态化开展具有“虾油味”的闽剧、评话、伢唱、街头艺人表演、民间非遗技艺展示等活动，向游客展示上下杭的文化风貌，让街区充满烟火气。

综上所述，福文化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作为福州福文化的重要传承地和发展载体，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通过加强福文化在上下杭的活态传承，对推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具有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J]. 旗帜, 2022(06):6-7.
- [2]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福文化概论[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22: 132-134.
- [3] 刘召龙, 刘琬华, 李光涵. 构建与阐释: 福州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遗产价值叙事研究[J].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2023(06):23-31.
- [4] 福州市台江区政府. 福州双杭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6:108.
- [5] 福州市委党史方志室. 上、下杭会馆建筑[EB/OL]. (2023-05-13) [2024-08-03]. [http://fz.fjdsfzw.org.cn/wap/2023-05-13/content\\_1087.html](http://fz.fjdsfzw.org.cn/wap/2023-05-13/content_1087.html).
- [6] 筱陈. 福州上下杭商业文化的根脉[J]. 福建史志, 2019(05):53-57.
- [7] 陈吉. 让福文化为福建非遗插上腾飞的翅膀[J]. 东方收藏, 2023(01):5-11.
- [8] 董国娟, 荆琦, 冯艳. 基于城市文化传承视角的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研究——以景德镇中山北路改造实践为例[J]. 滁州学院学报, 2022(04):56-61.
- [9] 孙菲, 胡高强. 文化、消费与真实性: 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困境——以福州上下杭为例[J]. 山东社会科学, 2020(05):179-185.
- [10] 单霖翔. 关于“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思考[J]. 文艺研究, 2007(05):35-46.
- [11] 王文章. 注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建设性破坏[N]. 光明日报, 2007-06-04(02).

责任编辑：陈琴容

# 《福州党校学报》2025 年征稿启事

《福州党校学报》是由中共福州市委主管、中共福州市委党校主办的社科类综合性期刊。2025 年本刊辟有新时代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研究、党的建设、治理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研究、社会与文化研究、党校教育研究、福州发展研究等栏目。欢迎广大读者、作者投稿。来稿要求：

1. 来稿内容包括：题名、作者姓名、工作单位、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作者简介。另附题名的英译。如属基金项目成果，应在篇首地脚标注项目名称和编号。

2. 题名应简明、具体、恰当，一般不超过 20 个汉字，必要时可加副题名；摘要一般不超过 300 字，简要说明论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关键词选取 3-5 个能反映文章主题内容的词或词组。

3. 作者简介主要包括姓名、单位、职务、职称、学位和研究方向。在论文末尾注明：单位详细地址、邮编、电子邮箱、联系电话。

4. 正文一般以 6000—13000 字为宜。社科论文层次序号采用一、（一）、1.（1），可跳级使用。

5. 参考文献按引文先后在文中标出序号，并与文后参考文献序号一致。参考文献著录项目要齐全，具体要求如下：

专著：[序号] 作者：书名 [M]. 出版地：出版社名，出版年：起止页码。

例：[1] 刘国钧,陈绍业.图书馆目录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5—18.

期刊：[序号] 作者.题名 [J].刊名，年，卷（期）。

例：[1] 何龄修.读顾城《南明史》 [J].中国史研究，1998（3）。

报纸：[序号] 作者:题名 [N].报名，出版年一月一日（版次）。

例：[1] 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 [N].人民日报，1998—12—25（10）。

电子文献：[序号] 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 [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 电子文献的出版或获得地址，发表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例：[1] 王明亮.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 [EB/OL] (1998-08-16) [1998-10-01].<http://www.cajcd.edu.cn/pub/wml.html> .

6. 来稿请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本刊电子邮箱:fzdxxb@163.com。作者来稿文责自负，请勿一稿多投；本刊不以任何形式向作者收取审稿费、版面费等。

7. 本刊有权对采用的稿件作适当删改，作者若不同意删改请在稿件上注明。稿件自寄出或发送 2 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来稿一律不退。

《福州党校学报》编辑部